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学 子 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办好思政课的根本遵循

加入WTO二十年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

生命旨归与危机理性：全民安全教育体系的构建逻辑

2021.01

(总第277期)

# 欢迎订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月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是由教育部主管、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教育管理类学术期刊。本刊已成为高等教育管理者、研究者与实践者对话的平台，教育决策部门与实践工作部门双向互动的桥梁。本刊主要栏目：教育学人、书记校长文萃、高校管理案例研究、教育政策与制度研究、教育基本理论、专题研究、考察调研报告、国际视野等，随着教育改革的发展的需求，相继增设新栏目。

全年共 12 期，总计约 180 万字，15 元/月，180 元/年。

- 订阅方式：
1. 欢迎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82-484。
  2. 关注“中国邮政微邮局”公众号，输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网上订阅。
  3. 批量订阅欢迎联系通过以下方式订阅。

###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老师 郭老师  
电话：010-69226801、69241029  
010-69248888 转 3568  
邮箱：dingkan010@163.com  
传真：010-69260513  
QQ:1559874143; QQ:2927191594

###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体育场支行  
账号：0200053009008801215  
户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教育管理杂志社



公众号

订阅回执单可在学院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下载

网址：<http://www.naea.edu.cn> 网页路径：主办期刊/广告发行

##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订阅回执单

(本表复印有效，请用正楷书写)

单位名称			电子邮箱		
订阅部门		订阅人	联系电话		
刊物邮寄地址	省	市(县)	区(乡镇)	街道	邮编
订阅份数	《学报》份		订阅时间	20 年 月至 20 年 月	
汇款人或单位			是否挂号	○是(邮费3元/月)	
汇款金额				○否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电子发票邮箱			*收票人电话		
备注					

- 特别提醒：
1. 银行汇款请务必注明单位及汇款人；
  2. 平信邮寄刊物存在丢失现象，为确保贵单位及时、安全收到刊物，建议您采取挂号邮寄；
  3. 请将本表填好后及汇款凭证一并传真(自动传真)、拍照上传 QQ 或发邮箱，即完成订阅；
  4. 刊物多个邮寄地址可另附详细地址表；
  5. 请务必填写发票接收电子发票邮箱及联系电话，如需纸质发票请在备注栏注明详细收件信息。



#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月刊)

2021年第1期(总第277期)

## 目 录

### 编辑委员会

主任 侯慧君

副主任 韩旭 于京天

编委 (按音序排列)

陈丽萍 陈晓宇 陈子季

丁月牙 葛道凯 郭垒

韩震 胡敏强 胡锐军

黄晓玫 李曼丽 刘亚荣

刘元春 卢晓中 马怀德

孟繁华 沈壮海 石中英

王炳林 邬大光 邢晖

许杰 许玉乾 杨晓慧

游旭群 于建福 于鲁文

袁振国 张捷 张卫国

周玉 周作宇 朱庆葆

主 编 侯慧君

常务副主编 吕文妙

副 主 编 蒋园园

编 辑 吴 虑 吴潇剑

刘 红

美术编辑 张进美

录入排版 梁京京

本期执行编辑 刘 红

### 学 员 论 坛

办好思政课的根本遵循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两周年之际

沈壮海 3

思政课教学的“术”“学”“道”与实践途径

顾红亮 11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难点及其突破

冯秀军 17

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改革的若干思考

刘宏达 23

### 教育政策与制度研究

加入WTO二十年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

孙霄兵 31

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中的校院关系与传导机制探析

郭建如 刘彦林 40

“双一流”建设中的组织合法性与制度趋同

——对414位高校二级学院院长的调查分析

李立国 冯鹏达 张海生 51

# 目 录

## 专 题 研 究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构建 霍庆生 59

生命旨归与危机理性：全民安全教育体系的构建逻辑  
梁静 宋乃庆 66

## 教育基本理论

“后真相”引发学生价值判断的困境及教育的应对 高洁 76

## 考察调研报告

大学生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  
杨钊 王琼 井美莹 85

**致作者：** 作者文责自负；来稿如在一个月未接到联系，请另投他刊；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读费等任何名目费用；本刊对刊登的文章享有网络传播权，如有异议，请在来稿中注明，未声明者，本刊视为同意。感谢您对本刊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编辑部** 010-69248888 转 3122  
**投稿邮箱** xuebao@naea.edu.cn  
**在线投稿** <http://gjxz.cbpt.cnki.net/EditorEN/index.aspx?t=1&mid=gjxz>

**主 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 办**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出版发行**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教育管理杂志社  
**发行范围** 国内外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青源北路8号  
**邮 编** 102617  
**网 址** [www.naea.edu.cn](http://www.naea.edu.cn)  
**传 真** 010-69260513  
**广告发行** 010-69241029  
010-69226801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1年1月15日

征订单  
首都医科大学

封二  
封三、封底

# 办好思政课的根本遵循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两周年之际

沈壮海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2019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并就如何办好思政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在我国思政课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树立起了一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里程碑。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 需要我们认真学习、不断重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以之为办好思政课的根本遵循。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思政课之所以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 在于它回答的是教育的关键问题、面对的是处于人生关键时期的“关键群体”、培养的是这一关键群体的“关键素质”。思政课教师要发挥办好思政课的关键作用, 必须要有办好思政课的充分信心、过硬的素质、不懈改革创新的高度自觉, 并不断涵养职业认同感、葆有职业荣誉感。在推动开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 我们还必须始终坚持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 有效构建、凝聚办好思政课的强大合力。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思想政治理论课; 根本遵循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1-0003-08

2019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就如何办好思政课问题与众多辛勤耕耘在思政课教学第一线的教师面对面深入交流。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主持召开专门座谈会, 与来自大中小学的思政课教师代表同堂共话思政课, 这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 并就如何办好思政课问题, 条分缕析, 娓娓道来,

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 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 既指明了推动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的努力方向, 也为广大思政课教师上了一堂生动的示范思政课。座谈会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在思政课教学领域以及整个教育领域引起强烈反响, 鼓舞着广大思政课教师在立德树人中勇于担当作为, 也引领着新时代思政课教学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 在我国思政课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树立起了一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里程碑。

**收稿日期:** 2020-12-09

**基金项目:** 2018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研究”(2018MZD020)

**作者简介:** 沈壮海, 男, 教授,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中心(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39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需要我们认真学习、不断重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之为办好思政课的遵循。

### 一、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

我们党向来重视学校思政课的建设问题。如何更好推动思政课的加强改进、创新发展，也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极为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上，以及在赴大中小学的实地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无不谈及思政课建设，无不叮嘱要切实抓好思政课教学。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之所以如此重视，根本原因在于思政课在学校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将之概括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认为其作用“不可替代”。准确把握思政课的“关键课程”地位、“不可替代”作用，是办好思政课的重要前提。

思政课之所以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在于它回答的是教育的关键问题。这一关键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教育的首要问题”<sup>[1]</sup>。宋代理学先驱胡瑗曰：“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古往今来，培养人，从来都是学校的天职。但是，所要培养之人的内涵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极为具体的。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有其人才培养的具体规格要求。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同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亦特别指出，古今中外，关于教育和办学，在教育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sup>[2]</sup>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后，便直截了当地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sup>[3]</sup>之所以如此毫不犹豫、开宗明义，是基于对教育本质与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sup>[4]</sup>这个问题的坚定不移。对于我们的教

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及，且每次都斩钉截铁、旗帜鲜明地给出这样的回答。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才竞争日益激烈、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关键时期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一教育首要问题、关键问题的反复明确重申，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强调，“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sup>[5]</sup>，也就是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样的新人，要有过硬的知识能力，更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没有这一点，“人”无以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才”也无以定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sup>[6]</sup>思政课所担负的职责，就是为我们所培养的人给出明确的立场和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予以准确的引导，因而在回答和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sup>[7]</sup>。

思政课之所以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在于其面对的是处于人生关键时期的“关键群体”、培养的是这一关键群体的“关键素质”。这些青少年，寄托着千家万户的希望，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梦想。青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思政课所面对的，便是这与祖国和民族的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亿万之众，是充满生机、蓄势待发同时也需要悉心呵护、培育涵养的希望。从人生发展阶段来讲，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价值观形成、确立的关键阶段，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学生心智逐渐发育健全，思维开始进入最活跃状态，特别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sup>[8]</sup>思政课教学的展开，由小学至大学，所伴随的正是青少年迅速成长、需要“蒙以养正”的关键人生阶段。

思政课面对的是处于关键人生阶段的关键群体，所要培养的也是人的素质中最为关键的方面。“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在人的素质结构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素质，即德，即思想政治素质。人无德不立，这一素质影响着人的素质的整体形成，也直接关系着人的素质的实际之用。因而，育人之根本在于立德。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六个下功夫”<sup>[9]</sup>。六者之中，论“德”之多，堪为“首重”。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立德在人才培养中的首要地位。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论及思政课的职责。他指出，“思政课要引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要解决学生理想信念问题”，“要教会学生科学的思维”“要用科学理论培养人”，“政治引导是思政课的基本功能”，“思政课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这一点必须牢牢抓住”，“思政课的任务是传导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性是其根本”，思政课教给学生的“应该是观察认识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立场、观点、方法”，“无论怎么讲，最终都要落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上来”，“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sup>[10]</sup> 这些论述，虽切入角度不同，但都聚焦一个共同的素质，即人的素质中最重要的素质——德。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学，就是要担负起引导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任务，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思政节的特殊定位、所担负的特殊职责，决定了其在学校立德树人中的关键意义。

## 二、思政课教师要发挥办好思政课的关键作用

就教育发展的宏观整体来看，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就任何教育活动的具体展开

而言，教师亦是主导力量，是引导教育活动、影响教育成效的关键所在。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曾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sup>[11]</sup> 2014年教师节，在北京师范大学同师生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谈论的核心主题也是好老师之于人生、学校、民族的意义，以及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老师。他强调：“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sup>[12]</sup> 在思政课教学中，主导性的因素同样是教师。教师是推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矛盾转化的主要方面，实际而具体地决定着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sup>[13]</sup>，对思政课教师积极发挥办好思政课的关键作用，期勉殷殷，并给予了精心指导。

思政课教师要发挥办好思政课的关键作用，必须有办好思政课的充分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政课，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信心问题。‘欲人勿疑，必先自信’。”<sup>[14]</sup> 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没有充分的信心，就不可能有推进这一事业的坚定执着，更不可能演绎出这一事业的精彩。办好思政课，我们之所以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在于党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对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这为办好思政课提供了根本保证；在于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新境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为办好思政课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为办好思政课提供了深厚力量；在于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

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这为办好思政课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些方面都是我们有充分信心办好思政课的重要根据。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方面条分缕析，引导思政课教师在对这些方面的认识和把握中形成办好思政课的坚定信心。深入理解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高度重视、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创新发展、深入理解思政课建设的丰富积累与宝贵经验，是思政课教师形成并提升自己职业素养的内在要求，也是增进办好思政课信心和底气的重要前提所在。

思政课教师要发挥办好思政课的关键作用，必须有过硬的素质。教师是讲台上的主角。教师的素质，是教师演绎教育精彩的主体性根据，是一切积极的外在条件真正发挥出有益于教育活动顺利推进重要作用的内在依托。对于教师的素质及其建设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论及。他强调，“教师队伍素质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sup>[15]</sup>，“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sup>[16]</sup>。他还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教育教学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等诸多方面，深刻分析教师素质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新要求。2014年教师节，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2018年5月，在同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交流中，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标准予以再次重申。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sup>[17]</sup>。对教师素质如此密集、明确的论述，所体现的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素质问题的高度关注。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思政课教师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这“六个要”，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素质要求的思想在思政课教师这一特殊教师群体素质要求上的进一步具体化

展开。政治要强，即要求思政课教师要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要能够坚定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情怀要深，即要求思政课教师要有家国情怀、传道情怀、仁爱情怀，心里装着国家和民族，心中始终装着学生，装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的真情实感和执着追求。思维要新，即思政课教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善于运用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抓住关键、找准重点、阐明规律，创新课堂教学。视野要广，即思政课教师要有宽广的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自律要严，即思政课教师对自己要求要严格，既要遵守教学纪律，也要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信道守道践道，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人格要正，即思政课教师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这些要求，贯穿知、情、信、意、行诸方面，对思政课教师应有的综合素质给出了全面勾勒，是思政课教师队伍素质培养培训的“课标”，也是思政课教师自觉修养、练本领强素质的指南。思政课教师要在不断增强本领、提高素质中，努力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思政课教师要发挥办好思政课的关键作用，必须有不懈改革创新的高度自觉。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这个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的时代，唯有永不停顿的改革创新者，才能跟上这个时代、引领这个时代。思政课教师既身处飞速变化的现实之中，也面对着思维空前活跃、身心迅速成长的青少年，唯有永不停顿地改革创新，才能与时代同行，与教育对象进行有效的心灵交流、引发深层的思想共鸣。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思政课建设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sup>[18]</sup>，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sup>[19]</sup>。2020年9月，在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时，习近平

总书记又一次提出，要“深化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sup>[20]</sup>。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思政课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也就如何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他强调，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这八个方面的“相统一”，贯穿守正创新的根本原则，深刻阐述了思政课教学中一系列重要矛盾关系的正确处理问题，阐明了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对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规律的明晰呈现，也是对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实践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模糊认识、争论话题的明确引导和透彻解答。深入推进思政课的改革创新，要求我们对八个“相统一”整体把握、全面理解、融会贯通。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这些原则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称之为“打好组合拳”。他强调，“只有打好组合拳，才能讲好思政课，但无论组合拳怎么打，最终要落到把思政课讲得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上来，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叫人口服心服”<sup>[21]</sup>。始终把把握住思政课教学的目标指向，在此基础上打好八个“相统一”的“组合拳”，思政课的改革创新才能真正取得实际成效。

思政课教师要发挥办好思政课的关键作用，必须不断涵养职业认同感、葆有职业荣誉感。高度的职业认同感、强烈的职业荣誉感，是成就事业的强大内驱力。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关于教育的重要性、教师职业的光荣，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论及，强调“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sup>[22]</sup>，赞誉“教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也是最伟大、最神圣的职业之一”<sup>[23]</sup>，“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

人的时代重任”<sup>[24]</sup>。在看到教师群体整体上具有强烈职业认同感、荣誉感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客观承认，一些人对思政课教师的职业认同度不高，认为思政课教学没有学术含量，思政课教师没有学术水平。这些思想观念直接影响着思政课教师扎实讲好思政课的积极性。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调动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责任感。”<sup>[25]</sup> 思政课教学涉及知识范围广，其中不仅有学问，而且是有“大学问”，“其学术深度广度和学术含金量不亚于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sup>[26]</sup>。讲好思政课，不仅有“术”，也有“学”，更有“道”。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学校思政课教师交流时专门讲了自己亲自到高校给学生讲思政课的经历和体验，并称“思政课教学是一项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讲好思政课不容易，因为这个课要求高”。<sup>[27]</sup> 思政课教师要深刻把握思政教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体悟思政课教学中所内含的“道”“学”“术”，增强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荣誉感，并不断练好内功、提升素质，更好地展现思政课教学的“道”“学”“术”，赢得学生的认可，赢得学术界、教育界同仁及社会多方面的认可和尊重。

### 三、构建办好思政课的强大合力

办好思政课，教师是关键。但教师关键作用的有效发挥，还有赖于一系列条件和因素的支撑。思政课建设的有效加强改进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加强改进，任何时候也都离不开强大的合力推动。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思政课建设成效，同时也指出思政课建设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有的地方和学校对思政课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到位；教师选配和培养工作还存在短板，教师队伍结构还要优化，整体素质还要提升；体制机制还有待完善，评价和支持体系有待健全；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效应还有待增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没有完全形成，全

党全社会关心支持思政课建设的氛围不够浓厚，等等。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是更好调动思政课教师积极性主动性，更好提升思政课教学亲和力和感染力、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客观要求。在解决这些问题、推动开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有效构建、凝聚办好思政课的强大合力。

一是要切实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sup>[28]</sup>办好思政课，同样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在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了明确要求，也作出了积极示范。各级党委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思政课建设等的重要论述，将办好思政课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到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自觉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来看待思政课，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思政课，增强办好思政课的认识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权，使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为思政课建设的加强改进、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大环境。在办学的大方向上游移不定、含混不清者，绝不可能对思政课建设真心重视、有效领导。要将思政课建设列入党委工作的大事之列，摆上重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思政课教学岗位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让思政课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此外，学校主要领导要率先行动、示范引领。大学领导是教育者，更应该是政治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同志要积极到学校去讲思政课，这是对

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一个考验。能不能讲好思政课，也是一个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工作作风的体现。”<sup>[29]</sup>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将对思政课建设的重视真切地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

二是要进一步强化信赖尊重思政课教师、关心支持思政课教学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对于思政课建设，既要从严管理，也要科学治理。从严管理，就是要以更高质量标准实施教学管理、严肃教学纪律、强化师资队伍素质建设，正师德、肃师风，在思政课教师选用、管理、考核中要严把政治关、师德关、业务关。科学治理，就是要遵循教育规律、思政课建设与教学规律，将对思政课教师和管理建立在对教育教学科学规律的自觉遵循之上，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其中尤其是要注重加快构建符合思政课特点的教师评价、教学评价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革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提高评价中的教学和教学研究占比，克服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弊端，引导思政课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一些学校口头上把思政课捧得很高，但落实不到教育、学术、人才评价机制上，有的跟国外机构设置的评价体系走，一切以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情况排次、定序、论英雄。思政课专业没办法在所谓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自然而然成为被价值评价体系排斥的对象，甚至有的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系都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渠道进人、评职称，有的靠学校特批照顾。久而久之，有的地方形成了思想政治专业非学术、无学术等极为错误的观点和氛围，给一些思政课教师造成很大心理阴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sup>[30]</sup>要通过符合构建和完善思政课特点的教师评价、教学评价体系，为办好思政课确立有力的制度保障，为思政课教师积极性主动性的充分调动、创造活力的充分激发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还要为思政课教师的教学科研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守纪律，不意味着不能讲矛盾、碰问题。有的教师怵于思

政课的意识形态属性，担心祸从口出，总是绕开问题讲、避开难点讲。只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立足于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全面客观看问题，就不用担心在政治上出问题。要给教师充分的信任，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sup>[1]</sup>在这样的良好环境中，思政课教师传道授业、释疑解惑、引导认识、夯实信仰的作用才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三是要推进学校思政课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横向一体、纵向贯通。就横向而言，要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和育人机制。学校是教育之所，它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场域都是育人的所在。如果将立德树人的任务仅仅诉之于学校教育的某一个方面，包括仅仅诉之于思政课，那么立德树人的任务是绝对不可能圆满完成的。立德树人的有效推进，一定是整体性的，是学校教育中方方面面共同的事业。这就要求学校真正建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育人机制，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于学校教育体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在这样的合力体系中，深化思政课教学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的对接、协同，深化思政课教学与专业课程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撑，以整体的合力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深化，推动立德树人成效的提升。就纵向而言，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的一体化建设进程；要坚持大中小学纵向主线贯穿、循序渐进，针对不同学段，根据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科学设置具体教学目标，抓好教学目标设计、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教师培养、考核评价等环节，让思政课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知心伴行者”“入心引导者”。此外，构建办好思政课的强大合力，还要注意进一步深化探索家校合作的有效机制，深化探索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新方法新模式。

当今，中华民族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进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伟大的新时代吹响的教育号角。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自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办好思政课，担负起思政课教师的神圣使命，发挥好思政课教学在学校立德树人中的关键作用，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应有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1] [9] [17] [22] [24] 新华网.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B/OL]. (2018-09-10) [2020-12-0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9/10/c\\_1123408400.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9/10/c_1123408400.htm).
- [2] [3] [4] [15] [16]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5-03 (2).
- [5] [6] [7] [8] [10] [13] [14] [18] [19] [21] [25] [26] [27] [28] [29] [30] [31]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 2020 (17): 4-16.
- [1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08.
- [12] [23] 习近平.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9-10 (2).
- [20] 习近平. 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09-23 (2).

(责任编辑: 吕文妙)

**The Fundamental Guidance of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econd Anniversary of the  
Symposium for School'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  
Hosted by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Xi Jinping

*Shen Zhuanghai*

**Abstract:** On March, 2019,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Xi Jinping personally hosted a symposiu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school and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on how to constru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setting up a milestone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es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with high quality, the important speech made by Xi at the symposium should be studied carefully, reviewed constantly, and taken as the fundamental guidanc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s the key to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Teachers are the key to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reason wh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s in a key position is that it answers the key questions of education, faces the “key group” who are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life, and cultivates the “key quality” of this group. In order to play the role well i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eachers must have full confidence, excellent quality, and highly consciousness of unremitt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Continuously cultivating a sens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s well as maintaining a sense of professional honor is also needed.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of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t is highly necessary to uphold and improve the Party's leadership to effectively build and gather a strong force for a new vista.

**Key words:**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of Xi Jinp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Fundamental guidance

# 思政课教学的 “术”“学”“道”与实践途径

顾红亮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摘要:**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思政课建设和改革实践三个视角来看, 思政课教学既面临挑战, 也处于战略机遇期。从理论的角度看, 思政课教学的主要原则是坚持“术”“学”“道”的统一。一方面, “术”“学”为“道”的显现提供载体和支撑; 另一方面, “道”为“术”“学”的展开提供指导和引领。从实践的角度看, 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要通过三个主要途径, 一要生根于埋下真善美种子的教师队伍, 二要扎根于祖国大地讲活教学内容, 三要植根于学生成长规律和需求。

**关键词:** “术”“学”“道”; 思政课教学; 教师队伍; 祖国大地; 学生成长规律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1-0011-06

思政课建设的意义重大, 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 让听课的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有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思政课教学的质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素质高低。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 不仅是教学话题, 而且是一个体现综合治理能力的话题。

理论界讨论如何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文章较多。但还没有文章从“术”“学”“道”相统一的角度来讨论思政课教学话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 新时代思政课教学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 第二, 从理论的

角度看, 思政课教学要遵循什么样的主要原则; 第三, 从实践的角度看, 思政课教学要通过什么样的主要途径。分别从“谁来讲”、“怎么讲”和“对谁讲”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 一、新时代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正确认识新时代思政课教学的挑战、机遇和意义? 2019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说: “当前形势下, 办好思政课, 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 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sup>[1]</sup> 因此, 选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收稿日期: 2020-11-18

基金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精神研究”(2019WJD019)

作者简介: 顾红亮, 男,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1期教育部直属系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第61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代哲学研究。

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宏观视角和思政课建设与改革实践的微观视角来审视思政课教学的机遇和挑战。

### 1.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下，世界范围内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在不断累积。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扩散，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上的影响还在持续。面对疫情的肆虐，一些国家消极对待，不尊重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使得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不断攀升，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这些现象表明，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种动荡给思政课教学带来一些挑战，使人们一时难以把握国际秩序的走向，对世界的发展前景产生了忧虑。

尽管世界发展复杂多变，但我们依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人们期盼和平与发展，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使中国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通过国际科技和经济比较，一方面，从“道”的角度看，人们对中国制度更加自信，对思政课讲授的道理的验证更加直观；另一方面，从“术”和“学”的角度看，思政课讲授的内容更加富有国际内涵，为思政课教学增加更多跨国比较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当前的思政课教学处于极佳机遇期。

###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把握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现在的学生是未来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担负着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重任。这些青年学子能不能立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终身；思政课能不能更好地帮助青年学子端正认识，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牢固树立起正确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敢于反对一切歪曲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这些都是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逐渐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近了；人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更加坚定。这些成绩给思政课教学带来机遇。一方面，从“道”的视角看，民族复兴的伟业和成绩印证了思政课教学内容的真理性；另一方面，从“术”和“学”的视角看，在现实生活中，每天发生着大量生动有趣的事情，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好素材和好案例。

### 3. 在思政课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把握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思政课教学予以特别的关注。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给领导干部和红军战士讲过思政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五四”前夕考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时强调了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性。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明确提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sup>④</sup>各级政府和学校都重视思政课教学，推动各项教学改革，让思政课办出成效，办出情怀。思政课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注度明显提高，获得的培训机会更多、资金投入更足、资源配置更丰富。这些有利条件给新时代思政课教学创造了良好机遇和氛围。

我们在看到思政课教学改革出成绩出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例如，课堂的教学效果有待提升，对学生的吸引力有待提高；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需要提升，新技术更新迭代很快，教师的教学技能不能完全跟上；教学内容和素材不够鲜活，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能很好地转化为生动的教学案例；教学评价方式和体系需要改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有效衔接需要协调，一体化建设需要统筹；教师队伍的结构有待优化，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对思政课教学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但是可以随着思政课改革的逐步推进加以解决，其教学薄弱环节也可以得到改善。

## 二、思政课教学的主要原则：“术”“学”“道”统一

我们既要正视挑战带来的压力和机遇带来的优势，又要辩证理解挑战和机遇的关系，化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那么，怎样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发挥关键课程的作用？讲好思政课有什么方法论要求？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有力的解答，“讲好思政课不仅有‘术’，也有‘学’，更有‘道’。”<sup>[6]</sup>这个重要论断启示我们，在思政课教学实践中，要把“术”“学”“道”统一起来。从理论的角度看，坚持“术”“学”“道”统一是思政课教学的主要原则。

第一，思政课教学有“术”。“术”指方法和技术。从方法、技巧的层面理解“术”，意味着思政课老师要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技艺，利用多种现代辅助技术和手段，艺术性地讲授思政课，改变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讲授方式。“一些思政课堂运用小组研学、情景展示、课题研究、课堂辩论等方式教学，让学生来讲，这有利于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sup>[6]</sup>有的学校开始尝试虚拟环境教学模式，形象模拟思政课程内容，从日常教室进入仿真的情景教室，把学生带入火热的革命年代或建设年代，使其作为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进入历史场景，以虚拟方式体验重大历史事件，使学生有更强的带入感和参与感。

第二，思政课教学有“学”。“学”指学理、学术、学科、学养。思政课的讲授是一门学问。讲授必须有学术含量，有学理支撑，有学科背景。思政课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学识和渊博的知识。“思政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专业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学术深度广度和学术含金量不亚于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sup>[6]</sup>思政课讲授的素材要与时俱进，及时补充新的教学案例，下功夫琢磨更新教学课件。既要讲素材，又要讲思想；既要讲案例，又要讲学理，这些都需要教师有深厚的学养和见识。

第三，思政课教学有“道”。“道”指规律。思政课教学有规律可循，这不仅涉及教学规律，而且涉及学生成长的规律和教书育人的规律。在研究和把握规律的同时，要善于综合运用规律，用其指导教学实践，使思政课的教学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既要有惊涛拍岸的声势，也要有润物无声的效果，这是教育之道。”<sup>[6]</sup>有“道”的含义不仅仅指认识规律，而且指以规律育人心，让思政课讲授的道理浸润学生的心田，使“道”入耳入心。

在思政课的教学实践中，“术”“学”“道”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术”“学”为“道”的显现提供载体和支撑；另一方面，“道”为“术”“学”的展开提供指导和引领。“术”“学”可进于“道”。“思政课教学是一项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sup>[7]</sup>。同理，在思政课教学中，做到“术”“学”“道”的辩证统一，也是一项非常有创造性的任务。

思政课教学要坚持“术”“学”“道”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是从理论的角度所做的概括，体现了思政课教学方法论的总原则。从实践层面看，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有三个关键要素，分别是主讲的教师、教学的方式、听讲的学生，对应“谁来讲”“怎么讲”“对谁讲”三个问题。所以，要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既要生根于埋下真善美种子的教师队伍，又要扎根于祖国大地，还要植根于学生成长规律。如果说“术”“学”“道”统一的原则是“一体”，那么“一体”需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展现。我们把教师队伍、教学内容和学生成长规律看作“一体”的三个方面，看作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必经的三个主要实践途径。

## 三、思政课教学的实践途径

### 1. 生根于埋下真善美种子的教师队伍

从实践角度看，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第一个关键因素是怎么把主讲队伍建好，把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好。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

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sup>[8]</sup>因此,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我们要建设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是能埋真善美种子、引导扣第一粒扣子的队伍。

抓好思政课主讲队伍的素质是建好队伍的重点。“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sup>[9]</sup>建好思政课教师队伍,要提高六个方面的素养,包括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sup>[10]</sup>这六个“要”是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素养的总体要求,也可以看作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之“道”。

建好思政课教师队伍不仅有“道”,也有“术”和“学”。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术”与“学”)综合治理,提升思政课教师素养,其中重点要抓好青年教师队伍和后备人才的素养,更好贯彻“术”“学”“道”相统一的原则。

第一,到社会上去历练讲好思政课。很多青年教师从校门到校门,不太了解党和政府部门的运作机制和政策操作重点,不太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特点,对实践体会不深,造成课堂教学效果不佳。毛泽东曾号召革命文艺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sup>[11]</sup>。同样,为提高教学质量,可以通过旋转门、国情调研等方式,让年轻思政课教师有更多机会到政府部门挂职或交流任职,了解重大社会民生政策出台的程序和过程。要让年轻思政课教师深入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观测点,深入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群众的工作点,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背后的原因,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疾苦和奋斗业绩。教师有了丰富的经历,有了切身的感悟,讲课才能感染人,感动人。

第二,到师训中去淬炼讲好思政课。通过筹建师训实验室、组建学术工作坊、有针对性帮扶等方式,利用人工智能、教育学、心理学等技术和知识,准确诊断年轻思政课教师的短板弱项。例如,有的老师在发声表达上有问题,有的老师在把握学生心理、捕捉学生动作信息方面存在不足,有的老师的知识面比较窄,有的老师对于信息技术的课堂运用存在畏惧。需

要针对不同老师的情况,制定不同的精准培训方案,以联合授课、集体备课、专题培训等举措补足短板,克服弱项。有学者把教师实训基地分为课堂教学驱动型、课题研究驱动型、制度文化驱动型、岗位发展驱动型四类。<sup>[12]</sup>通过不同实训基地的研修,让青年教师尽可能多地进行跨学科训练,开阔视野。

第三,到国际上去锻炼讲好思政课。通过去国外访学、当国际志愿者、做跨国合作研究课题、招收留学生等方式,让更多年轻思政课教师利用各种渠道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讲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通过社会的历练、师训的淬炼和国际的锻炼,使思政课教师成为信仰坚定、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的教师。在思政课堂上,无论是讲故事还是讲理论,教师不仅要讲得出、讲得准,而且要讲得好。

同时,从实施路径(“术”)看,建议思政课教师担任兼职辅导员或导师。在高校里,与辅导员和专业教师相比,思政课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机会少。要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思政课教师和学生有更多的互动机会,例如,请思政课教师兼任辅导员,带队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项目,做学生的双创项目指导教师,让思政课教师成为学生学术、文娱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使思政课教师和学生有更多的交往和思想交流,便于其掌握学生的心理和思想倾向,从而在思政课堂上有效实施教学方案。

## 2. 扎根祖国大地讲活教学内容

从实践角度看,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怎么把教学内容讲活讲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同理,我们要把思政课堂安放在祖国大地上。扎根中国大地讲授思政课,坚持“术”“学”“道”相统一。既把社会大课堂“搬进”思政小课堂,又让思政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这样,作为主渠道的思政课教学可以做广义的理解,既有小课堂的教学,又有大课堂的教学。大小课堂的结合是学校教育和社

会教育的结合，是理论教学和实践考察的结合，使思政课堂“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sup>[13]</sup>。大小课堂的结合有多种形式，如开展国情调研、走访劳模英模、参加志愿者活动、做公益劳动、宣讲社区感人故事，等等。

扎根中国大地讲授思政课，给出了思政课讲授的方向和定位，避免死记硬背教材知识，避免出现“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sup>[14]</sup>的怪现象。思政课要引导学生思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规律和逻辑，这体现着“道”的元素。把社会大课堂和思政小课堂有机结合起来，让社会大课堂变成思政大课堂，需要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统计学等多种知识体系，这里包含着“学”的元素。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它们都是讲好思政课的鲜活素材和辅导材料。把这些活材料和思政课教材结合起来，就能把思政课讲活，讲生动，讲出情怀。如何用好鲜活的大课堂素材和案例，更多体现着“术”的元素。在“术”“学”“道”相统一的基础上，扎根中国大地讲授思政课，才能把思政课讲透，讲巧，讲妙。以扶贫为例，到2020年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创造了我国和世界减贫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习近平总书记说：“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sup>[15]</sup>在讲好中国的脱贫攻坚故事上，思政课教师义不容辞，应该把扶贫成就纳入思政课教学内容，结合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实践成果，讲出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从实施路径（“术”）看，建议有条件的高校设计社会实践“护照”制度。梳理高校所在地区的红色资源和改革开放成就展示资源，把这些资源变成思政课的现场教学点。根据思政课教学内容，在现场教学点上，设计新型的社会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拿着“护照”，去现场教学点调研学习，记录所看所得，所思所想，积累“护照”印章，积累社会实践学分。把思政课教师带着大家去实践的形式变成学生自主去教学点学习的形式，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思政

课知识的积极性。

### 3. 植根学生成长规律和需求

从实践角度看，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第三个关键因素是现在的学生有什么样的需求和期待，怎样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因此，要坚持“术”“学”“道”相统一，植根学生成长规律和发展需求，讲好思政课，提高教学质量。

以个体而言，学生的成长环境有差异，需求有区别，期待有差别。以群体而言，一个时代的学生通常带有时代印记和共性特征，他们的发展需求和期待有一些共同特点。研究和了解学生成长成才的个性差异和群体特征是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的必要前提。“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sup>[16]</sup>思政课不单单是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如果离开了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水平，就很有可能流于表面。学生表面上看起来接受了，实际上可能是排斥的。“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sup>[17]</sup>契合学生成长规律、需求和期待来进行知识传授和价值观教育，既有显性的方式，又有隐性的方式，使价值性和知识性在思政课教学中得到统一。

互联网时代，如果不了解学生的现实需求和梦想，思政课的讲授就会缺乏针对性。密切跟踪学生的发展历程，熟悉他们的网络语言和行为方式，就能在网络上获取到大量贴近学生心理的教学素材。把这些网络素材和思政课教材融合起来，就能把思政课讲到学生心坎里去，讲出理想信念，讲出人生智慧。

青年学生思维活跃，愿意吸纳新鲜事物，接受新的挑战。在“拔节孕穗期”，学生的成长发展有规律可循，思政课的讲授也必须遵循一般规律，这体现着“道”的元素。科学把握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和期待，需要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生理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知识，这包含着“学”的元素。在网络时代，如何用好各种网络资源，丰富思政课教学手段，这更多体现着“术”的元素。在“术”“学”“道”相统一的基础上，植根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

待讲授思政课,使学生听得懂,听得进,既口服又心服,能够增强教书育人实效性。以抗疫为例,在这场抗疫大考中,中国人民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是抗疫实践之“道”。我们要结合抗疫精神之“道”、抗疫实践之“术”和“学”,结合学生的防疫、抗疫亲身经历和心理期待以及学生的成长规律讲授抗疫思政课。在抗疫实践中,学生是抗疫的亲历者,在课堂上让学生自己讲述抗疫故事,讲述他们的焦虑、恐慌和期盼,分享他们的震惊、喜悦和梦想。在抗疫大考中,不仅把抗疫斗争讲成思政“大”课、“暖”课,而且讲成思政“金”课。<sup>[18]</sup>

从实施路径(“术”)看,建议运用大数据手段把握学生的发展需求和思想动向。青年学生喜欢在网上学习、游戏、交友、购物。分析学生网上的痕迹和上网行为,可以精准了解其爱好和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政课教学设计。高校的学工数据系统、教务数据系统、

后勤数据系统等互通互联,以合法的方式把学业、消费等数据整合起来,更有利于把握学生成长的轨迹和期待,为思政课教学提供实时信息保障。

#### 参考文献:

- [1] [2] [3] [4] [5] [6] [7] [8] [9] [10] [16] [17]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J]. 求是, 2020 (17): 4-16.
- [11] [13] [1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61. 864. 798.
- [12] 翁铁慧. 大中小学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162-163.
- [15] 习近平.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03-07 (2).
- [18] 顾红亮. 把抗疫大考打造为思政“金”课 [N]. 中国教育报, 2020-09-30 (4).
- (责任编辑 吴潇剑)

## Method, Knowledge and Dao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nd Its Practical Approaches

Gu Honglia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s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as well as in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e teaching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methods, knowledge and Dao. On the one hand, methods and knowledge increase support for Dao's work; on the other hand, Dao provides guidance for methods and knowledge. From practical perspectives, there are three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Firstly, the teaching must be rooted in teaching staff who plant the seeds of truth, kindness and beauty in students' heart. Secondly, it should embed in the motherland and activate the cont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hirdly, it should be rooted in the growth rules and needs of students.

**Key words:** The unity of methods, knowledge and Da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eaching staff; The motherland; Growth rules of students

#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 教师队伍建设难点及其突破

冯秀军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应着眼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入剖析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难点和瓶颈, 精准把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点, 立足学校实际, 着眼思政课教师核心素养, 量质兼顾, 内外兼修, 配齐建强师资队伍, 努力培养一支“可信、可敬、可靠, 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关键词:** 新时代; 思政课教师; 队伍建设; 难点; 着力点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1-0017-06

学  
员  
论  
坛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承担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上,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 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sup>[1]</sup> 因此, 培养一支“可信、可敬、可靠, 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是办好思政课的关键和根本。

## 一、教师队伍建设是办好思政课的关键和根本

办好思政课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思政课建设发表重要讲话, 为办好思政课、建好思政课教师队伍提供了根本指导。

### 1. 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

办好思政课, 攸关教育的历史责任担当。“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教育都肩负着特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必须依靠教育来培养拥护党的领导、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育才先育人, 育人先立德, 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 也是新时代思政课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本遵循。新时代的思政课建设, 必须着眼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重任的时代新人; 着眼于培养在未来 30 年

收稿日期: 2020-11-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长效机制研究”(VEA20002)

作者简介: 冯秀军, 女, 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 1 期教育部直属系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第 61 期高校中青班干部培训班学员,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能够完成“两个一百年”伟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思政课看成一门普通的课程；不能将办好思政课当作一项普通的任务。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sup>[2]</sup>。

办好思政课，攸关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成败。置身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互动更为广泛、频繁，与此相应，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交锋也更为深刻复杂。处于日益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中的校园已非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和“桃花源”，互联网不断突破高校的围墙和边界，高校成为各种思潮交锋竞逐的前沿阵地。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充分发挥思政课课堂的主渠道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牢牢占领高校意识形态的主阵地，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大学生增强“四个自信”，自觉投入奉献祖国、服务人民的奋斗之中。

## 2.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

要将党和国家对思政课的重视和投入转化为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实际成效，将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有效转化为学生自身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必须经过思政课教师在课堂主渠道和主阵地上的“再创作”。没有思政课教师有效的知识传授、理论阐释和价值引导，学生不可能自发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可能自发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优秀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是办好思政课的关键。

思政课教师的关键作用源自思政课教学的挑战性。习近平总书记结合自己讲思政课的亲身体会指出：讲好思政课不容易，因为这个课要求高。一是思政课教学涉及内容广泛，对教师综合素质要求很高；二是思政课教学内容不断更新，对教师知识更新要求高；三是思政课要直面现实，对教师回应尖锐敏感问题的能力要求高。思政课教学是在学生头脑里作业的微雕工程、在学生心灵里播种的灵魂工

程。这一极端重要而又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要求思政课教师自身必须具有坚定的信仰、渊博的学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唯有这样的思政课教师才能让思政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金课。

## 3. 教师队伍建设要紧扣思政课教师核心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sup>[3]</sup>的要求，明确了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应具备的核心素养，为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目标和方向。概括来讲，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核心素养集中体现在政治素质、理论素养、育人情怀三个方面。

第一，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与其他知识性课程不同，思政课不仅仅传授知识，同时还肩负着价值引导的重任。这种价值引导，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遵循，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目标、道路等大是大非问题。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首先要具备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坚定、能够穿越价值迷雾而明辨是非的过硬政治素质和能力。思政课教师在政治上要强，就是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sup>[4]</sup>。第二，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素养。政治上的清醒，来自理论上的坚定。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深厚的理论积淀，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把握和深切认同，就难以穿越历史和现实的重重迷雾，从而陷入真假难辨的是是非非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sup>[5]</sup>毛泽东也曾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sup>[6]</sup>因此，只有在自觉的专业理论学习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才能破解现实中的重重迷雾。第三，要具备深厚的育人情怀。“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sup>[7]</sup>思政课

教学要教给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要入耳入脑入心，需要思政课教师具有真心热爱思政课教学的教育情怀。思政课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家国是思政课教师汲取不竭力量和养分“大地母亲”，家国情怀是思政课教师深厚情怀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政课教师要“保持家国情怀，心里装着国家和民族，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取养分、丰富思想”<sup>[9]</sup>。同时，思政课教师还应具有开阔的人类情怀，既要帮助青年大学生厚植家国情怀，也要帮助学生拓展国际视野，引导他们做有深厚家国情怀、开阔天下情怀的时代新人。

## 二、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难点剖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思政课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思政课教师队伍规模和素质稳步提升，形成了一支有情怀、有本领、有担当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了重要力量。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党和国家对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键课程的期待相比，与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求相比，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中还存在诸多亟待改进之处，如教师选配和培养方面存在不足、师资结构有待优化、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等，这些问题也正是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中亟待攻克和突破的难点与瓶颈。

### 1. 师资配比达标压力大，存在降低质量门槛的“一刀切”现象

充足的思政课教师数量和师资队伍规模是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的前提和基础。作为面向全体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公共必修课，思政课教学的课时多、任务重、要求高，对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有着明确要求。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学校重视投入程度不等、学校办学条件不同，特别是部分学校存在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编制超标等现实困难，不少学校难以达到

中央和教育部文件要求的1:350的师生配比，有的学校思政课教师缺口甚至超过规定数量的半数。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先后出台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思政课教师队伍配比达标的相关文件和具体政策要求，各高校积极贯彻落实教育管理部门要求，制定本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案，在编制计划等方面向思政课教师队伍倾斜，通过引进人才、转岗专任、聘用兼职教师等途径快速扩充思政课教师队伍，一大批学校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思政课教师队伍的配比要求。截至2020年11月，登记在册的全国高校思政课专兼职教师总数突破10万人大关，有力缓解了思政课教师数量不足的压力。

随着思政课教师数量规模的快速提升，部分学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又出现了结构失衡、质量参差不齐等新问题。一些学校通过大批转岗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在数量上快速充实了思政课教师队伍，但从学科背景、专业基础、思政课教学经验、投入时间精力等方面看，部分转岗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思政课教学的要求，更难以胜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专业任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短时间内大批量集中引进、快速补充思政课教师队伍，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教师队伍的结构失衡，影响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导致教师在职称评聘、评奖评优等环节竞争压力加大，极易对学院可持续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 2. 传统教育评价导向惯性大，存在教学与科研之间“顾此失彼”现象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教师的两项主要工作任务，合理统筹兼顾教学与科研两个方面的任务要求是所有高校教师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价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将决定高校教师能否正确对待教学、全力投入教学。由于科研成果相对易于量化而教学质量和效果则不易测评等原因，在长期以来

的教育评价体系中,重科研、轻教学仍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会导致部分教师将科研看作“自留地”、将教学看作“公家田”,在科研上全力以赴、在教学上勉力应付的现象发生。实际工作中,在科研上投入更多时间、精力的教师往往在职称晋升、导师遴选、评奖评优等方面更占据“显性”优势;在教学上投入多的教师则因“显示度低”“收益率低”而比较“吃亏”。这样的现实状况进一步强化了重科研、轻教学的不良倾向。思政课教师承担大量的公共课教学任务,且思政课教学本身集政治性、思想性和生活性于一体的特点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思政课教师往往承担着高于其他课程教师的教学压力,这在客观上导致思政课教师面临的教學要求与科研任务之间的矛盾较其他专业教师更为突出。虽然近年来政策导向在不断纠正和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但政策的落实落地仍处于过程之中,将上好课作为第一天职、科研必须服务于教学的理念尚未得到绝大多数思政课教师自觉自愿的认同和践行。

### 3. 队伍建设进入接棒区,存在中青年骨干教师重点培养中的“揠苗助长”现象

思政课教学是一项攸关党和国家千秋伟业的“灵魂工程”。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既是思政课教师队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也决定了思政课教学能否担负起“共和国精神国防”的职责和使命。从目前思政课教师队伍现状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者已陆续进入退休阶段,“70后”“80后”成为思政课教师队伍的主力军,“90后”成为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新生力量。一方面,一批中青年思政课骨干教师在党和国家的着力培养支持之下茁壮成长,在教学、科研方面崭露头角,逐渐成为思政课教师队伍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相较于“40后”“50后”“60后”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70后”“80后”“90后”等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青年思政课教师也暴露出一些不符合思政课教学要求的短板。例如,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多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等本学科基本功训练方面不够扎实;未经受过大的风

雨历练而思想简单、政治敏锐性不强、政治站位不高,不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缺乏对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史的深切体验和理解,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知认同不够深切,等等。如何帮助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新生代”顺利接棒?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各高校多措并举助推中青年骨干教师成长,积极为广大青年教师创造发展机遇、搭建成长平台,新生代思政课教师在思想政治素质、专业理论修养、教育教学能力方面获得显著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多举措积极助推、重点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成长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中青年教师平台过多、荣誉过多、任务过重的现象,导致部分中青年教师或流于功利浮躁,或疲于奔波应付,反而缺失了甘坐冷板凳、静心求学问教的扎实教风学风。长此以往,难免出现背离初衷而“揠苗助长”的消极影响。

## 三、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着力点

结合当前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瓶颈问题,聚焦思政课教师的核心素养,应着力从如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 1. 立足学校实际,量质兼顾,既要配齐更要建强

没有规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就缺乏基本的人力支撑;没有质量,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规模就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在思政课教师队伍配备过程中,既要按照规定的基本师生配比要求,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数量和规模保障;同时,还要避免仅仅着眼于完成任务、应付督查的数量上的“配齐”,确保这支队伍在内涵提升、持续发展质量上“建强”。应根据各校具体问题和实际情况,实行“一校一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配备计划和方案。

一方面,各高校应充分认识思政课教学之于党和国家事业的特殊重要性,之于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自觉将思政课教师队伍配比达标作为一项对党

和国家负责的重要政治任务来落实,在编制、指标、职称、评优等重要环节给予重点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时刻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提升和内涵发展放在首位,防止“一刀切”的“懒政”思维,从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职称结构等多方面统筹考虑,从思政课教师队伍发展的当下实际和未来着想,切忌以形式上的机械完成任务而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留下未来发展的障碍和隐患。

## 2. 着眼核心素养,内外兼修,综合提升教学水平

思政课教师个人要加强在政治素质、理论素养、教学能力和师德师风等方面的自我修养和锤炼。对思政课教学的真心热爱是做好思政课教师的基本前提。思政课教师应树立正确的职业认同感、责任感、荣誉感,始终保持在思政课教学研究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特别是要正确认识教学和科研的内在一致性,树立科研服务教学、支撑教学、提升教学的大科研观,以及教学指引科研、教学激发科研、教学检验科研的大教学观,在相辅相成的教学科研观指引下潜心教学研究,切实提升个人的专业理论素养和教学能力水平。其中,深耕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原理、夯实专业理论基础是关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批判堪称用彻底的理论来透彻地解读现实问题的典范。“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sup>[9]</sup>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地揭穿“自由”“平等”“民主”的虚伪面纱,正是基于他们在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理论上的彻底性。

同时,从教育的角度讲,学校、学院要着眼于增进和激发思政课教师的内生动力,通过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在高校形成重视教学、鼓励教学、以教学为重为荣的

正确教育评价导向,通过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激励思政课教师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教学,自觉开展深度教学研究,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创新,关心学生成长成才,努力做学生青春成长的领航员和护航人。

## 3. 抓好“接棒区”, 新旧相接, 科学助推青年教师发展

思政课教学不能仅仅依靠少量的领军人物和教学名师,“一花独放、一枝独秀”难以实现思政课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整体提升。能否建立合理的教师梯队和优秀的教学团队,是影响甚至决定思政课教师队伍全面发展、持续发展的关键。

抓好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当前,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进入新陈代谢的“接棒区”。如何科学设置“接棒区”,确保“接棒区”不掉棒,是决定思政课教学事业后继有人的重大课题。在近几年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交接时期,抓好思政课教师的梯队建设,是一项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的关键工程。既要把好思政课教师遴选的入口关,又要设置不合格教师的淘汰机制,更需要加强思政课教师的培养培训和过程管理。特别要着眼于当前思政课教师队伍进入新陈代谢的“接棒区”的关键时期,通过设置科学有效的接力机制,采取为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配置导师,大胆使用、大力助推中青年骨干等举措,实现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有序代际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要积极倡导正确教育评价导向,培育优良学风教风,引导中青年骨干教师健康成长、可持续发展。

抓好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团队建设。如果说梯队建设主要着眼于思政课教师队伍的“纵向”传承发展,团队建设则是重在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横向”协同发展。“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证明,思政课教师个体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团队环境。优秀的团队环境可以大大激励和助推青年教师的成长。以团队建设带动个体的健康成长和快速发展,是一项行之有效而又“经济实惠”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举措。优秀教师团队建设是一项涉及多方面因素的系统过程,其中,团

队带头人的培养是关键。加强团队领军人物的培养,可收到“提纲挈领”之效。此外,近年来许多学校通过集体备课、集体教学攻关等途径,在思政课教师团队建设方面开展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也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思政课教学是一项有挑战、有意义的事业,思政课教师是一个光荣、神圣的称号。只要精准把握新时代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正确方向目标,紧紧抓住思政课教师核心素养培育这个关键,着力突破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难点和瓶颈,就一定能打造一支优秀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切实提升新时代思政课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图伟业。

-----

**参考文献:**

[1] [2] [3] [4] [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30.

[5]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9-10. 179-180.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33.

[7] 亚米契斯. 爱的教育 [M]. 夏丏尊,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1-2.

(责任编辑 吴潇剑)

## Difficultie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Feng Xiujun*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s the key course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key to run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well lies in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moral education, deeply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and bottlenecks, accurately grasp the focus and breakthrough,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chool, focus on the cor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take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into account, combin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aining, and strive to cultivate a strong teaching team of “credible, respectable, reliable, happy, courageous, promis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Key words:**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eachers; Team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Key points

# 深化新时代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改革的若干思考

刘宏达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改革, 必须把握其本质任务是立德树人评价, 其基本特征是更高质量评价。同时, 以高校现有各级各类评价活动在目标整合、主体协同、机制完善、方法创新、价值提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导向, 进一步优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改革的策略选择, 包括明确从制度到能力的评价理念、规范从分散到整合的评价机制、完善从规定到自主的评价标准、创新从传统到现代的评价方法等。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 立德树人评价; 教育评价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1-0023-08

学  
员  
论  
坛

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 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传统视角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主要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各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成效等进行评价, 有着相对独立的评价目标、内容和形式等, 其与高校其他方面的工作评价共同构成高校教育教学评价的多元体系。立足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sup>[1]</sup>, “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sup>[2]</sup>。而这必然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提出变革要求, 使之贯穿于高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渗透于其他业务工作评价之中, 并居于首要地位, 发挥引领作用。2020年5月,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 明确要求在“健全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等目标之下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估督导体系。2020年10月, 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更加完善”“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等教育评价改革要求。因此, 从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高度来准确把握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本质、特征与改革进路等,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一、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本质任务是立德树人评价

现代教育评价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强调以教育目标为核心进行教育工具测量、教育绩效评估、教育价值判断、教育质量改进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作为高等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始终围绕立德树人这一高校党委

收稿日期: 2020-12-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17BKS127)

作者简介: 刘宏达, 男,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34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管党治党、治学办校的核心目标而展开。首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统筹协调高校各项工作的根本规定，思想政治工作贯穿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制度建设体现着对这一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其次，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是推动形成高校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工作格局的实践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推动自身创新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关键能力是落实这一实践要求的重要前提和支撑。最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际成效”是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最终落脚点，对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的评价最终归结于对立德树人成效的评价。从这个角度看，对高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际成效等进行评价，就构成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本质任务。

### 1. 对高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制度建设进行评价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高校的根本政治制度，而作为这一根本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工作，负有以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来统筹推进和科学评价各项具体工作制度建设的职责。其中，在制度评价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高校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进行评价。即对高校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办学方向，是否始终做到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否扎根中国大地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等进行评价。二是对高校如何建设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制度进行评价。即对高校是否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环节，是否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否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等进行评价。三是对高校如何完善党的建设基本制度进行评价。即对高校是否按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要求来建设领导人员队伍，是否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否做到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等进行评价。四是对高校如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制度进行评价。即对

高校是否坚持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线上思政与线下思政同向同行，是否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防线与师德师风建设底线等进行评价。

### 2. 对高校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关键能力进行评价

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家庭、高校，以及高校广大师生共同提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能力。而对这一关键能力的评价，既不能泛化为对各项具体工作能力的评价，也不能狭隘地限定于对高校人才培养能力或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等的评价。思想政治工作对高校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关键能力进行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对高校立德树人的思想引领能力进行评价。即评价高校是否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目标、将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否通过加强政治引领、理论引领和思想引领等工作，使广大师生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等。二是对高校立德树人的全环节融入能力进行评价。即评价高校如何将立德树人有效地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在“六个下功夫”上发力，培养学生具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和精神状态等。三是对高校立德树人的全体系贯穿能力进行评价。即评价高校如何将立德树人贯穿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建设之中，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形成对高校立德树人的话语主导和学理支撑等。四是对高校立德树人的跨领域衔接能力进行评价。即评价高校如何将立德树人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构建大中小各学段相衔接的一体化育人机制，如何增强家庭、学校、政府与社会的育人合力等。

### 3. 对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际成效进行评价

思想政治工作对高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制度和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关键能力进行科学评价,有机地统一于对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际成效评价。一方面,制度建设评价与关键能力评价要做到相互衔接和相互促进。制度建设评价是关键能力评价的前提基础,侧重于对政策设计和制度制定的标准化评价;关键能力评价是制度建设评价的具体深化,侧重于对政策执行和制度实施的实效性评价。只注重制度建设评价,容易使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活动流于表面甚至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只注重关键能力评价,容易陷于具体表象,从而缺乏对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本质任务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制度建设评价与关键能力评价统一于高校“立德树人成效是根本标准”这一要求之中。以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以及具有新时代基本素质和精神状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目标,既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实际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又加强对高校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育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等方面的教育工作进行科学评价,坚决克服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倾向。从坚持制度建设评价到坚持关键能力评价再到育人成效评价,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从静态现状评价向动态发展评价、从结果定性评价向过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评价、从治理体系评价向治理能力评价等的不断深化。

## 二、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基本特征是更高质量评价

立德树人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根本要求、根本价值,贯穿于高校各项具体工作的评价活动之中,其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评价体系。赋予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以立德树人评价的本质任务,并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通过对现有各项评价活动进行整合、规范、改进、提升等,使之与更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在目标上更加衔接、在形式上更加协同、在内容上更加互补,从而突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评价具有更高质量的基本特征。其中,通过“整合”提高评价设计的整体性,通过“规范”提高评价活动的有序性,通过“改进”提高评价资源的共享性,通过“提升”提高评价结果的价值性等。

### 1. 更加强调评价设计的整体架构

在全面梳理涉及高校党委管党治党、办学治校各项评价政策和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进行整体性设计,包括对明确整体评价目标和分项评价目标、系统评价指标和分类评价指标、一定时间内评价活动的整体安排与分步实施等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既要始终突出评价的价值目标,如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列为各级管理部门、各类管理岗位、各个工作主体的首要职责加以评价等;又要不断形成以整体评价设计来统筹和协调分层分类评价活动的工作格局,使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师风建设等“软要求”评价与各项具体业务工作的“硬约束”评价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补互促关系,避免出现任何形式的“两张皮”评价倾向。

### 2. 更加强调评价活动的有序推进

根据综合评价的要求,“对全部评价对象在现在或将来的某一时间节点或某一时间段内的性能、业绩或效能等进行综合评判,根据评判的结果对全部评价对象进行排序和优选”<sup>[9]</sup>。无论是各级党委政府对高校的评价,还是高校对内部的评价,都要以整体性思维克服条块分割的管理局限性,特别是在推进分类评价活动时,既要做到按照“轻重缓急”的程度进行合理安排,使之与高校教育教学在时间和节奏上保持高度的协调性;又要根据整体性设计对一些评价活动进行流程再造和适度地归并简化,在合理减负的基础上提高评价的效率,做到形式更加简捷、过程更加优化、成效更加务实。

### 3. 更加强调评价资源的共建共享

立足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评价资源获取、管理与利用,加强整体评价和分层分类评价的共享性资源建设,既以整体性评价资源建设来促进分层分类评价的整合利用,又以分层分类评价资源建设来促进其相互之间的开放共

享等。这一方面要求各级各类评价主体要根据各自的评价需求,以先进的评价理念、评价手段等加强对评价资源的标准化建设和有序性开放共享,使有限的评价资源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另一方面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高校要加强信息化基础平台建设,不断提高各项工作的信息化管理水平,使数字化资源能够成为打破管理与评价“信息孤岛”“信息碎片”等困境的“石油资源”“自由资源”。

#### 4. 更加强调评价结果的价值利用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是一项政治性任务,同时又是一项具体性工作,在特定时空环境下有着具体的工作目标。只有坚持对每一次评价目标的落实,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简单评价、重复评价、低效评价甚至是无用评价等问题。更高质量地推进高校立德树人评价,既要通过运用评价结果来促进主体责任的落实与追究,从而促进他们切实解决当前高校评价中已经发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又要通过对已经或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研判和分析,来为各级党委政府、高校及师生员工提高管理素质和工作能力提供助力。

### 三、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改革的问题导向

以立德树人为中心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价体系,是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由于“高等教育评价的实质是治理”<sup>[4]</sup>，“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在于形成高效能、高效率、有公平、有秩序的新教育格局”<sup>[5]</sup>，因而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既要“反对评价的‘管理主义’倾向，让教育评价成为协商、对话、相互理解及合作建构教育意义的过程”<sup>[6]</sup>；又要“着眼于‘问题中心’，以‘多元分层’作为价值原则，秉持‘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sup>[7]</sup>，不断解决自身评价与各项具体工作评价之间在目标聚合、主体协同、机制贯通、方法创新、价值共享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 1. 评价目标有待进一步整合

当前涉及高校的分层分类评价主要有党的

建设评价、思想政治工作评价、学科建设评价、人才培养评价、教师人才和科研项目评价、师德师风评价、领导干部作风评价等。从总体上看,这些评价活动虽然从不同层面对高校是否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行评价,但并没形成彼此之间高度的目标聚合性。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高校的工作评价侧重于对具体工作的督导检查,而高校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评价停留在提建议或意见的层面,二者在如何解决具体问题和提升工作质量上的目标并不明确,一定程度上存在“为检查而检查”“为提意见而提意见”等形式主义倾向。同时,由于评价活动的数量繁多、形式繁杂、体系分散等问题,使众多的评价活动成本高昂,“不仅需要相当的财力投入,而且让迎评者投入了巨大精力,甚至影响了正常工作的有序展开”<sup>[8]</sup>。

#### 2. 评价主体有待进一步协同

现代评价“必须理顺多元主体的功能与定位”<sup>[9]</sup>。对高校的评价有着多种层级,如有各级党委政府对高校的评价、社会机构对高校的评价、高校党委对内部基层单位的评价等,因而也表现出评价主体的多元性特点。但从这些不同评价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存在着力量不协同、作用不到位等问题。如从各级党委和政府看,教育部门与人事部门、财政部门等评价主体之间存在着政策理解和制度执行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一些高校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上面临的编制不充足、待遇不落实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从高校内部看,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与教学管理部门、科研管理部门等评价主体之间同样存在政策理解和制度执行上的差异,从而导致“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在一些高校评价中仍然难以得到根本性改观。

#### 3. 评价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现代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包含了全面立体的问题诊断、目标设定、路径选择、深入执行、实时监测、效果验证等环节的长期动态的系统工程”<sup>[10]</sup>,需要构建和完善长效机制。当前高校的评价机制主要以从上至下的评价和由外至内的评价为主,其中从上至下的评价主要是

各级党委政府对高校、高校对内部基层单位等的评价，如政治巡视、专项巡察、专项督查、日常检查等；从外至内的评价主要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高校借助第三方力量进行的同行评价、专业评估等。一方面，这些不同评价活动由于评价的侧重点不同，对一些相同或相近评价内容进行的评价存在着资料利用的简单化、评价结论的片面化甚至是相互冲突等问题，从而带来不同评价活动之间的内容重叠、形式重复等问题；另一方面，现有的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弱化从下至上、从内至外评价功能的倾向，从而带来政府评价的权威大而高校评价的自主性小，以及评价的程序性强而师生参与评价的获得感低等问题。

#### 4. 评价方法有待进一步创新

评价结果能否做到客观与精准，与评价方法是否科学密不可分。近年来，虽然涉及高校的评价在方法上不断改进，如逐渐由以资料评判和数据分析为主的评价方式，向现场答辩、随机考察、问卷调查、个别谈话等方法多样的综合利用进行拓展，但仍然存在方式方法上的不适应问题，特别是存在对现代信息技术方法利用不充分等问题。一方面，一些评价活动存在方法的简单性利用问题，如考察领导是否重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主要通过查阅会议纪要、文件材料、活动报道等，不利于高校“文山会海”“填表制表”等形式主义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一些评价活动过分倚重传统的定性评价方法，如对某个阶段的工作进行评价，主要通过听取工作汇报、分析工作总结、检查工作台账等，既没有突出对同一项工作进行绩效数量上的递进性评价，也没有实现对不同工作进行要素质量上的联结性评价，这就为“运动式评价”“应景式评价”“走过场式评价”等片面性倾向提供了空间。

#### 5. 评价价值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根本上说，评价改革并不是教育制度改革的目的和终点，其“只是一个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为教育活动与教育对象提供各类符号性、参照性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以此指挥并引导教育教学的正向改进、正向发展”<sup>[10]</sup>。高校现

有的评价存在“重问题判断、轻发展指导”的倾向。一方面是一些“老大难”问题虽然能够在不同的评价活动中被发现，但由于不重视对评价结果的运用，从而导致“以评促改”的主体责任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落实；另一方面是一些“新问题”在评价活动中未能被识别或评价，从而导致“以评促建”在发展指导上出现“盲区”。如高校设立学生工作部（处），并充分发挥其在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专业化建设以及协调校内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被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近两年来，极少数高校将这一机构与教务部门在人员和职能上进行实质性合并，对此似乎很难判断这到底是属于高校机构自主改革的“新方向”，还是属于违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基本规律的“新问题”，迫切需要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识别判断能力和发展指导价值。

### 四、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改革的策略选择

适应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教育评价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正在从‘对教育的评价’向‘促进教育的评价’转变”<sup>[12]</sup>。因而，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改革，也要从“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价”向“促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评价”转变，既以整体性评价促进“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制度建设评价由“虚”变“实”，又以分层分类评价促进“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关键能力评价由“弱”变“强”，并最终促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成效评价由“软”变“硬”，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高校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 1. 从制度到能力：明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理念

当前对从“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到“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进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工作评价，需要树立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理念。一是坚持“政治为先”的制度

评价导向。即涉及高校党委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各项工作制度评价,必须以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制度建设为首要评价前提,将之始终贯穿于各级党委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工作评价、高校教育教学的成效评价、教师和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大中小各学段相衔接“一体化”育人机制建设的成效评价、“政府-社会-家庭-高校”共育机制建设的工作评价之中。二是坚持“求真务实”的能力评价目标。即涉及高校党委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各种工作能力评价,必须以提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能力为底线评价目标,将之具体细化到全员育人各个主体的育人职责评价、全过程育人各个环节的育人要求评价、全方位育人各种要素的育人作用评价之中。三是坚持制度建设与能力提升并重的综合评价理念。即涉及高校党委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各类工作质量评价,必须坚持从制度建设评价到关键能力评价的综合评价理念,切实推进政策理解水平评价与制度执行能力评价相结合、工作现状考察评价与创新发 展指导评价相结合、解决共性问题评价与解决个性问题评价相结合。

## 2. 从分散到整合:规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机制

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需要建立科学的工作机制,将高校各教育要素按照教育及人才成长的内在逻辑紧密结合,形成相互支撑、合理分布的制度框架”<sup>[13]</sup>。适应这种科学工作机制的建设,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也应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机制,将当前各级党委政府对高校进行的评价、高校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内部进行的评价、学生和家长对高校及各级党委政府进行的评价,以及社会第三方力量对各级党委政府、高校、教师、学生等进行的评价,由形式分散进行制度整合,使之定型为更具有高校治理现代化的特征。一是整体优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体制机制。在整体评价方面形成以高校主管单位为主导的评价机制和以高校为主导的自评机制,既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整体评价的内容体系,又结合高校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合理设计整体评价的方式、时间和

频率等;在分层分类评价方面形成与各项具体工作紧密结合、有序推进的评价机制,既注重通过流程再造来加强对整体评价结果的利用,又注重通过方式联结来加强相互之间的评价资源共享,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评价形式和重复评价。二是科学制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管理规范。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应妥善处理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以及正确指导高校处理好内部治理的关系、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评价政策与制度,使各育人主体之间相互评价更具有保障性和约束性;另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和高校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具体制度建设,包括评价活动的制度化安排、评价过程的制度化管理、评价结果的制度化运用,既要 以制度建设来约束参与评价的工作对象,又要以制度管理来规范组织和实施评价者的行为。三是努力形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机制与评价机制的合力。现代化的管理过程与评价过程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各级党委政府和高校应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过程管理与质量评价的统一协调性,一方面在制定各项具体工作制度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制度贯穿,从而将各项具体工作的实施过程转变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价过程;另一方面在对各主体进行职业素养能力培养培训中,同步加强参与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素养与能力的提升,特别是注重运用评价的要求与结果来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能力。

## 3. 从规定到自主:完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标准

现代化评价离不开科学的标准,特别是高校之间存在着校情、地情的差异性,更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标准化体系建设,既要建设具有规定性的质量标准,使之成为高校的普遍遵循与最低标准;也要建设具有自主性的质量标准,使不同高校的工作特色能够得到充分彰显。一是统一规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国家标准。即以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政策制度以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为依据,对各部委制定和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进行全面梳理和规范,既使之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路径上更加明确,

能够形成制度执行的合力；又使之更加丰富，能够有效对接高校的实际需要，不留评价的“死角”“盲区”。二是鼓励创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区域标准。即各省（区、市）党委政府以执行国家标准为最低评价标准，同时充分结合各自的区域性优势，创造性地制定各省级的高校立德树人评价的特色化标准体系，细化和丰富国家标准，使之更具权威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同时构建指导高校发展和为高校解决困难的长效机制及其评价标准，如建立地方党委领导主抓高校立德树人的制度化工作机制及其评价标准、建立地方各部门协同解决高校立德树人具体问题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及其评价标准、建立地方促进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的政策性激励机制及其评价标准。三是自主创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学校标准。即各高校以执行国家标准和区域标准为最低评价标准，具体制定符合各自校情、更加富有创造活力的个性化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标准。如高校可遵照相关政策要求，自主制定“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和“十大”育人体系质量提升工程等的实施细则和评价标准，自主出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管理考核标准和奖励激励办法。此外，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标准的制定中，国家标准、区域标准和学校标准三者之间应保持适度的张力，即学校标准要适度地高于区域标准、区域标准要适度地高于国家标准，而不是相反，从而为以评价驱动政策创新提供实践依据。

#### 4. 从传统到现代：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方法

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方法创新过程。“方法创新是建立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教育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sup>[14]</sup>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更是需要将传统的评价方法优势与现代信息技术高度融合，不断增强评价方法创新的针对性和时代感。一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传统方法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传统方法，是以定性评价为主、以定量评价为辅的方法综合体。适应现代化评价的系统

性特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需要以系统科学方法促进传统方法的创新，将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看作一个大的系统，借鉴系统科学方法的整体性、关联性、互动性等评价优势，加强对高校立德树人的系统特征变化、系统要素联结、系统环境影响等进行综合评价，既提高定性评价的客观性，又提高定量分析的全面性。二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网络方法创新。一方面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传统方法创新借助网络空间和网络技术优势来予以实现，使传统评价方法在资源的获取、数量的呈现、信息的传递等方面实现技术形态的创新，如形成网络调查方法、网络评价方法等；另一方面借助与网络方法的融合创新，形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新的方法，如网络情景模拟评价法、网络数字化评价方法等。三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的大数据方法创新。大数据评价方法是继定性评价方法与定量评价方法之外新的评价方法，其优势一方面在于打破传统的“小样本”评价方式和因果思维，依靠“数据+算法”从“大样本”分析中辨识出更多有效的、新颖的、潜在的价值信息，从而实现更为精准的整体性、相关性和趋势性评价；另一方面在于能够借助“数据+人工智能”对评价的过程和结果分析进行程序化设计与智能化利用，从而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方法由传统的人工模式向智慧化模式转变。

#### 参考文献：

- [1]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 (1).
- [2]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N]. 人民日报, 2018-09-11 (1).
- [3] 彭张林, 张强, 杨善林. 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综述 [J]. 中国管理科学, 2015 (11): 245-256.
- [4] 刘振天. 完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提升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J]. 大学教育科学, 2020 (1): 37-42.

[5] 蒋庆荣, 王彩波. 中国教育治理的政治学阐释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 (9): 94-97.

[6] 李雁冰. 论教育评价专业化 [J]. 教育研究, 2013 (10): 121-126.

[7] 王海涛, 董玉雪, 于晓丹, 等. 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价值建构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7 (1): 103-108.

[8] 闫光才. 谨慎看待高等教育领域中各种评价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9 (1): 1-4.

[9] 黄小芳.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水平评价的理论及实践探索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9 (9): 239-246.

[10] 李玲, 黄宸, 韩玉梅. 教育体制综合

改革: 理论、路径与评价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6): 80-88, 190-191.

[11] 李鹏. 评价改革是解决教育问题的“钥匙”吗? ——从教育评价的“指挥棒”效应看如何反对“五唯” [J]. 教育科学, 2019 (3): 7-13.

[12] 张娜. 从对教育的评价到促进教育的评价——教育评价国际研究进展综述 [J]. 基础教育, 2017 (4): 81-88.

[13] 谭秀森. 论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机制 [J]. 思想教育研究, 2013 (11): 51-54.

[14] 林梦泉, 任超, 陈燕, 等. 破解教育评价难题 探索“融合评价”新方法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9 (12): 1-6.

(责任编辑 刘红)

## Thoughts on Deepening the Evaluation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Liu Hongda*

**Abstract:** To deepen the evaluation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we must focus on its essential task that is to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its basic feature is higher quality evaluation. At the same time, guided by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all kinds of evaluation activities at all level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aspects of goal integration, subject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improvement, method innovation and value promotion, further optimize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evaluation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clarifying the evaluation concept from system to ability, standardiz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from decentralization to integr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from regulation to autonomy, and innovate the evaluation methods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etc.

**Key words:** The evaluation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e evalu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Education evaluation

# 加入 WTO 二十年来 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

孙霄兵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 加入 WTO 二十年来, 在主动与 WTO 规则相接轨的探索中, 中国在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跨境交付、自然人流动方面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在政策下的教育服务贸易都得到了促进和发展。具体表现为境外消费政策日臻完善, 留学教育规模显著增长; 商业存在政策不断优化, 合作办学水平实质推进; 跨境交付政策渐趋规范, 在线教育供给潜力巨大; 自然人流动政策科学谋划, 人员流动实现双向互动。近年来, 中国教育开始了对 WTO 规则的超越, 进行了重点政策发展和创新, 表现在境外消费方面是拓展留学空间, 实施弹性学历认证; 在商业存在方面是规范中外合作办学, 积极探索境外办学; 在跨境交付方面是持续摸索试点, 扩充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在自然人流动方面是设置多元化资助, 打造“留学中国”品牌。针对中国教育在基于 WTO 规则发展中存在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学历互认国家偏少等问题, 对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及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与展望: 加紧完善基于 WTO 规则的法律体系; 增强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供给能力;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兼与国际接轨的教育质量监管框架。

**关键词:** WTO; 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发展成就; 政策创新

**中图分类号:** G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1-0031-09

## 一、加入 WTO 对中国教育的历史机遇

2001 年,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以下简称 WTO)。在 WTO 框架下, 中国教育进一步融入世界教育体系。一方面, 由于教育在中国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 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下, 加入 WTO 有助于加速中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 创造一个公开、透明、符合国际规则与要求的教育法治环境, “从程序和实体等方面全方位地推进依法行政, 使教育改革和发展走上法治和效率的轨道”<sup>[1]</sup>; 同时, “通过大胆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先进教学内容、方法和管理经验, 促进我国短缺薄弱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提高我国教师水平和教育质量, 增强我国教育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sup>[2]</sup>。另一方面, 根据 WTO 框架

收稿日期: 2020-10-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5 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法治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路径和机制研究”(VEA150004)

作者简介: 孙霄兵, 男,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研究院院长, 主要从事宏观政策、教育法学、国际教育研究。

下《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以下简称GATS)中的规定,国际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主要有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跨境交付、自然人流动四种。由于教育属于WTO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一类,这四种提供方式自然也包括教育领域。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下,境外消费应用到教育领域即出国留学教育和来华留学教育;商业存在应用到教育领域即中外合作办学;跨境交付应用到教育领域即远程教育;自然人流动应用到教育领域即境外专家与教师来华工作和孔子学院公派汉语教师及志愿者出国工作。中国在加入WTO后,这四种提供方式在教育领域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推进。在当前部分国家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内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双重背景下,梳理中国加入WTO二十年来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及其发展显得尤为必要。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和现实考量,利用教育部2000年之后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文本和教育年鉴数据对中国教育加入WTO以来取得的实际成效进行总结梳理,以期对相关研究提供助益。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加入WTO时各国的教育承诺不同,中国与它们并没有处在同等的政策范围内,而且很多教育大国没有承诺商业存在,因此不具备国际可比较性,所以本研究不涉及国际比较,主要聚焦WTO规则下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在政策下所取得的实际教育发展。

## 二、二十年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发展

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将加入WTO的规则、承诺转化为国内法。在主动与WTO规则接轨的探索中,中国在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跨境交付、自然人流动方面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在这些政策下的教育服务贸易都得到了促进和发展。

### 1. 境外消费政策日臻完善,留学教育规模显著增长

境外消费涉及出国留学教育和来华留学教

育,境外消费政策也相应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出国留学教育政策方面,教育部从2002年11月起废除了向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和出入境管理机关开具的《自费出国学习审核证明信》的制度。这一境外消费壁垒的清除不仅兑现了中国在加入WTO时所承诺的对境外消费教育服务提供方式不做任何限制的承诺,而且也极大地方便了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同时,为奖励品学兼优的自费留学人员,中国政府从2003年起设立了“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并首先在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试点。另外,为了帮助广大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正确选择外国学校,引导留学人员接受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维护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教育部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筛选并通过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和中国留学网向社会公布了54个国家一万多所学校名单,为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全面了解境外学校的办学能力、办学水平等实际办学情况提供了指导。针对中国自费出国留学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中国政府还建立了留学预警机制,及时发布留学预警信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快新时期留学事业发展,提高留学教育质量,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关于出国留学教育进一步提出“通过完善‘选、派、管、回、用’工作机制,规范留学服务市场,完善全链条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优化出国留学服务”的具体举措。在经历一系列政策调整后,中国的出国留学教育最终形成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工作方针和“选、派、管、回、用”的工作机制。在来华留学教育政策方面,与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相匹配,加入WTO后中国对境外来华留学提供了支持并予以相应的配套服务。其中,为优化来华留学管理工作,吸引更多留学生来华留学,教育部先后颁发了《关于加强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留华毕业生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试行普通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新生学籍和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电

子注册的通知》等文件，来华留学的管理制度不断得到完善。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与《留学中国计划》先后发布，推动来华留学规模继续扩大和来华留学教育持续健康发展。2016年，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来华留学教育在进一步打造“留学中国”品牌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2018年，教育部颁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活动，提高高等学校来华留学生的管理服务水平和教育质量。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提出要打造来华留学重点项目和精品工程，多措并举推动来华留学实现内涵式发展，做强“留学中国”品牌。<sup>[3]</sup> 在经历一系列政策调整后，中国来华留学教育最终形成了“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工作方针。

伴随着中国在境外消费方面政策的逐步完善，中国境外消费在规模方面实现了显著增长，在留学国别和人员类别方面的结构保持稳定。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留学规模看，根据教育部官网历年发布的出国留学人员数据统计，2000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仅为38 989人。加入WTO后仅一年，2002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就超过10万人，之后出国留学教育规模更是稳步扩大，2009年超过20万人，2011年超过30万人，2013年超过40万人，2015年超过50万人，2017年超过60万人，2019年达到70.35万人。从2000年到2019年，出国留学人数年均增长约16%。中国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与此同时，来华留学规模在加入WTO以后也不断扩大。2000年来华留学人员仅有52 150人，到2018年已增长到492 185人，年均增长约13%。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留学目的国。

第二，从留学国别来看，加入WTO后，中国出国留学目的国地区分布相对集中，超九成留学人员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0国，其

中赴英语国家的留学人员占近八成（77.91%）。<sup>[4]</sup> 加入WTO后，来华留学生源国相对稳定，根据教育部官网历年发布的来华留学人员构成数据和《中国教育年鉴》数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8年，韩国一直呈现领跑态势，稳居来华留学人数第1位；美国和日本在2012年之前一直处于来华留学生源国第2位和第3位；2012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引领，传统来华留学国家的留学生增长趋缓，而像泰国、巴基斯坦、印度等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增加明显。截至2018年，泰国、巴基斯坦、印度3国的来华留学人数已经超越美国和日本，跃居第2、第3、第4位。

第三，从留学人员的类别来看，根据教育部官网历年发布的出国/来华留学人员构成数据和《中国教育年鉴》数据统计，加入WTO的二十年间，得益于政策方面境外消费壁垒的清除，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占出国留学人员的比重一直稳定在90%左右。与此同时，来华留学自费生人数和获奖学金学生人数在来华留学人员中的比重较稳定，自费生约占九成，政府奖学金学生占一成。近年来，中国政府逐年加大对来华留学学生的奖学金数量和比例，政府奖学金已经成为吸引海外留学生的重要手段。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政府奖学金生只是指中国政府奖学金享受者，除中国政府奖学金外，中国还设立有中蒙、中坦、中埃和中印尼等13个专项奖学金，中美、中欧、中俄人文交流奖学金，以及各地省级、校级的奖助学金等。因此，在其余约90%的来华留学自费生中，他们也有很多机会可以享受到其他类别的奖学金。所以，来华留学生中能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远不止10%，只是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占10%。在来华留学教育中，多元助力的奖学金体系不断提升来华留学吸引力，引领来华留学教育向大规模、高质量发展。

## 2. 商业存在政策不断优化，合作办学水平实质推进

商业存在涉及的主要是中外合作办学。在商业存在政策方面，为积极履行加入WTO的

相关承诺,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于 2003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通过将中国的教育服务贸易承诺转化为国内法, 实现了 WTO 基本规则与中国教育服务承诺相衔接。该条例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性质、地位、方针、权利和义务等做出了明确规定。2006 年, 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性质、方针、政策导向、质量管理、项目管理、收费管理六个方面进一步细化了有关管理制度的措施, 对相关政策性问题的规定。2007 年, 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 引导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机构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外合作办学。2013 年, 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取消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校长或主要行政负责人审批手续, 并明确区分了办学机构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和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变更的手续, 这些变化进一步扩大了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人事自主权。2018 年, 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批准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终止的通知》, 此举标志着中外合作办学开始启动退出机制。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在不断修正中得到优化, 最终形成了“扩大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工作方针。

伴随加入 WTO 后中国在商业存在方面政策的不断优化, 中国的商业存在逐渐发展壮大, 在规模、水平及专业设置上实现了实质推进。在中国, 商业存在具体分为商业存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商业存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从规模来看, 截至 2020 年 9 月, 根据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数据统计, 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共 151 个, 其中, 本科及以上学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112 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共 1959 个, 其中, 本科及以上学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075 个。从合作的对象国与地区来看, 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方合作者主要来自经济发达、科技及教育先进的国家和地区, 中外合作办学水平较高。从学科类别来看, 加入 WTO 后, 中外合作办学引进的学科门类专业覆盖面广。中外合作办学开

设工商管理类专业的机构和项目最多, 总计 190 个。其次是经济学类 136 个、电气信息类 67 个、教育学类 60 个、外国语言文学类 36 个、医学类 31 个、艺术类 28 个。值得一提的是, 当前中国共有 13 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业存在。这 13 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业存在, 因其良好的办学效应, 正逐渐成为中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从这 13 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业存在的整体办学效果上看, 一是推动了中国高等学校吸收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渠道, 使中国的高校与境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成为制度, 吸引了一批优质教师来华任教, 引进了一批优质课程、教材、教育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 二是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高层次人才, 开启了中国高校与境外高校合作培养学士、硕士和博士的渠道, 提升了中国高校培养国际高层次人才的能力; 三是推进中国高校举办国际化大学的能力, 多元吸取了欧美国家举办高水平大学的经验。同时需要说明的是, 在加入 WTO 的承诺中, 所有大国, 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各国均未承诺允许外国教育机构的商业存在, 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承诺允许外国教育机构的商业存在的范例, 体现了中国教育对世界开放的信心和尺度。

### 3. 跨境交付政策渐趋规范, 在线教育供给潜力巨大

跨境交付的核心问题是交费问题, 因此为加强跨境交付的费用监管, 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结算和促进支付机构外汇业务健康发展, 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 明确了支付机构开展外汇业务时的多项管理要求。要求跨境支付机构应建立有效风控制度和系统, 健全主体管理, 加强交易真实性、合规性审核; 银行应对合作支付机构的相关外汇业务加强审核监督。之后不久,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加强了对跨境支付市场的规范监管, 并开始严厉打击无证从事跨境支付业务的行为。与此同时, 央行支付结算司于 2019 年 7 月约谈了部分无证从事跨境交付的第三方支付机构, 要求限期进行整改并解决其业务合规性。除此之外, 国家公

安部、海关总署等多部门联合打击非法跨境支付等违法违规外汇业务。可见,随着中国相关部门对跨境交付监管力度的加强和对违法违规跨境交付行为的严厉打击,跨境支付行业将变得更加规范。此外,为加强网络监管,保障网络安全,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

加入WTO后,跨境交付表现为中国政府和中國部分高等院校积极探索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高等院校进行远程教育合作以及中国知名高校开办远程教育课程并发展网上大学。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经教育部批准的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共计68所。这些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开设专业(方向)3000多个,在服务中国学习者的同时,部分院校也会以远程教育的方式招收境外的学生,目前已经形成了广覆盖、多途径、全过程、信息化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 and 以学习者为中心,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服务模式。同时,由于中国在WTO教育服务贸易承诺中对跨境交付方式不做承诺、远程在线教育在教育主权和教育资格互认方面的限制和不足,目前中国在跨境交付方面仍处于探索发展期。

#### 4. 自然人流动政策科学谋划,人员流动实现双向互动

自然人流动涉及境外专家和教师来华工作和公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出国工作,自然人流动政策也相应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境外专家和教师来华工作方面,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为促进人才引进,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等部门先后于2003年和2007年启动实施了“外国汉学研究学者短期访华计划”和“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2011年《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发布,其中指出要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特聘专家制度,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来华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推进高水平大学逐步建立全球公

开招聘制度;探索研究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提高高等学校聘任外籍教师的比例。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等部门先后发布《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管理办法》《地方所属高等学校聘请外国专家项目管理办法》《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实施与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境外专家和教师来华工作政策进一步明确强调高端项目的扶持引领和高水平师资的引进。在公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出国工作方面,2001年加入WTO后,教育部和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先后制定和出台《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管理办法》《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出国待遇暂行规定》《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出国待遇暂行规定》《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国际汉语教师培训大纲》《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外派汉语教师管理办法(试行)》《孔子学院专职教师队伍建设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保障和推动公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出国工作。这些文件政策涉及公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的选派、标准、管理、待遇、培训、考核、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内容,它们的陆续出台使公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的工作更加科学、有序和规范。

伴随着自然人流动政策方面的科学谋划,中国在自然人流动方面形成人员双向互动的局面。中国引进的境外专家与境外教师和派出的汉语教师与志愿者规模实现了双向增长。根据《中国教育年鉴》的历年数据统计,从2004年到2010年,教育部直属高校聘请的长、短期境外教师数依次为14 898人次、18 698人次、21 223人次、22 049人次、24 634人次、24 188人次、23 457人次。2011年,来华专家学者643人次。2012年,来华专家学者517人次。2013年,中国推动境外教师数据库及管理平台建设。2014年,全年共引进7名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境外专家和学者来华任教,推荐3名境外专家及家属在华取得永久居留权。与此同时,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发布的2006年至2017年的《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派出的汉语教师数从2006年最初的1004名逐步增加到2017年的8575名,派出的志愿者数也从最初的1050名增加到2017年的6306名。

综上,中国加入WTO二十年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得到了完善,中国教育服务贸易也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境外消费政策日臻完善,消费规模显著增长;商业存在政策不断优化,在规模、水平及专业设置方面实质推进;跨境交付政策渐趋规范,在线教育供给潜力巨大;自然人流动政策科学谋划,人员流动实现双向互动。

### 三、二十年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点创新

加入WTO二十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按照加入WTO时所做相关承诺推进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方式在教育领域的发展,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个方面都取得了实质发展和推进。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WTO的改革和发展。然而,WTO与中国教育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在部分国家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这些对WTO与中国教育而言,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对此,中国教育开始了对WTO规则的创新性超越。

#### 1. 境外消费方面:拓展留学空间,实施弹性学历认证

在境外消费方面,由于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一意孤行,违背WTO规则,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贸易政策,致使包括留学教育在内的各种中美教育交流活动被无故限制。中国赴美留学生、访问学者和科学家的赴美签证拒签率明显上升。根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统计,2018年中国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0313人,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原计划赴美331人,占计划派出人数的3.2%;2019年1月至3月,中国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353人,因签证问题未能成行182人,占计划派出人数的13.5%。<sup>[9]</sup>2019年,美国教育部更是全面启动对中美高校交流项目的审核。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参议员提出所谓的《校园安全法》,明确限制中国留学生到美国进行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学习,对学习这类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不再签发学生签

证。基于此种现实,2019年5月,中国政府向WTO正式提交了《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支持对WTO进行必要改革,愿与WTO一起解决当前危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2019年6月,教育部发布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提醒广大学生学者出国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做好相应准备。同时,国家留学基金委继续在自费留学和公派留学两个方面为出国留学人员提供经费支持和资助,并积极开拓优质教育资源合作渠道,拓展出国留学空间,鼓励和支持出国留学。另外,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留学生在境外停留时间不足而与中国现行的学历学位认证要求不符的,教育部门也积极给予了回应关切,明确表示留学人员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返回海外留学地的学校而选择在线方式来修读部分课程,以及因此出现在境外停留时间不符合学制要求的情况,不作为影响学历学位认证结果的因素。

#### 2. 商业存在方面: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积极探索境外办学

在商业存在方面,中国教育加入WTO后,面向新的国际环境,加深了对教育领域的国际规则认知,执行了以WTO规则为核心的国际法,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得到了发展。中国政府将加入WTO的规则、承诺转化为国内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时也考虑到了加入WTO的影响,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了统领和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修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教育国际化及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强调,都是考虑到了加入WTO的因素。这些表明加入WTO对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带来了实质变化。近年来,中国教育开始超越WTO相关规则,《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等文件的先后印发,对新时代推动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重点部署。202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修订草案稿)》专家论证会议在郑州大学召开,条例的适时修订将不断提升中外

合作办学的规范性和成效性，并对推动新时代下中外合作办学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2020年6月，教育部与海南省建设国际教育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中国政府承诺“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设立国际学校”，不再要求外方必须与中方所在学校合作办学，这是对WTO相关中方承诺的突破和超越。另外，在大力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部分中国高校也积极探索境外办学，参与全球教育服务出口的竞争。目前全国已有2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84所高校在境外举办了5个机构和128个办学项目。<sup>[6]</sup>2019年9月，由教育部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负责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试行）（2019年版）》正式发布。该指南包括总则、可行性分析、筹备建设、教育教学、组织管理、附则等六章，共七十二条。指南从招生与学籍、教学与科研、教师与学生、教学质量评估、行政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跨文化管理、风险管理、协议与章程签署、办学场地选择、培养方案制定和报备及办学地许可手续办理等具体环节，为中国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提供了实操层面的技术指导。

### 3. 跨境交付方面：持续摸索试点，扩充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在跨境交付方面，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和各国一样都开展了大规模的网络在线教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逐渐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加大跨境交付的引进。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到，“通过‘互联网+’‘智能+’等方式，丰富中西部地区薄弱学校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sup>[7]</sup>。因此，在不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凭借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积累的网络监管经验，在监管适当的条件下，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跨境交付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 4. 自然人流动方面：设置多元化资助，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在自然人流动方面，中国继续打造和做强

“留学中国”品牌，继续鼓励境外留学人员和境外专家学者来华工作和学习，并给予其多元化的奖学金资助和合理的待遇补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教育部先后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两个重要文件，进一步强调要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并明确指出“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为沿线各国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全面提升来华留学人才培养质量，把中国打造成为深受沿线各国学子欢迎的留学目的地”<sup>[8]</sup>。十九大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表示，要继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sup>[9]</sup>2019年6月，教育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要“打造‘留学海南’品牌学校。加快建设一批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吸引侨民子女、外籍人员子女到海南接受基础教育。支持在海南开展面向外籍人员和海外华侨华人的高端家政、旅游管理等职业培训”<sup>[10]</sup>。在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下，中国教育领域的自然人流动正迈向新的台阶。

## 四、关于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若干思考

总的来说，中国加入WTO二十年来，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得到了完善优化，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实现了整体推进。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教育发展尚存在诸多短板，主要表现在：基于WTO规则的教育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不完善，教育立法依然滞后于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不均衡，贸易逆差整体数值巨大；教育服务贸易质量保障制度不健全，学历互认国家偏少。展望未来，基于WTO规则，我们对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及发展提出以下前瞻性的建议。

### 1. 加紧完善基于WTO规则的法律体系

在立法方面，从宏观上看，中国法律中兼顾教育、服务、贸易三者的整体法律尚需不断完善。从微观视角看，在教育服务贸易的四种

提供方式中，“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形式的教育服务贸易仍然有法规空白、制度空缺的现象”<sup>[1]</sup>。基于此，建议教育相关部门应根据中国教育的发展实际，及时修订和增加相应法律法规，健全基于WTO规则的法律法规体系。具体来看，要对接WTO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抓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同时加紧制定其他有关教育服务贸易的针对性配套法规，如《出国留学条例》《来华留学条例》《远程教育条例》等。在填补有关教育服务贸易法律空缺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相对完备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体系框架，以便规范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

## 2. 增强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供给能力

在境外消费方面，由于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费用都高于来华留学的人数和费用，因此加入WTO以来，中国的教育服务贸易一直是逆差且这一差值还在继续扩大。而中国教育服务贸易之所以长期处于逆差，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教育的供给能力不足，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既造成了人才的外流，也制约了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和结构，特别是高层次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和结构。仅从学科类别来看，出国留学的热门学科集中在工商管理、工程科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等，中外合作办学引进的学科也以工商管理类和经济学类专业为主，这说明中国在工商管理、工程科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经济学类等学科方面竞争优势不明显，亟待提升。2019年9月，在第二届中外合作办学校长论坛上，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原司长岑建君谈及中外合作办学的初心时指出，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通过引进境外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办学水平，但仅满足于现状是不够的，融合和创新、促进国际课程本土化才是合作办学的根本方向。<sup>[2]</sup>由此可见，当前中国教育服务市场的巨大缺口，需要中国教育自身做好供给侧改革，通过努力提升教育质量来加快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强国的步伐。

## 3.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兼与国际接轨的教育质量监管框架

截至2020年9月，根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刘锦在“2020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论坛”上的介绍，在全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与中国签订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的国家为54个，占比只有五分之一，与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大国的地位极不匹配。基于此，建议教育相关部门加强有关学历学位认证程序及标准的国别研究，加强高等学校特别是中外合作大学的质量监管，同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兼与国际接轨的教育质量监管框架，着力提高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学校的办学质量，不断提升中国学历学位的国际认可度。

总之，加入WTO二十年来，在主动与WTO规则相接轨的探索中，中国在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跨境交付、自然人流动方面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在这些政策下的教育服务贸易都得到了促进和发展。中国教育从执行WTO的规则到发展WTO的规则，从将WTO的规则转化为国内法到近期对WTO规则的超越，中国教育完全在WTO意义上适应了国际化环境和发展潮流，不断推动教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 参考文献：

- [1] [2] 孙霄兵. 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53.
- [3] 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意见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 [EB/OL]. (2020-06-23) [2020-12-2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06/t20200623\\_467784.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06/t20200623_467784.html).
- [4] 教育部网站. 聚焦国家战略 提供人才支撑 留学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十八大以来留学工作情况介绍 [EB/OL]. (2017-03-01) [2019-10-17].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sfcl/201703/t20170301\\_297675.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sfcl/201703/t20170301_297675.html).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教育部发布 2019 年第 1 号留学预警新闻发布会 [EB/OL]. (2019-06-03) [2019-11-06]. <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39595/40624/index.htm>.

[6] 姜泓冰. 高校境外办学研讨会举行 [N]. 人民日报, 2018-07-04 (12).

[7] 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等八部门全面部署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 [EB/OL]. (2020-06-18) [2020-11-11].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6/t20200617\\_466544.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6/t20200617_466544.html).

[8] 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 [EB/OL]. (2016-07-15) [2020-11-1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

[9] 中国网. 陈宝生畅想 2049: 中国将引领世界教育发展潮流 [EB/OL]. (2017-10-22) [2020-11-11]. [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22/content\\_41773603.htm](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22/content_41773603.htm).

[10] 海南省人民政府网. 教育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的通知 [EB/OL]. (2019-07-09) [2020-11-11]. <http://www.hainan.gov.cn/hainan/szfwj/201907/85d7af4bf47d454ea318e7c108b96df1.shtml>.

[11] 张琚琬.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启示 [J]. 对外经贸实务, 2019 (4): 80-83.

[12] 2019 中外合作办学校长论坛演讲观点集锦 (一) [EB/OL]. (2019-11-15) [2020-05-12]. <http://www.jlulambton.org/newsitem/278437209>. (责任编辑 吴潇剑)

##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al Opening Policy since China's Entry into WTO

Sun Xiaobing

**Abstract:** Since China's entry into WTO 20 years ago, in the exploration of actively integrating with WTO rules, China's educational opening-up policies in overseas consumption, commercial existence, cross-border delivery, and the flow of natural persons, as well as educational service trade under these policies, have been promoted and developed. Specifically, the overseas consumption policy is improving, and the scale of overseas education is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the commercial existence policy is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s substantially promoted; the cross-border delivery policy is gradually standardized, and the supply potential of online education is huge; the policy of natural person flow is scientifically planned, and the two-way interaction of personnel flow is realized.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ducation has begun to transcend WTO rules, and has carried out key polic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which are manifested in these: In terms of overseas consumption, it is to expand the space for studying abroad and implement flexible academic certification; in terms of commercial existence, it is to standardize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nd actively explore overseas running schools; in terms of cross-border delivery, it is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pilot projects and expand the supply of overseas high-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erms of natural flow of people, it is to set up diversified funding to create the brand of "studying in China".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下转第 50 页)

# 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中的 校院关系与传导机制探析

郭建如<sup>1</sup> 刘彦林<sup>2</sup>

(1.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不仅仅是教与学的变化, 还体现在组织形态、组织结构和组织运行机制等方面。这种系统性的组织变革要解决“头动身不动”的现象, 就需要找出组织变革的关键维度与重要机制, 解决组织间的传导问题。基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17年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调查”数据,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 研究发现: 学校层面转型的维度能显著影响院系层次的组织转型; 相对来讲, 学校层面的校企合作制度对院系层面的转型影响最大, 说明校企合作制度是组织转型的关键; 在转型过程中学校层面采取行政强推的方式虽然会对院系的组织转型产生一定的效果, 但效果较小, 这同本科院校学术组织的特点有关;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还发现: 学校层次上的办学定位、理念与规划等方面的转型维度会对实操性维度有积极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发现, 建议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制度的作用, 特别是校企合作制度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少用行政强推办法; 在学校层面, 还要特别注意发挥办学定位、理念与规划等的引导性作用。

**关键词:** 组织转型; 应用型; 校院关系; 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1-0040-11

##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10月,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对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专业设置、校企合作、资源获取与配置等主要方面进行了详细刻画。向应用型转变不仅仅是教与学的转变, 还需要院校在组织形态、结构、制度、运

行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发生在学校层面, 还体现在院系层面, 甚至是教师层面。

国内外学者关于组织转型的相关研究识别出了组织变革所涉及的一些基本要素、转型模式和步骤。如 Cooper、Leavitt、Shelly 等人认为组织变革可以从结构、人员、任务、技术四个方面来衡量;<sup>[1]</sup> 李春玲认为组织变革是人、文化、任务、技术、设计、战略六个变量的相互作用;<sup>[2]</sup> 钱平凡构建的组织转型过程模型关注组

收稿日期: 2020-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A1A150008)

作者简介: 郭建如, 男, 教授,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 刘彦林, 女, 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 主要从事研究评价、项目评价研究。

织目标、制度、活动与技术的转变。<sup>[3]</sup> Micheal Beer 等人根据组织变革方式区分出了顶层管理驱动的变革 (E 理论) 和基于组织发展的变革 (O 理论),<sup>[4]</sup> 顶层管理驱动的变革采用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 结构性和计划性较强, 通常采用激励驱动; 基于组织发展的变革采用参与式的领导方式, 关注文化与过程, 变革过程多是自然发生的, 激励滞后。Kotter 总结的企业组织转型包含建立危机意识、形成强有力的指导队伍、创造愿景、就愿景充分沟通、授权他人为愿景而努力、规划并创造短期成就、巩固成果并持续变革、将新的方法制度化等 8 个步骤。<sup>[5]</sup>

在对高校组织转型的研究中, 伯顿·克拉克的研究较为突出。他对欧洲国家部分高校组织转型的案例进行研究, 普通高校要成为能够从市场或社会上获取资源的创业型大学需要具备五个组织要素: 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宽的发展外围、多元化的资助基地、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一体化的创业文化。<sup>[6]</sup> 一体化的创业文化就意味着高校领导、中层和基层的教员都要具有创业精神。任玉珊梳理了国内外院校转型研究, 认为要关注领导与管理、资源与经费、结构与学科、活动与技术、文化与制度、目标与愿景、使命与战略等七大方面。<sup>[7]</sup>

针对国内地方高校向应用型的转变, 有学者提出从发展战略、变革领导、办学行为、组织文化等转型核心要素进行分析;<sup>[8]</sup> 也有人指出地方性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基本属性, 规制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服务范围、发展目标和路径, 乃至组织特征,<sup>[9]</sup> 稳定的、可持续的、坚强的驾驭核心对能否成功转型起着决定性作用, 对转型的评价应该既要关注关键指标, 注意到转型的整体性、系统性及机制性的问题, 也要考虑到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关切。<sup>[10]</sup> 屈潇潇对 173 所地方本科高校校级领导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地方本科高校内部各层级承担了不同功能的转型: 战略层面, 地方院校制度层以组织资源获取、领导资源交换为主要路径实现适应功能转型; 机制层面, 管理层主要以组织结构改革、师资队伍管理和资源配置变化为牵引实现整合功能; 生产层面, 应用型人才培养和

应用科研发展是技术层改革的核心, 承担着目标达成的功能。<sup>[11]</sup>

总的来看, 已有研究努力识别、甄选出高校组织转型的一些关键要素, 但对这些组织要素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定量关系的分析还比较缺乏。这些研究还倾向于把院校看作一个整体, 忽视了院校是个复杂系统, 是由众多不同文化、不同利益和兴趣的“部落”构成的这一事实。<sup>[12]</sup> 整体与这些“部落”的关系或是集权式的, 或是“联邦”式的; 关系或紧密, 或疏松, 因为校院两级关系的不同, 学校层面组织制度的变化对院系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从实践来看, 地方高校的转型普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 常常存在着“头(领导者)转身(中层和基层)不转”、“上(领导者)热”“中(中层干部)温”“下(教师)冷”、“形神不兼备”的现象。若要破解这种困境, 使地方高校在组织转型过程中做到齐心协力, 就必须探讨转型过程中如何使学校层面的意图、理念、政策和措施能够有效地传导给院系层面, 乃至教师层面, 这就需要深入研究组织转型过程中学校层面与院系层面乃至教师层面的传导机制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 本研究采用计量方法深入分析院校内部组织转型的传导机制, 以期在理论上能够丰富和深化高校组织转型的定量研究, 在实践中帮助院校寻找应用型转型难以深入推进的原因, 进行有效诊断。

##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 1. 数据说明

考虑到教师是高校转型的基层执行者, 对地方高校转型过程中的组织压力、组织支持以及组织制度变化等感受最直接、最敏感, 本研究采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17 年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调查”教师数据进行分析。本次调查采用以专业为单位的整群抽样, 调查结合目前全国各省份开展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转型试点的实际情况, 从东中西部各抽查一到三个省份, 结合院校特征, 每个省份调查院校数为五至六所, 每所院校再选择应用性特点突

出的十个左右专业进行整群抽样。结合地方高校的应用型转型实践,本次注重调查计算机类、电气类、机械类、信息工程类、化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会计学、新闻传媒类、艺术设计类等应用性专业。在实施调查前,课题组在北京某院校进行预调研,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初步检验,对问卷进行部分修正。2017年5月中旬到6月下旬,课题组成员赴绝大多数抽样的院校现场指导学生集中填答,以保证问卷填写质量。

本次调研共选取东中西部地区43所高校,发放2500份教师问卷,回收2257份,回收率为90.28%。为保证数据质量和代表性,删除无效问卷后又删除了教师问卷中每个专业样本量少于4人的专业,然后删掉样本量少于10人的院校,最终采用39所院校的教师调查结果,有效样本量为1465个,其中新建本科院校教师问卷样本量1252个。39所院校中非省属重点大学的老本科院校7所,新建本科转型试点院校25所,新建本科非转型试点院校7所。考虑到新建本科院校是向应用型转型的主体,新建本科院校和老本科院校在办学积累、社会声誉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研究采用新建本科院校样本进行分析。地方新建本科院校是指1999年后通过合并升本、独立升本、高职升格或转设等途径成为具有全日制本科招生资格的公办或民办普通本科高校。本研究采用的32所新建本科院校样本中有25所为转型试点院校,这些学校明确提出应用型转型定位并开展转型实践,获得了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因此,本研究采用的样本同质性较高,可比性较强,适合进行应

用型转变过程中校院组织转型传导机制的分析。研究采用的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根据表1,样本在地区、学科门类、升格为本科的年数、教师职称等方面涵盖全面,分布均衡,能够较好地反映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基本情况。学校和院系转型的量表是本研究分析的关键,学校转型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值为0.9295,院系转型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值为0.9475,信度良好,说明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 2. 变量说明

在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过程中,学校层次的组织转型是否会有效地影响,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影响院系层次的组织转型是本研究的重点。本次调查问卷中学校 and 院系组织转型题项主要基于三个方面进行设计。其一,组织转型与变革文献中关于组织转型核心要素的论述,如李春玲、钱平凡、Cooper 等人从文化、任务、技术、战略、制度等方面考察组织转型与变革;其二,已有高校转型与变革案例研究中总结的组织核心要素,如任玉珊、王鑫和温恒福对高校转型的使命与战略、领导、资源、办学行为、文化与制度等维度的总结,以及伯顿·克拉克对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要素的总结;其三,《指导意见》中关于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的论述,如校企合作的专业集群实现全覆盖,建立实训实习质量保障机制,整合相关的专业基础课、主干课、核心课、专业技能应用和实验实践课等。

问卷中关于学校和院系组织转型的题项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其中1代表很不符合,2代表较不符合,3代表比较符合,4代表非常符

表1 样本分布情况表

类别		频数	频率 (%)	类别		频数	频率 (%)
地区	东部	356	28.43	学科门类	人文社科类	410	32.75
	中部	541	43.21		基础学科应用类	131	10.46
	西部	355	28.35		工科类	711	56.79
升格为本科的时长	1—10年	347	27.72	教师职称	正高级	74	6.04
	11—15年	612	48.87		副高级	381	31.10
	16—18年	293	23.41		中级及以下	770	62.85

合,由教师根据题项描述进行选择。本研究选取问卷中考察学校和院系组织转型的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学校层次组织转型的五个维度和院系层次组织转型的四个维度。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均通过了统计检验,达到拟合要求。对教师问卷中关于学校转型的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题目可靠性分析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25,题目信度较好。探索性因子分析的 KMO 值为 0.936,抽样充足度良好,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p=0.000$ ,表明题项间存在共同因素,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最终得到学校组织转型的“理念规划及资源”“办学定位及专业设置导向”“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行政强推及严格考核”五个公因子。探索性因子采用的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为最大方差法,得到的五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为 84.08%,表示对原有变量的总方差

具有 84.08%的解释能力。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2。

对教师问卷中关于院系组织转型的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题目可靠性分析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13,题目信度较好。探索性因子分析的 KMO 值为 0.923,抽样充足度良好,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p=0.000$ ,表明题项间存在共同因素,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最终得到院系组织转型的“应用型定位及教师认同”“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评”“学习型变革团队建设”四个公因子。探索性因子采用的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为最大方差法,得到的四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为 86.80%,表示对原有变量的总方差具有 86.80%的解释能力。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3。

学校和院系组织转型维度对应了使命、规划与资源、活动与技术、文化与制度、领导与管理等已有理论和院校总结的组织转型要素,

表 2 学校组织转型各维度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一级指标	题目内容	载荷	Cronbach's $\alpha$	累计方差贡献率
学校: 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	校领导重视教学工作,在实践教学上投入大量资金和设备	0.740	0.879	23.88
	校领导下放权力以发挥院系和教师教学变革的积极性	0.786		
	校领导习惯用奖励和资源倾斜方式推动教学或组织变革	0.768		
学校: 理念规划及资源	校领导对于学校如何发展有清晰的理念和规划	0.763	0.864	41.94
	校领导最显著的强项是能为学校的发展争取到重要资源	0.777		
	学校的发展目标、战略规划与资源配置三者高度匹配	0.583		
学校: 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	学校制定了操作性强的校企/校地合作指导性文件	0.755	0.809	54.38
	学校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激励教师参与到校企/校地合作	0.814		
学校: 办学定位及专业设置导向	学校领导明确提出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	0.895	0.800	74.42
	学校专业设置以当地经济和社会需要为依据	0.729		
学校: 行政强推及严格考核	学校领导习惯于通过行政和严格考核方式强行推行变革	0.940	-	84.08

表3 院系组织转型各维度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一级指标	题目内容	载荷	Cronbach's $\alpha$	累计方差贡献率
院系：应用型定位及教师认同	院系明确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制定有企业参与	0.812	0.804	24.47
	教师了解并认同学校或院系的地方性和应用型的办学定位	0.774		
院系：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	与当地的行业或企业相比，校内的实验/实训设施很先进	0.819	0.817	48.63
	院系实践教学的人员、材料和工具经费有明确的规定与保障	0.767		
院系：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评	院系制定了严格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有扎实的效果	0.719	0.818	71.21
	院系对教师的考核评价机制很健全	0.798		
院系：学习型变革团队建设	院系领导努力打造学习型团队，相互学习，以促进变革	0.896	-	86.80

表4 变量描述统计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院系：应用型定位及教师认同	0.05	0.99	-3.86	3.30
	院系：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	0.01	1.00	-4.65	3.13
	院系：学习型变革团队建设	0.01	1.00	-4.62	2.34
	院系：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评	-0.01	1.01	-4.29	3.35
自变量	学校：办学定位及专业设置导向	0.08	0.98	-4.34	2.50
	学校：理念规划及资源	0.03	0.97	-4.71	3.20
	学校：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	0.01	1.01	-5.29	3.50
	学校：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	-0.01	1.01	-4.01	3.11
	学校：行政强推及严格考核	-0.01	1.01	-3.68	2.37
控制变量	升格为本科的年数	12.79	3.09	6	18
	私立院校	0.32	0.47	0	1
	转型试点	0.81	0.39	0	1

而且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制度等维度体现了应用型转型的实践特点。结合学校和院系组织转型维度来看，学校层面组织转型更偏重顶层设计与资源配置，院系组织转型更侧重贯彻落实，组织转型维度的提取符合院校管理实践。

### 3. 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分析组织转型过程中的校院传导关系，本研究还将升格为本科的年数、院校

性质等学校特点作为控制变量。组织转型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4所示。

### 4. 模型

为探索学校层面组织转型对院系组织转型各维度的影响，本研究选定新建本科院校子样本，分别以院系组织转型各维度为因变量，以学校组织转型各维度为自变量，控制学校层面的升格为本科的年数、是否为民办学校、转型试点院校，以及院校所在省的固定效应，以控

制不同省份政策推动力度及经济发展环境的差异。模型公式如下：

$$Y = \alpha + \sum \beta_i UT_i + \sum \beta_j C_j + \varepsilon \quad (式 1)$$

被解释变量为院系组织转型的“应用型定位及教师认同”“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学习型变革团队建设”“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评”四个维度，核心自变量  $UT_i$  为学校组织转型的“理念规划及资源”“办学定位及专业设置导向”“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行政强推及严格考核”五个维度。 $C_j$  为学校特质方面的控制变量。

### 三、学校组织转型对院系组织转型的影响

#### 1. 回归分析结果

依据式 1 进行学校组织转型对院系组织转型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 `hettest` 命令进行异方差检验，显示  $Prob > \chi^2 = 0.000$ ，统计量

的伴随概率小于 1%，说明存在异方差，因此在回归方程中加入稳健性标准差的选择项 (robust)。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回归分析前计算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发现相关系数最大为 -0.3569，小于 0.8，不存在严重的相关性；另外，上述回归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各组模型中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 (VIF) 介于 1.02—2.87 之间，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可信。

根据回归结果，学校组织转型的多个维度对院系组织转型的多个维度有着显著影响，学校层面有的转型维度甚至会对院系的四个维度都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总体上院系层面的维度受学校层面相对应维度的影响最大。如学校获取资源并将资源与清晰的理念与规划相匹配，对院系四个维度都有显著的影响，但相对来讲，对院系打造学习型变革团队影响最大。学校的应用型办学定位与依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来设置专业，对院系的应用型定位和教师认同影响

表 5 学校组织转型对院系组织转型的影响回归结果

	(1) 院系：应用型定位及教师认同	(2) 院系：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	(3) 院系：学习型变革团队建设	(4) 院系：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评
学校：理念规划及资源	0.16*** (0.03)	0.12*** (0.04)	0.30*** (0.04)	0.10*** (0.04)
学校：办学定位及专业设置导向	0.42*** (0.03)	0.00 (0.03)	0.05 (0.03)	0.14*** (0.03)
学校：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	0.11*** (0.03)	0.28*** (0.03)	0.44*** (0.04)	0.22*** (0.04)
学校：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	0.35*** (0.03)	0.38*** (0.03)	0.05 (0.03)	0.31*** (0.03)
学校：行政强推及严格考核	0.05* (0.03)	0.06** (0.03)	0.08*** (0.03)	0.08*** (0.03)
升格为本科的年数	-0.06* (0.01)	0.00 (0.01)	0.04 (0.01)	0.02 (0.01)
私立院校（公办院校）	-0.04 (0.08)	-0.01 (0.09)	0.03 (0.08)	0.03 (0.09)
转型试点院校（非试点院校）	-0.01 (0.07)	0.03 (0.08)	0.02 (0.07)	-0.05 (0.10)
院校所在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158	1,158	1,158	1,158
R <sup>2</sup>	0.34	0.24	0.31	0.22

注：1. 表中呈现的为标准化系数；2. 括号内为虚拟变量基准组和稳健标准误；3.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最大。学校激发教改并重视实践教学投入对院系的四个维度都有显著影响,相对来讲,对院系打造学习型团队的影响最大。学校的“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对院系转型的三个维度(“应用型定位及教师认同”“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评”)都有显著影响,而且影响程度较接近,但相对而言,对校内实训条件和院系的实践教学资源保障影响最大。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层面采用行政强推和严格考核的办法来推动变革对院系的四个维度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这可能是与本科高校的组织“底部沉重”“决策弥散”的特点有关,导致行政强推的效果有限。

从院系转型的角度看,院系的“应用型定位与教师认同”尽管受学校层面五个转型维度的影响显著,但受学校“办学定位与专业设置导向”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这说明学校的应用型定位与专业设置能够引导院系人才培养的定位和促进教师的认同;地方高校在向应用型转型过程中,不明白向哪儿转是教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明确的可操作的指导性意见与有效的激励能够促进院系明确方向,激发院系及教师转型认同。

院系“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受学校的“理念规划与资源”“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行政强推及严格考核”的影响显著,相对来讲,受“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这是因为实训和实践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教育部等三部委明确要求提高实训实习在总课程中的占比,而实训实习量的拓展和质的提升特别需要校企的深入合作;同时,学校重视教学改革,重视实践教学的投入也会直接促进校内实训条件建设和实践教学的保障。

院系打造学习型变革团队受学校“理念规划及资源”“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行政强推及严格考核”的影响显著。在这三个因素中,受学校“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理念规划及资源”(理念规划、资源获取和匹配),而受“行政强推及严

格考核”的影响明显较小。这是因为学习型团队最重要的特点是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更多地要建立在自愿和认同的基础上,学校层面有导向,有资源配置和激励措施,注意激发院系和教师的积极性,院系领导就容易打造学习型团队;行政强推的做法对于打造学习型团队的影响是有限的。

院系“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评”受学校五个维度的影响显著,但相对来讲,受学校“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应用型高校的建设中,通过校企合作来促进实践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教师的考核也主要发生在实践教学环节和校企合作的表现上。

总的来看,学校层级的各维度对院系对应维度的影响程度最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从学校组织转型各维度的作用大小来看,学校层面的“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对院系转型主要维度的影响最大,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这也是普通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最鲜明特点,即把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建立在产教融合和校企结合的基础上,通过产教融合校企结合带动学校和院校全面的组织转型。

## 2. 稳健性检验

对全样本(包括老本科和新建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中经济/人文/管理/传媒类专业子样本和应用/机械/计算机/工程类专业子样本分别进行上述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受篇幅限制,不在此一一呈现回归结果。

## 四、组织转型的路径分析

### 1. 模型构建

根据伯恩鲍姆的观点,学校是一个系统,学院是其中的子系统,会受学校这个大系统的影响。<sup>[3]</sup>结合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实践看,新建本科院校的应用型转变明显受国家政策推动,转型动力多来自外部环境的要求,这种转型更符合顶层管理驱动的变革模式。根据顶层管理驱动的变革理论,这种变革模式的结构和计划性较强,呈现自上而下变革的特点。基于此,本研究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构建了学校组织

表 6 组织转型内部影响机制拟合情况

指标类别	主要适配指标	指标值	适配标准	适配判断
其他适配度	适配度指标值 GFI	0.954	$\geq 0.95$	优良
比较适配度	比较适配度指标 CFI	0.978	$\geq 0.95$	优良
简约适配度	简约调整 GFIPGFI	0.659	$> 0.5$	优良

转型各维度影响院系组织转型、同一层次中定位与规划推动转型实践、考核措施推动实践教学的原始模型，并根据软件汇报的调整参考进行调试，删去不显著的影响路径及与各维度均无显著影响关系的转型维度，最终得到组织转型的路径图。结构方程模型中各组织转型维度潜变量的构建方法与前文因子分析结果一致。

### 2. 适配判断

模型适配情况如表 6 所示，模型结果适配度优良。

需要说明的是，学校组织转型中的行政推动及严格考核，院系组织转型中的学习变革型团队建设由于与其他因素之间没有显著的路径关系，在最终模型中被删掉。

### 3. 结果

表 7 和图 1 分别呈现了结构方程模型中学校组织和院系组织转型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

根据图 1，在学校对院系组织转型的影响中，学校的“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对“应用型定位及教师认同”、“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评”和“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产生影响，而且对前两者影响更大，说明院系的组织转型主要受学校层面制度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

校企合作在组织转型中所起的核心中轴作用。

在学校层面，“办学定位及专业设置导向”会对“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产生显著影响，“理念规划及资源”对“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有显著影响，“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

会影响“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说明学校组织转型层面存在着理念规划影响行动与落实的现象。在校院传导机制方面，学校层面主要是通过“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推动院系层次的“应用型定位及教师认同”、“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评”和“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在院系层面，教师“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评”对“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组织转型传导机制的总效应看，在学校组织转型内部影响中，“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是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关键，受学校“办学定位及专业设置导向”的影响为 0.381，受学校“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的影响为 0.624。学校层面的“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之所以发挥着转型中轴的作用，在于操作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及有力的激励措施共同构成了强有力的校企合作制度，能够有效降低转型的不确定性，为教师行动指明方向，有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学校关于校企合作的指导意见和激励措施用确定的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也会形成组织成员的稳定预期，为教师转型行为提供合法性。

表 7 组织转型传导机制路径及系数

影响路径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临界比值	P
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	← 办学定位及专业设置导向	0.381	0.039	10.59	***
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	← 理念规划及资源	0.951	0.053	23.35	***
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	← 激发教改重视实践教学投入	0.624	0.035	17.18	***
院系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核	← 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	0.923	0.037	25.89	***
院系应用型定位及教师认同	← 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	0.956	0.032	25.93	***
院系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	← 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	0.460	0.119	4.25	***
院系实训条件及实践教学保障	← 院系实践教学管理及教师考核	0.478	0.118	4.31	***

注：\*\*\* $p <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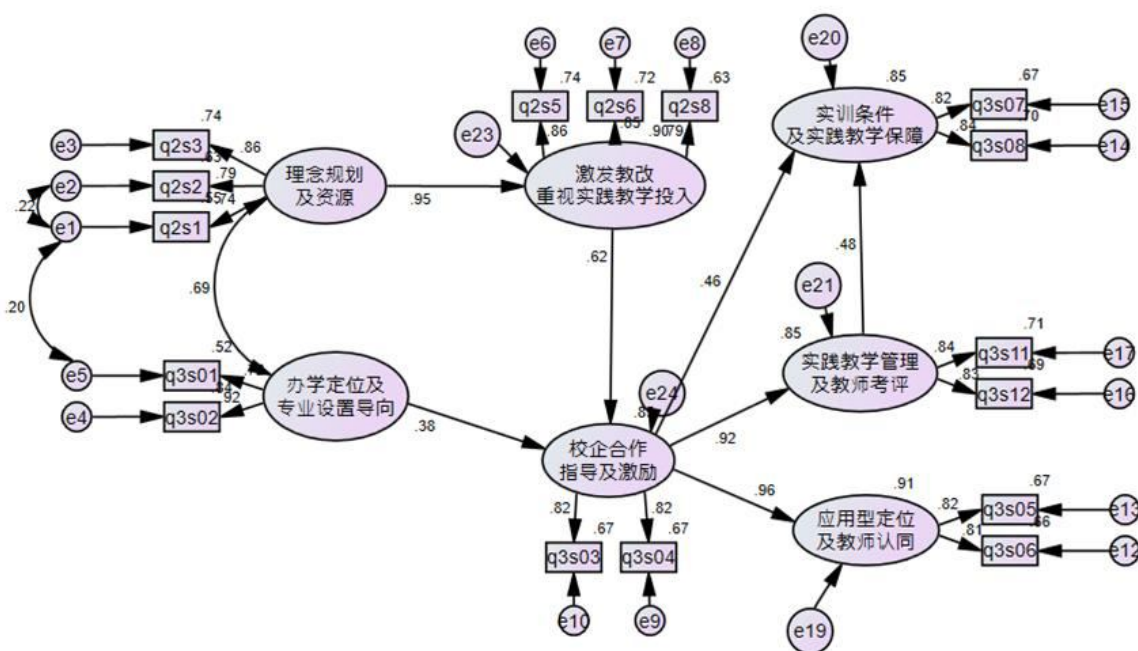


图1 组织转型传导机制路径图

注：结构方程模型中各潜变量对应的题项与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应的题项一致，各参数均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检验

##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学校层面组织转型对院系层面组织转型的影响，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校级层次的组织转型对院系层次组织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校级层次组织转型的各维度能够影响院系的组织转型，且学校组织转型的维度对院系相应维度的影响最大。从学校对院系组织转型的影响机制来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校级层次的“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在组织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传导和推动作用，“办学定位及专业设置导向”“理念规划及资源”能够间接推动院系的组织转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转型过程中学校采取行政强推的方式虽然会对院系的组织转型产生一定效果，但效果较小。

综上，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有如下建议。

第一，基于高校组织特点，在转型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学校层面校企合作制度（特别是具

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和激励措施）的作用，减少行政强推的做法。校企合作制度是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突破口，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学校的组织转型通过“校企合作指导及激励”可有效地推动院系办学定位、资源保障、考核管理等方面的组织转型，这与本科高校专业性较强的组织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对转型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担心自身利益受损是组织转型的两大阻力，操作性强的指导性文件和有效的激励性措施能够明确转型导向，可有效地消除教师的迷茫。教师参与转型过程中面对的情境是复杂多样且异质的，学校层面的决策者很难了解具体的转型情境，也很难对诸多实践细节进行决策，教师才是处理校企结合培养人才的现场专家。学校应提供明确的校企合作指导意见，赋予教师相应的自由裁量空间，为教师提供行动指南和基本框架，使教师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变通，顺利推行转型举措。而不顾复杂现实情况强制推行则容易造成转型行动与复杂现实的错位，挫伤教师转型的积极性。另外，强有力的激励能够消除教师对利益受损的

担忧, 弥补教师参与转型付出的成本。相较于采用严格考核办法, 要求教师必须采取一定行动, 否则面临惩罚, 激励积极转型的教师, 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 使教师的行为更好地与学校的意图, 特别是理念、规划和导向相一致, 其效果更好。

第二, 学校层面不仅要高度重视办学定位、理念与规划的作用, 还要重视获取资源并与学校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相匹配。学校是否有清晰的定位、理念与规划, 校领导是否有强有力的资源获取能力, 学校的资源是否同学校的发展目标与战略规划相匹配是刻画学校组织能力的重要指标。从实证结果看, 学校的组织能力(即理念规划、资源获取及匹配能力)对院系转型的各维度都有显著的影响, 特别会影响二级学院能否打造学习型变革团队; 学校的理念规划与资源匹配也会显著地影响学校是否重视教学和教学改革, 是否重视实践教学上的投入, 这又进一步影响院校转型的各维度。要想解决转型过程中“头转身不转”的问题, 做到上下协调, 就需要学校层面通过明确的办学定位和专业设置导向使院系和教师产生认同, 如通过教代会、党代会、学校章程等途径将应用型办学定位固定化, 上升为全校的共识; 同时, 校领导还需要强化资源获取能力, 并将资源与学校的目标与规划相匹配, 在学校层面做到“言行一致”, 院系和教师才能感受到学校的决心, 获得转型行动的强有力的资源支撑, 推进二级院系学习型变革团队的打造。

#### 参考文献:

[1] COOPER W W, LEAVITT H J, SHELLY M W. New perspectiv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 [J].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1964, 17 (1): 216-217.

[2] 李春玲. 学校组织变革的理论与实践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5.

[3] 钱平凡. 组织转型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294.

[4] BEER M, NOHRIA N. Breaking the code of change [M]. Cambrid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1: 4.

[5] KOTTER J P. Leading change: why transformation efforts fail [J]. IEE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review, 2009, 37 (3): 42-48.

[6] 克拉克. 建立创业型大学: 组织上转型的途径 [M]. 王承旭,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7] 任玉珊. 应用型工程大学的组织转型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0 (6): 150-153.

[8] 王鑫, 温恒福. 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的模式及要素分析 [J]. 教育科学, 2014, 30 (6): 69-72.

[9] 郭建如. 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刍议 [J]. 北京教育 (高教), 2018 (10): 29-31.

[10] 郭建如.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探析 [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17, 19 (1): 1-11.

[11] 屈潇潇. 地方本科高校应用转型发展的路径特征分析——基于 173 名校级领导的问卷调查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9 (10): 81-87.

[12] 比彻, 特罗勒尔.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 [M]. 唐跃勤, 蒲茂华, 陈洪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3] 伯恩鲍姆. 大学运行模式: 大学组织与领导的控制系统 [M]. 别敦荣, 译.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3: 29-34.

(责任编辑 刘红)

##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 i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Guo Jianru Liu Yanlin

**Abstract:** Loc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pplication-oriented transformation is a systematic change, so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key. Based on large-scale data survey collected from teachers in loc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2017, this study adopte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obtain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each dimension of university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the schools'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showing a systematic feature that the higher level influences the lower level, and the dimension of university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corresponding dimension of colleges; The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guidance and incentive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each dimension of the schoo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 way of administrative promotion in university has certain effect on the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but the effect is small.

**Key words:** Org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school relationship; Transmission mechanism

(上接第 39 页)

education based on WTO rules, such as 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trade deficit in education services, less countries with mutual recognition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so 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for China's education opening-up policy and development: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legal system based on WTO rules; Strengthen the supply ability of our education service trade; Explore the education quality supervision frame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Key words:** WTO; Educational opening policy;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Policy innovation

# “双一流”建设中的组织合法性与制度趋同

——对 414 位高校二级学院院长的调查分析

李立国 冯鹏达 张海生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要:** 在推进“双一流”建设中, 从组织合法性视角探讨二级学院如何协调自身与学校组织目标间的张力与关系、采取何种合法性逻辑服务“双一流”建设大局、不同二级学院又将面临怎样的共性与差异问题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 对 414 位“双一流”建设高校二级学院院长进行深入调研, 结果显示: 规制合法性、模拟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三种组织合法性机制在“双一流”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 并在大学和学院追求合法性的过程中, 促使二级学院由竞争趋同演化为制度趋同。为了避免这种趋同, 就必须建立规范科学的“双一流”评价机制; 尊重学科发展规律, 给予二级学院更多的自主空间; 建立学科建设投入的均衡机制, 并注重学科特色的打造。可以预见的是, 在“双一流”建设的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 规制合法性依然会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或许会进一步提高; 模拟合法性将逐渐下降; 规范合法性将逐渐增强。

**关键词:** 学院; 院长; 规制合法性; 模拟合法性; 规范合法性; 制度趋同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1-0051-08

##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双一流”建设是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利益相关者中, 二级学院是学科发展的主体之一, 是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关键力量。二级学院既服务于学校一流大学建设的整体目标, 又主导着院内所涉一流学科的发展事宜。因此, 在学院与学校这样相互交织的组织关系中, 如何有效协调组织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就显得

十分关键。而组织本身的“合法性”是协调各方利益与关系的基础, 其服务于组织自身的目标并促进组织整体的发展与进步。

在以科斯 (R. H. Coase) 和诺斯 (D. C. North) 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中, 组织是通过获得“合法性”而形成与发展的, “合法性”是强调组织对外部制度环境的适应或回应。<sup>[1]</sup> 美国学者迪马吉奥 (P. J. DiMaggio) 和鲍威尔 (W. W. Powell) 的经典研究将组织合法性划分为规制合法性 (Coercive Legitimacy)、模拟合法性 (Mimetic Legitimacy) 和规范合法性 (Normative

收稿日期: 2020-08-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集聚度的省域差异与布局结构优化”(71974195)

作者简介: 李立国, 男,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研究; 冯鹏达, 男,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张海生, 男,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研究。

Legitimacy) 三个维度。<sup>[2]</sup> 其中, 规制合法性的核心来源是政府及其他权威组织, 它是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维度,<sup>[3]</sup> 对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更是如此。“双一流”原本就是国家实施的一项重点建设工程, 其有效推进必须建立在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接受和认可的基础之上。而国家对于“双一流”建设的目标规制, 也主要通过设置目标引导、资源配置倾斜以及建设绩效评估等途径来实现。模拟合法性又称认知合法性, 强调合法性的认知属性, 认为合法性是在制度整合和社会心理的基础上, 一个实体组织适合其嵌入的社会情境的程度。<sup>[4]</sup> 具体到“双一流”建设中, 就是强调那些获得办学声誉与发展成效的、大家共同认可的共识与象征符号, 如发表高水平论文、获得国家大奖等。而这种认知合法性的首要表现形式就是学习机制, 然后通过经验移植的本土改造, 形塑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学科优势。学科优势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树立学科品牌、打造学科特色、提升学科竞争力的过程。规范合法性则强调组织发展要遵循某些特定的行为准则、规范、价值观与专业标准。将之应用到“双一流”建设中, 就是要强调尊重学术规律、注重学术特色以及不同领域之间的专业认知。因此, 将组织合法性的三个维度应用到“双一流”建设之中, 具体体现为: 规制合法性主要包括目标导向、资源配置和评价体系; 模拟合法性主要包括学习机制、参与竞争和提升能力; 规范合法性主要包括学术规律、学科特色和内外部认知。如此, “双一流”建设也就成为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认知规范共同作用下的合法性过程。

在合法性的理论框架下, 二级学院追求的规制合法性是应对外部制度环境压力的必然选择, 是学院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 面对较高的“强制性”制度环境时, 二级学院会急于采取规制合法性的行为; 二级学院追求的模拟合法性可以迫使其参与到一流学科的竞争中, 使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 这一过程可以帮助学院积累改革经验, 获得能力提升; 二级学院追求的规范合法性可以推进组织规范发展与有序改革, 减少内部冲突与外部矛盾, 有助

于获得学术同行和社会的认同。同时, 由于受到内外部制度环境的压力, 组织被迫追求某种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 从而在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导致一定的“制度趋同”现象。而制度趋同的过程也是各种制度不断耦合的过程, 在组织追求规范性的过程中, 各种制度相互匹配、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 与组织合法性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相互影响。

综上, 在推进“双一流”建设中, 从组织合法性视角探讨二级学院如何协调自身与学校组织目标间的张力与关系、采取何种合法性逻辑服务“双一流”建设大局, 不同二级学院又将面临怎样的共性与差异问题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上述考量, 本研究对 414 位二级学院院长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 35.02% 的二级学院院长来自“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64.98% 的二级学院院长来自“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同时, 为了更好地分析二级学院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合法性逻辑与制度趋同现象, 我们还深度访谈了 15 位“双一流”高校二级学院院长, 并收集整理了 9 个二级学院的相关案例, 通过混合研究的方法将问卷数据与访谈、案例资料相互支撑、互为印证, 以提升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 二、二级学院的规制合法性分析

在高等教育领域, 规制合法性是政府为推进“双一流”工作设定的标准与机制,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目标导向; 二是资源配置; 三是评价体系。“双一流”的建设目标就是要引领高等教育发展, 要求部分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走在前列, 政府的制度安排反映了更多的设计性, 由国家部委和各高校制定与实施, 其最理想的出发点便是集中资源和人才投入“双一流”建设。各二级学院和学科只有以此为目标导向, 才有可能获取更多的资源, 在评价中获得更好的成绩。

首先, 规制合法性表现为重视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即学院(科)的发展目标和人才培

养目标的制定在宏观层面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相契合,在微观层面与学校(院)发展目标以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相一致。调查结果显示,二级学院院长普遍认识到“双一流”的意义与机会,认为“双一流”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提升人才培养质量(94.93%)、扩大学科科研影响力(83.82%)、完善治理制度(81.40%)、提升国际影响力(78.50%)以及提高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能力(77.54%),特别是受访院长们把人才培养放在了“双一流”建设的第一位。就“双一流”建设目标的重要性而言,“学科建设目标”(85.75%)、“人才培养目标”(81.40%)、“学校发展定位”(78.26%)是院长们最为关注的。他们普遍认为“双一流”建设必须符合学科目标和学术规律,不能简单以学校目标来替代学科目标,要包容大学内部多学科的存在,才能以更大的灵活性去包容不同学科的发展并且重组各种资源以满足学科发展的需求,使制度环境中处于弱势的那些学科组织通过时间延展获得发展空间,通过局部变革获取可持续发展。例如,一位理工类重点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认为,“在理工类院校,法学学科相对弱势,学科要发展就要追求特色、追求差异,但是我们不能违背最基本的学科规律。我们瞄准了智能科技法律方向,重点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网络科技等智能科技与法律的交叉融合,培养法律教育科技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这一特色可以说填补了当今我们法律教育科技特色人才的需求缺口,也得到了行业和学界的高度认可。”这所高校的法学学科在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国际法与刑法等8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和信息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将法律与科技进行交叉融合,找到了新的突破。该学院在实践中把学校的优势学科与自身的法学学科相结合,改变了原有一般学校法学院的发展模式,创造了新的发展方向,努力向学校的发展目标看齐。

针对学院的发展目标,有超过80%的院长愿意按照“双一流”的规制去制定学院的发展目标,将学院的发展目标与学校建设目标、国家战略目标整合起来,以彰显二级学院存在和发

展的合法性。这些学校围绕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不仅将资源配置和考核评价的指标重点向人才培养倾斜,服务于“双一流”整体建设的要求,还通过学科之间的有机融合,在培养复合型人才和促进交叉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如某理工类院校交通学院院长谈到:“学院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巩固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将本科教学的工作量固化到教师晋升考核过程中,促进教学工作不断升温;学院要求教师每八年要有完整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班主任工作经历,改变只有年轻班主任的局面,让教学经验、人生经验更为丰富的教授近距离地引导和培养学生。”

其次,资源配置的调整是规制合法性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充裕的资源(尤其是办学经费)成为实现“双一流”建设既定目标的基石。为了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功用,资源向“双一流”方向倾斜就成为“双一流”高校的普遍做法。例如,在资源配置中,56.04%的二级学院院长认为“双一流”建设的资源配置应投向重点特色学科,33.57%的院长认为应向新兴交叉学科倾斜。这种资源配置倾向,实际上是与“双一流”学科发展的方针保持一致的。此外,即使这些二级学院院长所在的学院和学科并不属于重点特色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但其学校也只有发展重点特色学科与交叉新兴学科,才能符合“双一流”建设的发展要求。例如,理工类高校中的艺术类学院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其发展逻辑一方面是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通识类课程,服务学校人才培养大局,另一方面是借助学校其他优势学科实现跨学科发展。某重点理工类大学新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就强调,“我们设计学院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一是服务学校发展大局,正确认识艺术学科在全校学科布局中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艺术在人文素质教育、美育教育和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二是固始补强,践行科学与艺术交叉创新,发挥学校优势学科,加强与校内院系的深度合作,特别是与信息学科紧密结合,拓展复合媒体技

术与虚拟技术的建设方向，建立了虚拟现实技术设计研究室，开展虚拟现实技术的设计理论和实践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研究。”

最后，规制合法性还表现为评价体系的强指向性。“双一流”建设有其明确的总体目标和阶段目标，也有明确的建设周期性（五年一个周期），周期内如果能够达成预期目标，就能够得到持续的资源保障，反之则会被动态调整出去。这种以绩效为杠杆的评价考核方式，使得原有的学科发展生态被破坏。但为了争创一流，很多高校不得不调整学科布局，由此造成不同学科之间的恶性竞争，优势学科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多，而弱势学科被挤压甚至被裁撤。但囿于学科间的壁垒和隔阂，现有的评价体系并不能很好地化解这种矛盾。例如，在人才引进过程中，就有二级学院院长指出，“‘双一流’建设是以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最终要落在学院，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引进人才，最后还要上学校的人才引进委员会，很多人才不是这一个学科领域，就可能会被否。”

### 三、二级学院的模拟合法性分析

“双一流”建设已经被教育界乃至社会公众广为认知和接受，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与重点大学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共识和象征符号。模拟合法性就是这种共识与符号的具体逻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习机制，即学习已有的成果经验，包括模仿他人和在清晰认知自身基础上的特色发展与差异发展；二是参与竞争，即改变学院的发展目标与战略，争取在一流学科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三是提升能力，即通过争取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创造自身的声誉。

模拟合法性首要表现为学习机制。学习机制典型地表现为模仿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或国内位于前列高校学科发展的成功经验这一路径依赖。然而，这种路径依赖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二级学院发展“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组织目标的模糊程度”<sup>[5]</sup>。“双一流”建设开展以来，各个二级学院的使命、愿景与

目标并不清晰，但也正是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性，迫使二级学院大规模地模仿国外大学和国内顶尖的北大、清华等标杆高校学院的发展模式，而这亦成为当前学术研究追求所谓的国际论文发表和重大科研项目的重要原因。此外，普遍裁撤、合并或整合弱势学科，也成为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进行学科调整与优化的重要抓手。这种不顾学院自身发展传统和发展实际的做法，短期内似乎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不利于世界一流学科的自然生成，还会损害原有学科发展的生态环境，是一种为了迎合政策和外部需求而进行追求合法性的短视行为。

模拟合法性还表现为参与竞争和提升能力。模拟合法性就是以办学声誉与发展成效为目标，通过大学社会声誉的提升，从而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和发展机会。例如，在调查中，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更好地参与竞争提升学科竞争力，有44.20%的院长认为应该合并和撤销弱势学科。从现实情况看，很多高校的弱势学科确已面临生存问题，要么被撤销了学位点，无法再继续招生；要么被迫和其他院系合并，依附强势学院和强势学科生存。所以，对于未进入“双一流”支持的学科而言，如何生存变得极为重要。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此外，人才、平台与管理是制约学院与学科能否实现卓越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调查中，78.26%的院长认为拔尖人才是学院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资源，选择学科平台与基地的占62.80%、选择卓越领导层的占57.97%、选择管理制度和经验的占54.35%。有位二级学院院长介绍到，“学科建设就是要花大力气加强人才建设，挖一个杰青，评上一个长江学者，一下就能把这个学科带起来。人才对于学科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领军人才，方向明确就有发展。”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特别是弱势学科、一般学科的发展和追求合法性更是要以人才为支撑。

学科要办出声誉和影响力，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对自己的优势与劣势进行分析，也要把握好机遇和应对挑战。例如，有访谈对象指出，

“自动化专业的发展分为几大类：第一类是像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无论是体量、杰出人才、生源还是条件保障、学校声誉等方面，都是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这类学校可以引领学科发展前沿；第二类是与行业结合比较紧密的浙江大学、东北大学、中南大学等，能在过程控制这一个细分领域上站稳脚跟；第三类属于具有国防特色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第四类就是一般学校，发展自动化学科只能走交叉学科的路子，寻找新的增长点。”

#### 四、二级学院的规范合法性分析

规范合法性来自学科本身的价值观、专业标准和学科传统。在“双一流”建设中，即使面临外部的制度压力，学院还是需要遵循学科规律与学术要求。

首先，规范合法性强调遵循学科发展规律。从本质上看，高校的二级学院属于基层学术组织，要想保障二级学院的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了解 and 关切其组织特性，遵循学科中心的发展逻辑，即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而不能过分地受制于外部环境变迁的影响。在调查中，二级学院院长也保有此种观念。例如，针对一流学科资源配置的主体，80.43%的受访院长认为学术（科）带头人应作为一流学科资源配置的决策主体；针对校、院两级的资源配置方式，67.39%的受访院长认为应“突出二级学院作用，管理分配权直接下放到基层，更好地发挥基层自治”，“学校层面应减少介入，资源的具体使用交由二级学院负责，学校做好考核与评估”。可见，院长们普遍认为学科层面的资源配置应在学院，应由学院的学术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和民主集中来决定。但让二级学院发挥主导作用，并不是不考虑学校层面的统筹和整合作用，因为在我国高校现行的管理体制下，学校层面在资源配置中也应发挥重要的中介、协调作用，以保障学科间的均衡发展（有44.69%的院长认可这一观点）。而在具体落实学院权力方面，二级学院院长认为学校应该进一步下放管理权、

放松管控。其中，选择下放“人事管理权”的有334人（80.68%）、选择下放“资源配置权”的有322人（77.78%）、选择下放“学术管理权”的有250人（60.39%）、选择下放“财务管理权”的有241人（58.21%）、选择下放“教学管理权”的有208人（50.24%）。由此，自主权力的扩大与下沉促使学院能够按照学科规律和学院实际情况办学治学，避免学校层面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

其次，规范合法性注重学科特色化发展逻辑。“一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特色”的体现，没有“特色”的“一流”，就算不上是真正的“一流”。走特色发展和差异发展的路径，理应成为“双一流”建设的主要方式。在调查中，已有不少二级学院院长在努力向这方面靠拢，也进一步体现了“双一流”建设不仅要向国际标准看齐，也要树立本土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针对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弱势学科之间的关系，58.70%的院长认识到弱势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新的突破，不能继续走老路、无所作为。而当前弱势学科生存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是结合学校自身特色，在实践中把学校的优势学科与自身相结合，为学校主流学科提供支撑与保障。例如，某师范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旨在建设一流的、有特点的生物科学，通过聚集大量资金和资源，迅速搭建高水平的生物学研究基地，建设富有特色的生物科学研究资源库。该学院院长介绍，“以我们学院的规模和水平，想在各个领域都做到世界顶尖、直接和清华北大竞争是没有优势的，但是我们可以某些领域、某个方向上进行差异化发展，走出我们的特色道路。目前，我们已经拥有30万件昆虫化石，超过了大英博物馆，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我们在植物学极端逆境研究方面的标本也位列世界第一。资源充足能够促使我们的学科蓬勃发展，有了很多研究上的第一次发现，如发现了最早的拟态生物、复原了最早的昆虫生命等，这些成果发表在Science、PS、Nature等顶级学术刊物上。”还有学院在强调特异性、差异性和针对性等办学特色的同时，强调“入主流”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战略转

变中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学校的边缘学科，而是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学校整体的大优势转变发展思路、发展特色学科，面对其他高校强大的人文社会科学不退缩、积极作为，在服务国家发展和学术研究中展示了鲜明特色，并取得了应有的社会声誉。

最后，规范合法性强调学科发展的内外部认知规范。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和逻辑构成，对学科的评价要遵循同行评价或行业标准，不宜用统一的标准对所有学科进行评价。比如，艺术类学科发展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有位二级学院院长认为，“艺术类评价要遵循学科自身发展规律与特点，不要搞短平快的事情，不能看发多少论文，要看搞了多少创作、办了多少展览……我们大力发展以中国音乐资源为依托，以中国音乐艺术风格为基调，以中国音乐作品为体现，以中国音乐家为载体的‘中国乐派’……同时要解决世界发言权的问题，让音乐学院走出去：在美国高校开设中国民乐，融入西方主流教育体系；和‘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推广和传播优秀文化、歌剧、演出等，提升中国音乐话语权。”这些艺术类高校的学科以内外部的学科规范为基础，在自身特色发展中追求合法性，而不是走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的传统路子。

## 五、总结与讨论：组织合法性驱动的制度趋同现象

事实上，资源依赖程度是影响组织合法性的主要因素。<sup>⑨</sup>“双一流”是政府追求的战略目标，主要经费和资源来自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着各类评估和重点支持计划，亦通过评价标准约束资源的再分配。因此，规制性是政府制度安排的显著特点，即强制规定各种资源要素如何使用。二级学院追求规制合法性的行为是其应对外部制度环境压力的结果，在目标导向明确、资源配置集中、评价体系指向性强的背景下，它们面临的制度环境的“规制性”愈高就愈发倾向于采取追求规制合法性的行为，迫使学院投入到“双一流”建设的整体行动中，

从而给高校带来更多发展绩效。从调研结果看，政府主导的“双一流”建设的相关政策，特别是评估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频率给二级学院带来了极大压力。为了破解这一问题，“双一流”建设应做到分类评价、科学评价，同时减少评价频率，加快“放管服”改革，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尊重教育规律，按规律办学治校。由此，也说明当前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同质化并不是大学和学院非理性决策的结果，而是外部环境制度约束的必然驱动。<sup>⑩</sup>

而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各高校和二级学院为了实现“一流”的建设目标，普遍采用模拟合法性的发展路径，即一方面通过学习其他高校成熟学科发展的有益经验，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学院发展路径；另一方面，通过参与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和国内外各类大学与学科排行榜竞争，在不断明确学科的发展方向、凝练学科发展特色的同时壮大学科声誉，进而获取更多的学科发展资源。为此，“双一流”高校为达成周期性建设目标，普遍采用以重金挖人才、提高薪酬待遇、改革高校人事制度、争取外部资源投入、争取重大科研项目、重视论文尤其是高水平论文的发表、扩大办学开放度等措施，千方百计地在各项指标上努力前行，以提升学科评估排名和学科办学声誉。如此，就会进一步加大各高校之间的竞争，进而对二级学院施加更大的压力，驱使中国高校办学模式走向趋同化。

事实上，规范合法性主要取决于学科与专业组织的标准化过程，其本质上就是学院与学科发展要符合学术规律与学科特点，把学术治理权力归还给学院和学者，让他们在学术规范中发展学院和学科，这样也可以适度延缓规制合法性和模拟合法性带来的外部制度环境的压力与行政权力的不正当干预。因此，学科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范和价值理念，一味地迎合外部环境或制度的需求并不能使学科真正走向一流。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学院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内外部有着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坚持以学科为本，遵循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想使学科走向一流，就必须坚持特

色发展理念，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如果学院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仅注重满足外部环境尤其是市场的需求，那么学科的发展必然会走向趋同。

关于这种趋同化现象，可以用组织趋同的概念来解释。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组织趋同有两种基本类型——竞争趋同和制度趋同，竞争趋同是指市场竞争、竞争环境变化和适者生存。<sup>[8]</sup> 组织采用竞争策略是为了改善绩效，但随着绩效提高和创新策略在整个领域内被认知和认同，其他组织采用该策略就不再是为了单纯提升绩效，而是为了合法性目标，此时的趋同就成了制度趋同。在争取合法性的过程中，大学与学院的趋同化已逐渐从竞争趋同演变为制度趋同，即最初为了争取资源、人才与政策支持的竞争策略逐步固化为制度，所有学校为了达到目标，都采用相同的策略，策略变成了政策，政策固化为制度。而在趋同化的过程中，二级学院的规制合法性、模拟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同时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的高校、不同的学科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不一，同时还受制于相关主体的认知水平。

为此，要避免“双一流”建设中二级学院寻求合法性的制度趋同倾向，就必须建立规范科学的“双一流”评价机制；尊重学科发展规律，给二级学院更多的自主空间；建立学科建设投入的均衡机制，并注重学科特色的打造。

第一，建立规范科学的“双一流”评价机制。设计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指标，避免华而不实或“唯帽子”的评比，在评比过程中不能“一刀切”，要按照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设置多元分类评估体系，对文理科要有所区分，对一些特色类学校如戏曲、舞蹈等学院，应有合理的评价体系，减轻横向比较的评价，加重自我评价和纵向对比。另外，要坚决破除“五唯”，突出内涵，突出特色，注重人才培养质量，引导资源向人才培养方向倾斜，加大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加大人才培养在评优指标中的比重，坚持“多支持，少评估，少排名”，延长评审期限，给学科建设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学校安心做好人才培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第二，尊重学科发展规律，给予二级学院

更大的自主空间。“双一流”建设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形成一种政府宏观支持、学校全面统筹、学科发挥主导的治理机制；要强化学校规划发展的自主权，试验宽松的项目资金使用等管理方法与机制；国家下拨经费要常态化、规范化，减少以各种项目或工程名义的下拨。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机制，尤其是要给予二级学院更大的自主空间，通过营造稳定与健全的学术氛围，形成尊重学术、尊重学者与学生、尊重二级学院学科治理的主导作用，激发二级学院的办学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学校与二级学院的权责划分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将更多的管理权限下放到院系，加大院系基层组织的自主性，使之有更多的自主空间；强化差异化和特色化的学科发展理念，让学科带头人在特色打造上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

第三，建立学科建设投入的均衡机制，并注重学科特色的打造。首先，政府在加大投入、重视“双一流”建设的同时，还要注重对非“双一流”学校及专业的均衡投入，政府投入要分类实施，不能过于两极分化，对优势学科的过度倾斜易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公平，要防止出现“马太效应”，因为资源过度集中于几所高校和几个优势学科，并不利于国家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其次，高校发展应看人均产出及资源投入的产出效果，学校发展戒大、戒组合，否则学校规模会越来越大而资源永远不够，薄弱的学科反而会越来越多；学校要注重品牌特色的建设与打造，善于出“新品”和“精品”，在相信自己、立足本土、全面发展的同时，要提高国际视野、放眼全球，以世界规范化和行业标准化精准定位。

综上，政府的政策、评估和资源配置对大学和学院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这是目前导致“双一流”建设中制度趋同的主要诱因。在争取更好评估结果和更多政府资源的过程中，各大学和学院展开激烈竞争，而高校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成效的缓显性和不确定性促使二级学院追逐那些成功的范例，模拟合法性将会受到追捧。但是，过度的激烈竞争会使各学院丧失自己传统的研究阵地、人才培养规律和学科特

色，而丢掉传统优势和学科特色产生的过度趋同会再次加剧竞争的激烈程度，最终为了在大量同质机构中获得竞争优势，学院和学科又不得不转向寻求自身新的特色，这也就意味着当趋同化达到某一极限并突破临界点时，组织必然会再次寻找自身的传统、优势与特色，发展路径亦即由追逐模仿转向追求差异，实现从差异到趋同再到差异的纠偏过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对其他学院和学科的模仿就会变成自我的规范，逐步由模拟合法性演变为规范合法性。可以预见的是，在“双一流”建设的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规制合法性依然会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或许会进一步加强；模拟合法性会逐渐下降，而规范合法性会逐渐提高。

#### 参考文献：

- [1]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9-148.
- [2] DIMAGGIO P J,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 (2): 147-160.

[3] 魏江, 赵齐禹. 规制合法性溢出和企业政治战略——基于华为公司的案例研究 [J]. 科学学研究, 2019, 37 (4): 651-663.

[4] TSST L P.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legitimacy judgment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 (4): 686-710.

[5] BESS J L, DEE J R. Understand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dynamics of the system [M]. Virginia: Stylus Publishing, LLC, 2002: 142-144.

[6] PFEFFER J, SALANCIK G R.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xi-xxix.

[7] 李立国. 现代大学治理形态及其变革趋势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7): 9-16.

[8] 王洪才. 学科排名：利大还是弊大——对我国学科评估特征、正当性与机理的省思 [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78-86.

（责任编辑 吴潇剑）

##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Converg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Analysis Based on 414 College Deans

*Li Liguo Feng Pengda Zhang Haisheng*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how the secondary college can coordinate the tens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elf and the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s of the school, what kind of legitimacy logic should be adopted to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nd what common and different problems different secondary colleges will f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414 deans of secondary colleges in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universities were deeply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 organizational

（下转第 75 页）

#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构建

霍庆生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宁 抚顺 113001)

**摘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部署。高质量的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是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效支撑。高校现有的应急管理体系不能完全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需求。高校需坚持问题导向,运用先进的管理理论,从领导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应急预案、支撑保障、应急队伍、内外协同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体系设计,建成高质量的高校应急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高校应急管理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高校; 应急管理体系; 构建对策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1-0059-07

专题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国家立足五年、放眼十五年的发展新蓝图,作出了“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部署,开启了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高校支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然之境。高校构建应急管理体系,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也是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应然之策。高校高质量应急管理体系,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服务和引领能力,有助于支撑建成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因此,高质量的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是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效支撑。基于此,在教育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研究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构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一、高质量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高质量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构建,是高校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体现,落实国家“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支撑,以及深化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和内涵建设的重要保障。

### 1. 高质量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sup>[1]</sup> 国内外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动荡源、风险点明显增加,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社会矛

收稿时间: 2020-12-01

基金项目: 2019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视域下大学生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研究”(L19BSZ066)

作者简介: 霍庆生,男,副研究员,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43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主要从事党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盾集聚叠加、风险因素增多。构建高质量应急管理体系,有效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化解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既紧密相连又相互支撑促进,故其安全也始终是社会安全关注的焦点。新时代高等教育背景下,高校强化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不仅需要做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风险防范与控制,还需要在教学组织、文化交流、网络安全等领域做好防控。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高校面临的风险呈现出隐蔽性逐渐增强的趋势。因此,加快高质量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构建,是提升高校自身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基本需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 2. 高质量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构建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等2035年远景目标。《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作出了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的2035年教育远景规划。建设教育强国,是其他强国建设的基础。建成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离不开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支撑,离不开高层次人才的资源供给。高质量的应急管理体系,是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方面为高校聚力人才培养提供安全稳定的内部环境保障,另一方面为满足经济社会对应急管理专门人才的需求提供保障。高校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等多种途径,培养多元多样的高层次人才,能够有效增强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服务和引领能力。因此,加快高质量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构建,是优化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需要,也是建设教育强国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 3. 高质量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构建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和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党中央对“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一个时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最新要求。<sup>[2]</sup>高校构建高质量应急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增强高校风险防控和化解能力。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国外一些大学因为自身应急管理体系不健全给病毒传播扩散以可乘之机,导致疫情在国外校园中肆意蔓延。国外许多高校办学瘫痪,甚至个别百年老牌高校被迫永久关闭。然而,中国高校在教育部统一领导下科学有序地启动应急预案,实施线上教学嵌入教育教学模式,实现了线上线下教学实质等效,为疫情下的全球高等教育提供了中国方案。当前,线上教学已经从疫情防控下的应急工作稳步发展成为中国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校应急管理为夺取疫情防控胜利、顺利实施复工复产做出了积极贡献。事实证明,构建高质量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是高校科学应对突发事件、保证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客观需要,也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和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 二、高校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2003年以来,我国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体制、机制和法制)<sup>[3]</sup>为基本框架的应急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优势的工作体系。与此同时,高校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发展,在维护高校教育教学秩序、保护高校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方面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展现了空前的组织力、战斗力。但是对照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发展要求,现有的高校应急管理体系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

### 1. 高校应急管理预案建设不够完善

应急预案,是以事前准备和事中响应等为内容的指导性文件。高校应急管理预案,是指以高校应急突发事件为对象、遵照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法律法规事先研究制订的应急行动计划或工作方案。2005年,教育部出台了《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进而全国高校落实教育部的部署要求,分别制定了本单位的应急预案。<sup>[4]</sup>但是,从目前搜集到的应急预案来看,我国高校的应急预案基本上都是参照教育部或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应急管理文件进行“复制式”的编制文本,多数应急预案可操作性

不强,<sup>[5]</sup>特别是结合高校具体情况设计实际操作层面的方法和措施较少。同时,高校应急预案的同一性问题比较突出,具体条文和内容都似曾相识、大同小异,这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突发事件的高度异质性极不相称。特别是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许多学校的应急预案的操作性和实效性暴露无遗,比如外国留学生办学规模较大的地方高校如何应对疫情防控在应急预案中就是空白。

## 2. 高校应急管理体制顶层设计不够到位

高校应急管理体制包括领导层级、组织机构等方面。从组织机构看,国家和地方政府改革组建的应急管理部(厅、局)是法定的应急管理组织机构,但这种体制改革没有将高校纳入其中。虽然高校都建有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但形式的意义大于内容实施,很难起到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其原因在于工作领导小组的下设机构既没有独立建制的应急管理机构,也没有固定编制的工作人员,对应职责散落在党政办、学生处、团委、保卫处、后勤处、院(系)等部门单位之中,<sup>[6]</sup>故应对突发事件时,高校多是靠组建临时性工作小组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原因还在于应急管理职责分散,在应急预案启动后,难免出现各协同部门之间响应机制不畅、协同程度不高等问题;应急管理工作人员构成复杂、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在落实应急预案过程中容易出现因人而异、工作标准不一、工作质量不高等问题;甚至在整个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上下联动不够、左右协调不齐,导致应急管理反应速度慢、工作秩序混乱等诸多问题出现。

## 3. 高校应急管理机制建设不够到位

高校应急管理机制,是突发事件应对全过程周期中制度化程序化的工作方法与管理措施,换言之,是一组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的工作流程。目前,高校应急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保障机制不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设区的市级以上政府作出了应急基础保障建设的规范化具体化的要求。但条文仅对具备条件的高校提出了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的要求,而对基

础保障建设未做具体限定。加之对高校实施“属地管理”的地方政府事务繁多、无暇指导,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应急保障资金不足,<sup>[7]</sup>救助救援、卫生医疗等应急储备条件不充足,避难设施、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达标等问题。二是协同联动机制不到位。从内部而言,高校没有独立建制的应急管理机构,应急管理职责散落在多个部门,而部门之间又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sup>[8]</sup>随着高校突发事件的“关联性、衍生性、复合性和非常规性不断增强”<sup>[9]</sup>,高校单一主体难以应对复杂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协同参与,弥补其单一主体的应对缺陷。但是,我国目前的应急管理体制中,高校与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缺乏有效共治共享,没有形成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机制。<sup>[10]</sup>三是业务培训机制不到位。高校基本没有专业化的专职应急管理队伍,也缺乏系统规范的业务培训机制。面对突发事件只能由临时组织非专职、非专业人员顶岗应战。由于临时的应急管理队伍未曾经历系统的专业教育培训和实战模拟演练,应对时必然呈现综合研判能力低、精准应对水平差等问题。

## 4. 高校应急管理法律规范不够健全

高校应急管理法规,是指公共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理高校与政府、社会群体与个人、内部部门以及内部师生之间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和。目前,我国高校应急管理处置方面的法律文件较多,包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为基础的原则性法律文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为宏观指导的特别性法律文件,<sup>[11]</sup>以及以属地政府和高校自行制定的应急管理预案等为行动遵循的操作性法律文件。虽然法律规范很多,但系统性协调性却不强。具体表现是规定高校校园安全管理职权配置和责任划分等方面的基本性法律尚处于缺位状态,导致地方性法规及教育行政部门的规章性文件出现“师出无名”的情况。同时,由于法律规范的条文不集中,致使高校在处置突发事件时难以精准快速地找到适用的法律法规依据,<sup>[12]</sup>即使有据可循,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

协调适用问题也是影响其运行实效的客观存在。此外,还表现在高校应急管理法治化程度较低,如对全校师生进行应急管理方面的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不到位、对学校应急管理责任人员法治精神和意识的培育不足、对责任落实及法律救济缺乏适度监督等。<sup>[13]</sup>

### 三、高质量高校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对策

高质量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构建,需要运用先进的管理理论,有效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从领导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应急预案、支撑保障、应急队伍、协同机制等方面实施系统谋划和科学设计。

#### 1. 构建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应急管理领导指挥体系,提升应急组织领导能力

根据突发事件的关联性、衍生性、复合性强的实际特点,运用系统论原理对高校的应急管理体系进行组织设计,必须以整体观念为原则,强化领导指挥体系构建。系统要素与整体系统必须实现无缝对接,要素之间彼此实现有机衔接;对象系统要实现在主体系统中的有机嵌入,凝聚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实现“局部加和大于整体”的叠加效应。系统论指导下的高校应急管理领导指挥体系要构建起以“命令统一、指挥统一”为主要特征的组织管理框架,形成统一、连续、精准的领导指挥优势。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塑造统一指挥的主体系统。中国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伟大胜利的关键,就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的突出体现。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sup>[14]</sup>高校应急管理的领导体制建设,需要准确把握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和集中原则,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应急管理的各方面与各环节中,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嵌入协同的主体系统,确保应急状态下“政令统一、步调一致”。二是塑造有效控制的对象系统。参与应急管理的高校内设部门,是高校应急管理系统管理调度的具体对象,共同构成了主体系统的对

象系统。条件成熟的高校,可以考虑借鉴国家应急机构改革经验,增设“独立建制”的应急管理部门;条件暂不成熟的高校,可以考虑以合署办公或挂靠模式成立“非独立建制”的应急管理部门。无论是“独立建制”还是挂靠模式的“非独立建制”的应急管理部门,都应该进行对象系统塑造,厘清专职与兼职应急部门的工作分工,通过明确的分工原则,实现对象系统“1+1>2”效应。

#### 2. 构建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应急管理法律规范体系,提升应急综合治理能力

现代法理学强调,构成法律体系的不同法律规范需具有纵向的等级从属和横向的关联制约关系。<sup>[15]</sup>解决高校应急管理法律规范不够完善的问题,需要坚持等级从属和关联制约原则,进一步加强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一要适时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工作。在总结近年来教育部领导教育系统取得校园安全治理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启动校园安全法立法已经极具实践基础和现实必要性。立法工作亦可以对国外立法经验予以吸收借鉴,例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等已相继制定并颁布了校园安全法律。<sup>[16]</sup>针对高校应对突发事件主体责任不明、依法处置的权力边界不清、法与法之间衔接性不够等问题,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由国家相关部委单独或联合出台相关部门规章及司法解释,以缓解不同应急管理涉及的法律规范之间协调性不强的问题。二要及时完善高校内部管理制度。高校自身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修订、制度政策的更新,在国家和教育系统的法律框架下,及时加强内部应急管理制度建设,补充制度漏洞。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建立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在法治轨道上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高应急管理的法治化水平。<sup>[17]</sup>

#### 3. 构建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应急管理预案体系,提升应急实战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应急预案管理,健全应急预案体系,落实各环节责任和措施。<sup>[18]</sup>教育部领导教育系统取得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和高校应急管理的典型预案,都为高校修订编制应急管理预案提供了具体案例。高校应急预

案体系建设,需要充分吸收上述案例经验,需要准确把握“分级分类”和“三个导向”原则。一要坚持“分类分级”原则实施应急预案编制。预案编制要准确把握教育部《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对事故灾难、应急响应的等级划分原则,对事故灾难类型、应急响应措施的类别划分原则,分级分类做好各级各类内部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编制过程中,要切实解决“复制式”“上下一般粗”“横向一样平”等预案现状问题,要切实克服预案启用过程中不分突发事件类型级别一律套用同一套响应机制的现实问题。二要坚持“三个导向”原则实施应急预案编制。高校应急预案需以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为基础,做好预案内容编写的具体化。要聚焦高校预案的实际问题来把握内容体系,从谋划应急管理长远发展来把握目标定位,从守住安全底线和确保师生满意来把握评判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好的预案没有实践检验,也是一纸空文。因此,实施预案模拟演练十分必要,也是结果导向原则的有效验证手段,可以有效规避问题隐患,如验证应急预案是否考虑到了高校自身的特殊情况、配备资源是否充足、应急管理能力是否具备,等等。

#### 4. 构建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应急管理装备综合保障体系,提升基础防御能力

装备综合保障概念,最初是军方专用名词。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首提“综合后勤保障”<sup>[19]</sup>(Integrated Logistics Support)的概念作为军队建设计划。美军实施军队综合后勤保障计划,是为了解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出现的武器装备开箱合格率低的问题而施行的军备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启动“装备综合保障”建设计划,实施武器装备全寿命周期内的全过程管理,推进标准化、科学化、信息化装备综合保障建设。以军队装备综合保障建设经验为参照,建设高质量的应急管理装备综合保障体系,实现配备、管理、使用和维护等工作的整体性,极具现实意义。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高校校区必须严格落

实国家《城市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履行避难场地和避难建筑规划建设与维护管理工作的义务。非新建校区应落实应急避难场地的标准要求,整合利用学校广场、操场、绿地、体育场馆、地下空间等场地场馆建设共建共享的避难场地。校内避难场所需实施标准化管理维护工作,应急标识要严格体现功用性、识别性、显著性。二是物资保障科学化配备。坚持按需储备原则,高校需定期研判校园内部和周边应急管理风险,定期评估储备物资的种类、数量、质量等达标程度。与此同时,可以探索与所在地方有关部门单位建立应急物资共享机制,适度开展协议储备。三是平台信息化建设。在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信息技术优势作用发挥经验的基础上,高校要加快构建基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应急管理平台建设,建设与应急预案匹配适用的软硬件设备系统,实现校内信息数据共享。使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在高校突发事件全过程管理中得到有效应用,要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实现应急管理向科技创新要安全、要效率、要战斗力。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学校可以考虑建设校内预警、指挥调度平台,实施应急事件应对平台的集中调度指挥。与此同时,高校应注重引入用足社会各方资源、人员和技术力量,进一步提升高校应急管理的基础防御能力。

#### 5. 构建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应急管理队伍知识管理体系,提升精准处置能力

高校建设一支专常兼备、专兼结合、业务突出、作风过硬的应急管理队伍,是高质量高校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关键要素。强化高校应急管理专兼职队伍业务能力建设,可以考虑运用知识管理模式进行实训体系构建,形成总体固定的知识积累、共享、应用的培训模块,实施有序有效、常态化系统化的业务培训。具体要搭建好以下三个平台。一是搭建知识积累储备平台。高校应健全校内培训制度,深入挖掘学校内部行政、组织、人事等部门的资源优势,运用知识管理理论的知识积累原则,科学实施知识积累模块设计,有针对性地组织应急管理专兼职人员系统接受应急管理业务知识强化培

训。国家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和成立应急安全智慧学习工场、应急管理学院的高校，可以探索整合资源，搭建干部培训基地，开展干部轮训工作。教育系统通过校内外基地作用的发挥，常态化、系统化地强化专兼职队伍的知识获取吸收能力和知识积累存储能力，提高其应急管理的理论素养、政策水平和实战能力，增强其应对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二是搭建知识共享交流平台。高校与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探索发挥各自优势资源组建学会或协会等组织。学会或协会等组织，开展前瞻性创新性研究，搭建理论与实战成果定期交流的共享平台。通过平台作用发挥，既能够实现专兼职应急管理队伍的知识共享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提升，又能够为政府开展应急管理提供“理论智库”。三是搭建知识实战应用平台。知识应用位于知识管理原则中的最高位阶等级。高校可以与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建立“校地合作”应急管理实战应用平台，延伸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对属地所辖高校的业务指导，发挥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实战经验的优势，定期抽调高校应急管理干部参加地方应急管理系统的专业化的实战实训、以战代训，进一步提高高校应急管理干部领导指挥、救援协同的知识应用与实战能力。

#### 6. 构建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应急管理内外协同联动体系，提升多元作战能力

赫尔曼·哈肯的协同学理论提出了“自组织”和“他组织”原理。“自组织”是指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和外部力量的条件下，内部子系统各尽其责形成有序组织；“他组织”是指一个系统依靠外部指令和外部力量作用形成组织。<sup>[20]</sup> 高校应急管理系统受组织机构和业务能力短板影响，在应对复杂突发事件时难以显现较强的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难以实现内部应急管理的有序自组织，需要通过他组织的干预调节予以补充。因此，高校应急管理系统需要统筹做好自组织和他组织系统的双重设计，形成内外组织双重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方能应对突发事件有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协同校内机构建好自组织系统。有效的内部自组织是高校应急处理的最具

实效的方式。有效的内部自组织，需要有效的自组织责任体系。有效的自组织责任体系，是实现应急管理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的有效保障。自组织责任体系的塑造，需要厘清不同层级、不同机构的责任；厘清不同组织、不同人员的责任，形成有机衔接的责任体系。与此同时，失职失责的追究监管机制应当同步设计与构建。通过自组织系统设计，实现内部组织的衔接畅通，彼此“握指成拳”，形成“加和效应”。二是调动师生主动性，拓展自组织的主体力量。培养广大师生应急管理主体意识，鼓励其正确参与学校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从而扩大高校应急管理的自组织的主体力量，形成全校上下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团结合作、共同应对的整体合力，为学校应急管理决策部署和有效施行创造良好的环境。三是协同校外资源发挥他组织作用。受资源、技术等多重因素限制，高校依靠自身实力提升应急管理水平的能力有限。因此，高校需要紧密对接、深度融入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体系，与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组建协同共建、协同共治的工作机制，实现内外力量相互“锻长板”“补短板”，进而降低应急管理成本，减少工作阻力，提高工作效率。通过他组织系统设计，实现政府、社会等多元力量与高校的人力协同支撑；实现公安系统、医卫组织等多方力量与高校的技术协同支撑；实现新闻媒体、社区街道、各界校友等多方社会力量与高校的舆论协同支撑。

#### 参考文献：

- [1]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8-06-24 (1).
- [2] 陈宝生.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N]. 光明日报, 2020-11-10 (13).
- [3] 瞿剑. “一案三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J]. 江苏劳动保护, 2004 (10): 4.
- [4] [6] 刘志欣. 风险评估视域下高等学校应急预案优化研究——以 S 市高等学校为例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 (4): 233-241.

[5] 杨力, 邢娟娟. 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与预案模式探讨 [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10 (1): 139-143.

[7] 胡宝国. 构建校园安全共同体: 从疫情  
防控的角度思考高校校园安全机制的健全和完  
善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35 (3): 126-133.

[8] 冯劲涛, 郭泽邦, 李志华. 大学校园应急  
响应机制研究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0 (5): 41-43.

[9] 黄明. 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N]. 人民日报,  
2020-04-24 (11).

[10] 戚建刚, 张哲飞. 高校与行政机关间  
应急管理职能配置的优化 [J]. 行政法学研究,  
2016 (4): 64-73.

[11] [16] 朱敏. 依法应对高校突发事件的  
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J]. 思想理论教育, 2017  
(5): 102-105.

[12] 安春元, 武宇坤. 论高校突发事件应

对中的法律适度介入 [J]. 高校教育管理, 2016  
(6): 51-55.

[13] 王艳平. 高校疫情防控应善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 (4): 108-111.

[1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5] 郑成良. 现代法理学 [M]. 长春: 吉林  
大学出版社, 1999: 76.

[17] 钟开斌. 新时代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为何与何为 [J]. 中国减灾, 2020 (9): 18-21.

[18] 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  
势 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N]. 人民日报, 2019-12-02 (1).

[19] 于永利, 康锐. 装备综合保障基础理  
论及技术的若干问题 [J]. 装甲兵工程学院学报,  
2010 (6): 1-8.

[20] 哈肯. 协同学导论 [M]. 张纪岳, 郭治  
安, 译. 西安: 西北大学科研处, 1981: 158-163.

(责任编辑 刘红)

##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Huo Qingsheng

**Abstract:** The 5<sup>th</sup>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sup>th</sup> Central Committee has made a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during the “14<sup>th</sup> five-year plan” period. High qual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ndispensable and effective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exist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not fully support the demand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dhere to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use advanced management theory,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ystem design from the aspects of leadership system and mechanism, laws and regulations, emergency plan, support and guarantee, emergency team constructi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etc. Through the above measur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build a high-qual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legal and standardized leve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Key word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countermeasures

# 生命旨归与危机理性： 全民安全教育体系的构建逻辑

梁 静 宋乃庆  
(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摘要:**在以高考为风向标的应试教育背景下,我国社会各向度的危机防范意识薄弱,公民安全素养有待提升,安全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短板。时下,我国安全教育的实然样态主要表现为认知窄化、价值遮蔽和文化缺失的工具化教育价值取向,普遍存在师资不足、资源零散和目标不清等问题。借由生命哲学视域对生活实践中的危机加以理性审视和反思,深刻认识我国人民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至高无上的国情,反躬自省并多方协同,开展形式多样和内容完备的安全教育,构建本体论、认识论和整体论逻辑下的全民安全教育体系,从而提高公民整体安全素养,并确保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安全教育;生命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 G40-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1-0066-10

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既是一部辉煌的文明史,又是一部与各种灾害、危机相伴生的历史。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人口急剧膨胀,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自然灾害、人为灾害等各类危机事件在当今时代更为频繁地发生,给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直面危机,认真思考和审视危机发生各阶段的多个向度,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课题。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减灾战略秘书处发起“减灾始于学校”活动,<sup>[1]</sup>以促进并改善学校的安全教育,可见国际社会已普遍意识到教育是防灾减灾、应对危机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我国的教育体系中也有安全教

育、生命教育和灾害教育等,如自1996年起,将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设立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以推动和加强中小学安全教育;2007年,教育部制定并出台《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通知;2008年,中央明确提出将灾害预防等科技知识纳入国民教育,提高全民防灾意识、知识水平和避险自救能力,<sup>[2]</sup>且把“5·12”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将“重视安全教育”作为战略主题纳入总体规划;<sup>[3]</sup>2020年,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强调新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指导大中

收稿日期: 2020-11-28

基金项目: 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研究”(19ZDA359)

作者简介: 梁静,女,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领导与管理、教育心理学研究;宋乃庆,男,教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论、数学教育研究。

小学开展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 13 个重点领域的安全教育。<sup>[4]</sup> 安全教育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提升全民有效应对危机的能力,进而提高全民生活幸福感,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是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板块。

### 一、实然样态:安全教育缺场的工具化教育价值取向

安全需求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以形成安全意识、普及安全技能、实现人身安全为目标的安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其核心在于积极关注并守护学生生命,因为生命不仅事关安全教育,更是一切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教育的终极指向在于充分挖掘人的生命潜能,提升生命质量,彰显生命价值。<sup>[5]</sup>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教育从“逻辑起点”到“行动指向”皆应诠释生命的特性。<sup>[6]</sup> 安全教育缺场无疑是生命教育的缺场和生命价值的遮蔽,教育呈现工具化价值取向,但生命在场本属教育的基本价值样态。所谓教育中的生命在场,不仅指有形的物质生命体在场,更是蛰伏隐蔽的生命内涵、精神主体经层层剥离后的潜能激活。生命在场的教育以学校为生态场,以课堂为生长平台,师生双方共同营造出民主、和谐的场域氛围,知识、情感、态度、意义、价值观、文化等在其间自由涌动并交相辉映,师生双方共同经历思维的碰撞、智慧的启迪、生命层次的拓展,各自生命的独特性、主体性、丰富性、创造性、发展性得以多重展现。<sup>[7]</sup> 通过一场能“看见”彼此的生命际遇,生命发展的个性化需求得以尊重,健全人格获得陶冶,内在生命力被唤醒,生命主体间达成有效交流。然而,在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背景下,生命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于升学无用的安全教育缺场是教育的常态,其现实生态堪忧。

#### (一) 认知失当:安全教育的窄化

社会学范畴的安全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安全。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冷战结束,学界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非传统安全的个体安全(即人本安全)。<sup>[8]</sup> 非传统安

全理论代表学者巴瑞·布赞(Barry Buzan)在《人民、国家和恐惧》中指出,安全主体向下延伸到个人,关注点置于个人层次。他认为个体的人是安全最终的指涉对象。<sup>[9]</sup> 由此,研究领域也由社会学转向了教育学。教育的逻辑起点是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其目标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在教育学领域,安全的内涵便具化为人的个体安全,即在社会存在中,个体生命所拥有的安全、稳定、无威胁的状态。个体生命包含身、心、灵三个层面,因此,安全教育在主要关涉个体生命安全的同时,也应观照其社会心理安定和精神安宁两个层面。而我国现有教育体系对安全教育存在一定认知偏差,将安全教育简单等同于逃生教育、防灾教育等,重在技能操作层面,未触及安全教育深层的情感和价值维度。由于认识不到位,在实际教育中,安全教育有被窄化和表层化的倾向,难以起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 (二) 价值异化:人本价值的遮蔽

教育的价值应是工具性与人本性的双重统一,一方面是国家发展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利器,是个人改变境遇和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另一方面亦应充分关注教育对象作为生命个体的成长所需。我国早在 2007 年颁布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已明确指出:学校要保证公共安全教育的的时间,并要安排必要的时间,开展自救自护和逃生实践演练活动。<sup>[10]</sup> 实际上却难以保证,大多时候被应试科目所挤占,即便按照规定开设了安全教育课,往往也是形式大于内容。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全国兴起了防灾、减灾安全教育热,国家大力推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也积极组织实施,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害经历被淡忘,生活再度步入常态,部分学校的安全教育课程便被视作“豆芽课”,沦为学校教学计划和课程表的点缀。从理论上讲,“人本”首先是着眼于个体自身的生命之本、生存之本,认识到个体的本能、认知、情感、意志、尊严与价值;其次是由人的存在延伸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多重关系。学校安全教育本应围绕学生个体在生命成长不同周期的实际需求,结合学生所生活的时

代背景,有针对性、分步骤开展。而实际的安全教育虽然在形式上具备教育活动的几大要素,如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但大多是以行政命令为驱动,以完成任务为导向,未能将受教育者的情感、需求、选择和价值摆在主体位置。因此,各级各类学校的安全教育大多流于形式,普遍存在被动应付不具主动性、知识笼统不具操作性、内容粗放不具地域性、形式单一不具针对性等问题。在讲究实用、效率至上的时代,如何做到事过不境迁,由片面追求教育的工具性价值转向同时注重彰显人本价值,让安全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真正名副其实,是当前教育需认真对待的问题。

### (三) 文化缺失:内生力量的迷失

我国学校安全教育大都停留在重视知识传授和技能学习的技术主义工具理性层面,存在非文化倾向。文化是由生活在同一地域人们共有的价值、规范、信念、知识、技术等要素构成。<sup>[1]</sup>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国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走向。任何教育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教育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文化亦具有潜在的教育和教化功能。韦伯谈到,“中国人对一切事物的‘评价’都具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重视自然生命本身,故而重视长寿,以及相信死是一种罪恶”<sup>[2]</sup>。看重生命、畏惧死亡、忌讳谈论死亡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受此影响,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将有生命威胁的危机视作偶发事件,而不做事先警惕防范。有媒体曾报道在一些本可以避免造成人员伤亡的危机事件中,却因人们的恐慌心理导致了集体踩踏事件,或是过度惊吓中慌不择路而跳楼身亡。这些次生灾害的背后,实际上是缺乏危机文化的表现。在微观层面的学校安全教育中,让学生了解各类安全知识、学习逃生技能、学会在危机事件下的自我保护等基本生命安全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在逃生过程中能否冷静判断、从容逃生,是优先自我保全还是和他人互助互救,抑或舍己救人;在成功逃生之后,如何应对重大创伤事件后的应激障碍,如何看待活着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如何恢复重建生活的勇

气,以及如何看待人类和危机共生等问题,都需要以正确的生命价值观作为文化引领。在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中,危机发生前如何持续开展全民预防警示教育,危机发生中如何及时协同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有效应对将损失减到最小,以及危机发生后如何恢复重建、形成长效机制等,文化无疑是贯穿其中持久又有力量的精神内核。文化是土壤,在文化自觉的根基上展开的全民安全教育才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鉴于以上工具化教育价值取向,在实际的安全教育中,往往存在师资不足、教学资源匮乏、教学目标不清等现实问题。首先,学校普遍缺乏专业、专职的安全教育老师,安全教育课多由班主任老师等临时兼上,培养大批合格的安全教育师资力量是当务之急。其次,在教学资源方面,缺乏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水平的系统性安全教育教材,亟需有效整合利用政府、社会和家庭的教育资源,建立联动机制。最后,教学目标方面缺乏分级分段有针对性的目标分类,难以保证安全教育的实效。

## 二、危机反思:生命哲学视域下的理性审思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3]</sup>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其生存状况、生命质量不仅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而且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不可分。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和科技迅猛发展,世界局势和社会结构亦随之发生深刻改变,全球环境、资源、人口等危机一直持续困扰着人类。面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危机,迫切需要人类反求诸己,回归理性,从哲学的高度审视生命的内涵、危机的本质。

### (一) 敬畏生命的价值追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和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浪潮之中,人类的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被重塑,主体性得到不断提升,

同时人类与自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也愈加严峻，这亟待从哲学高度加以反思和审视。在此背景下，生命哲学成为 21 世纪的主流哲学，是人类生命、生活的理性价值表征，<sup>[14]</sup> 其将关注点聚焦为人类的生命，强调通过生活实践反思，进而提升和完善人类的生活，追求更高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生命作为哲学和教育的逻辑起点，历来是中国古人致思以成学的根茎，<sup>[15]</sup> 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哲学思想，历来倡导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涵养生命，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西方，生命价值也是其文化的关注点，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泽于 20 世纪初首次明确提出敬畏生命的思想理念。他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sup>[16]</sup>。可见，敬畏生命的价值理念是东西方生命哲学思想的交汇，其本质就是敬畏一切生命，更敬畏人的生命，尊重包括人类和一切生命体的生存权利、存在价值、自由和尊严，并以此为指导，关照和把握一切生命现象以及一切生命之间的关系。<sup>[17]</sup> 经由敬畏生命，从而建立起人与宇宙、与“天”的精神联系，使人内心体验到生命伦理所赋予的意志、能力与创造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物理生命、精神生命以及社会关系的重大丧失或创伤，因此，安全教育应该融入生命哲学思想，将敬畏生命作为价值追求，强调生命在场，以人本安全为核心，真正关注到人的身、心、灵三个层面，传递积极向上的生命态度、情感和价值观。

### （二）危机反思的理性维度

人是理性的存在物。所谓理性，对应于情感，指行动之前对事件科学、客观、全面地审视、分析从而把握事实真相，并结合已有知识经验做出适当反应的思维和行为特征。<sup>[18]</sup> 伴随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的理性思维得到空前发展，面对危机事件，其原有的生存法则和价值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人们开始意识到必须经由慎思明辨来重建社会生活实践的伦理价值体系，于是便借由理性，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理性反思中不停追问人类在世界历史视域下生命有限与无限、现象与本体、行上与行下的关系问题。<sup>[19]</sup> 迄今为止，人类通过理性反思确立了敬畏一切生命的立场，树立了和谐共生的理念。尽管人的生命具有最高价值，人是根本目的，但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同时还需照应到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体，人应力求摆脱自身偏见，摒弃对其他生命的疏离，实现与周围生命的休戚与共。<sup>[20]</sup> 对危机的理性反思用生活觉解的方式为困顿的人类提供智慧指引，意图从形而上的层面为人类建构一个更合理的生活世界。在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并不乏对危机的理性反思，如居安思危、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有备无患、防微杜渐等思想。基于此，安全教育也应该坚持在理性中反思危机，尤其要加强警示教育，如以交通、消防、病疫、自然灾害、人为灾祸等不同安全主题为题材，警示人们可能存在的潜在安全风险，树立敬畏、守护和发展生命的教育思想。

### 三、应然样态：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

生命是人类世界存在的基本前提，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安全教育观是我国教育界的共识。危机频发时代下，安全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素养已成为民众的必备基本素养。以汇聚中西方生命哲学思想的敬畏生命理念为精神引领，纵观历史、现实和未来维度，理性审视人的生命体验、生命境遇、生命内涵，构建以生命为旨归、理性为指引的全民安全教育体系乃是时代的使命。

#### （一）以本体论逻辑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

本体论探究事物的本身、本原和基质，侧重事物最一般的存在属性和该事物是其所是的特定属性，是领会和把握事物的逻辑起点。以本体论逻辑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旨在通过探源性、反思性理论思维，寻求其本源性和逻辑统一性，从而帮助人们客观、正确地认识全民安全教育体系的本质和特征。本文从全民安全教育本质、全民安全教育内容、全民安全教育模式和全民安全教育评价四个方面探讨全民安

全教育体系的建构。

### 1. 全民安全教育本质：关注整全的人

本质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不同于灾害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或是应急教育，安全教育复归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本位。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在自然境域之外，运用其思维能力和语言符号构建了一个抽象的文化境域，故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因此，不同于动物，人同时存在于外在物质世界和社会文化主导的内在心理世界中。现有的灾害教育以工具价值为导向，强调技能性知识和训练，人的精神价值受到了遮蔽；生命教育指向与生命有关的具体现象并注重对生命活动和生命整体的哲学反思与体验，彰显了人类生命的理性价值，而在实践层面则难免陷于空泛，不接地气。诚然，当今时代的人更易受到“知识技能的僭越，科学主义的肆虐和工具理性的奴役”<sup>[21]</sup>，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sup>[22]</sup>。有别于其他教育，全民安全教育不再把人视作单向度的存在，充分观照人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把人视为身、心、灵的辩证统一存在，还人以自在自为，实现人身心平衡并全面、持续地发展。这既是全民安全教育的本质，亦是我们为之努力的目标。

### 2. 全民安全教育内容：兼具系统性与实用性

教育内容是教育活动能够顺利开展的载体，是联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纽带，因此全民安全教育内容是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现有的安全教育内容零散、粗放，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应该在教育行政部门统领下，联合专业机构，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和不同学段的学生，在充分研究其年龄特征和个性特点的基础上，力求开发出以安全教育教材、宣传学习手册、电子影像等为载体的，具有专业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的教育内容。对幼儿园和小学低段儿童采用主题性安全教育内容，将基础性安全知识和技能融进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对小学中高段儿童的安全教育内容则应紧贴生活，如自行车骑行安全、溺水防范、紧急求助等；对于初高中阶段的青少年，安全教育内容中应更多引入规则和责任担当意识；

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内容还应有道德与法治、社会意识形态、国家安全观等。全民安全教育内容体系要前后自然衔接，保持系统连贯，其中“珍惜生命，爱己及人”的生命价值主旋律和定期模拟演习的实践训练应贯通于各阶段的安全教育内容中。

### 3. 全民安全教育模式：由同质化走向“后模式”<sup>[23]</sup>

教育模式指教育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具体方式。日本学者村井实根据时间的先后把教育模式总结为：手工模式、农耕模式和生产模式。手工模式指教育好比制作手工艺，教育者可以随意塑造受教育者；农耕模式把受教育者比作有生命力的植物，强调其自然生长；生产模式把教育视作工厂，受教育者在工厂被加工成社会有用之才。<sup>[24]</sup>三者的共同点均是以“物”度“人”，人的物化和失位导致人尊严的异化，实为教育之殇。村井实主张现代教育应启动人类模式，复原受教育者的“人”位。我国的全民安全教育模式应奋力从工厂模式走进人类模式，在具体的教育环节中，改变传统的机械说教和“满堂灌”的单一化方式，充分调动和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在以课堂教学、官方主流媒体宣传教育为主渠道的同时，综合运用游戏、表演、主题班会、社团活动、知识竞赛、社区展演、纪念日活动、自媒体平台传播等多元并存的方式，因势利导并寓教于乐。

### 4. 全民安全教育评价：引领未来发展

教育评价是依据相关标准，通过一定途径对教育活动的实施结果进行科学评定与判断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衡量教育效果是否达成预期，评价结果可作为甄别、选拔的价值尺度，更是未来发展走向的价值引领。全民安全教育评价是确保科学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的重要保障环节。传统考试是简便易操作的评价方式之一，普遍适用于学校教育中对知识的检验。安全教育由于其实践性特点，在评价中应优化评价策略，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和手段综合评定参与性、过程性和主观能动性等。为切实构建有效的全民安全教育体系，可建立学生的安全教育

档案,将各学段所上的有关课程及成绩、参与实践活动的情况、所受的技能培训及所获等级等记录在案,或可作为进入高一学段的升学参考。对成年人的安全教育评价应有更高的要求,或可将是否安全作业、有无重大安全事故与年终考核、评优与晋级挂钩,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

## (二) 以认识论逻辑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

认识论探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讨论认识的本质、发生规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人的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等哲学问题。<sup>[25]</sup>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其认识和把握的客体既包括现实世界(自然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也包括人类自身。从认识论逻辑出发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要求对人的生命存在状态、本质需求、身心感受有更深刻的认识。人类对安全的需求处于需求金字塔的基座,<sup>[26]</sup>因此,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应从提高民众身心安全感着手,促进人类更加自在自为地活着。

### 1. 人身安全教育: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的基石

身体是生命的载体。家长应结合生活中的每一个契机引导孩子认识身体各器官,了解身体各部分的不同功能,学会爱惜身体并能识别、防范侵害身体的行为。家长和老师要教给孩子保全个人生命、健康、财物和名誉的安全防范知识和自救求救技能,从生活细微处着手,通过生活实例、教学案例、主题讨论等多种途径增强孩子的生命安全意识,使其懂得生命之无可比拟性,进而形成珍视自己、他人及一切生命体,尊崇生命存在独特价值的人本意识。

### 2. 心理安全教育: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的精髓

在人身安全的基础上,内在“安全感是心理需要中的第一要素(饮食、睡眠、性需要等都属于生理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sup>[27]</sup>,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心理健康。安全感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指身体和心理上受到保护的一种感觉,形成于个体生命早期。<sup>[28]</sup>生命早期的婴幼儿阶段是形成

安全感的关键期,家庭作为个体生命的起点,为个体提供基本生存所需的同时,更是个体形成和获得安全感的源头。生命早期在家庭养育中获得足够安全感的孩子便具有了健康的生命底色,这样的个体能更多体验到积极、愉悦、善意、信任等正向情绪,能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自我成长,追求更高的抱负水平;反之,安全感缺乏的个体则更多体验到焦虑、恐惧、威胁、敌意等负向情绪,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和自我早年的匮乏感做斗争。学校应通过分阶段有计划的心理安全教育,提高学生的心理应激能力和心理韧性水平,使其以健康的人格和积极的心理策略筑牢心理防线,抵御危机事件的冲击。<sup>[29]</sup>

### 3. 身心健康和谐: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的灵魂

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成员身体健康、安全感俱足,那么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关系则是一种相互塑造、彼此促进的“互惠同构”的动态关系,<sup>[30]</sup>自然会组建一个更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家庭作为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也是开展全民安全教育的最佳场所。以家庭为原点,学校为支撑,延伸到社区,扩展到全社会,四者相互渗透,共同促进提高公民的身心健康水平。社区应整合社会资源,遵循以人为本精神,倡导生命关怀,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开展人文主题的社区活动,联动学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家庭科学养育,建构理性关爱、温馨、和谐的家校社群文化,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触动生命,即可形成内隐且稳定的全民安全教育体系。

## (三) 以整体论逻辑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

整体论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哲学规则,将事物内在各部分视为有机整体,且整体大于各部分简单相加之和,具有超越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更高层次的特殊关系性属性和丰富内涵,具有自组织、自调节、开放性、动态向上趋向的特征。以整体论逻辑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应以政府为主导,媒体为中介,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研究机构为主轴,经由教育辐射,传导带动社区、家庭和个人,形成政府、学校、家庭和社区等齐抓共管、多元主体协同作用,覆

盖全社会的全民安全教育有机体。

### 1. 政府层面建制立法：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之国家逻辑

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而宏大的工程，需在国家层面以政府为首，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宏观组织引导与监督调控。建章立制，完善安全教育立法是关键。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公民利益代表者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益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各项政策法规的弹性制定与科学决策，以形成预警和长效机制。政府根据以往经验预设危机事件下可能存在的确定因素引发的威胁以及政府在危机爆发情况下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措施等，都将在特定情境下以一种特殊方式从政策法规上被严格而笼统地界定。<sup>[31]</sup>如2003年SARS时疫期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政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为法律基础，及时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应急处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并以法规制度为前提明晰了各方主体权力、责任和义务，其中第二章第十三条明确指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公众开展突发事件应急知识的专门教育，增强全社会对突发事件的防御意识和应对能力”<sup>[32]</sup>，为后续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涉及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安部、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资源、设施设备以及技术力量的统筹协调，亟需政府从国家层面制定、颁发《全民安全教育法》，将全民安全教育上升为国家意志，纳入法律刚性约束，使之成为受约束各方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实现安全教育的法制化，确保安全教育不受教育行政部门人事变动、国家任务重心调整等影响，做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应将安全教育的经费预算投入和资金保障明确写进法律条款中，保障安全教育得以有效开展。

总之，法规制度作为人类活动中一种超越组织之上的模式，承载着社会的普遍价值体系，从思想层面和现实层面指导、规约和监督着社

会团体及个人的基本言行，一旦制度的精神内化于心便会外化于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是一种无声教育，会在无形中提高全民的危机防护意识。

### 2. 学校、家庭和社区等联动：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之社会逻辑

学校是专门培养人的场所，承担着育人的社会责任，是安全教育的责任主体。学校首先应聚焦校园安全建设，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实行目标化的安全责任制，为师生创建安全的工作学习环境；其次应系统研究，深刻理解安全教育的外延和内涵，培养专门的安全教育师资队伍，严格执行国家的安全政策法规，让安全教育课名副其实。安全教育目标，大中小学幼儿园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各级各类学校应循序渐进，逐步将生命安全基本知识，危机情境的逃生技能，健康的情感、态度、生活观，与提升生命质量、实现人生价值等教学内容融会贯通，旨在通过安全教育让学生不仅学会危机情境下保护人身安全的知识技能，提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更要明白生命可贵，学会珍惜自己和他者的生命，感恩自然，努力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和人生境界。同时应注重教育的连续性和前后衔接，将课堂上知识点的学习与课外的演习演练相结合，用多种方式提高安全教育的实效性。

家庭是组成社区的单位，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是进行全民安全教育的主体力量。日常生活中适时的安全教育不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情景式教育令人记忆深刻。一个学生牵动一个家庭，安全教育可经由学生联动家庭和社区。如学校设计亲子活动，发动学生向家人讲解安全教育知识并组织实施家庭活动，不仅可以使学生巩固学习，同时也将安全教育成功辐射到家庭。在增进学校与社区的双向合作方面，通过专家进社区、典型案例进校园的互动方式，以及定期组织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宣传活动，联合社区模拟安全演习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和居民的安全防护能力与合作互助意识，共同营造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全文化氛围。

### 3. 媒体为中介：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之媒介逻辑

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的数量、传播途径和传播速度得以飞速发展。生活在信息网中的人们寻求信息并依靠信息分析、判断而做出抉择。媒体作为信息的容器和传播通道是现代社会的组成要素。在突发的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体作为联系政府与公众的纽带，其宣传报道是各方面信息沟通的渠道，特别是在社会环境不明朗、有威胁性或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公众会更加强烈地依赖媒体。<sup>[33]</sup> 这便为媒体的普及教育功能提供了空间。

以时间为序，全民安全教育体系的构建可分为三个维度：危机爆发前的潜伏酝酿期、危机发生期和危机消退期。媒体作为公众、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信息交流平台，在危机发生全过程的全民教育方面可以大有作为。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危机爆发前，普通民众凭以往的知识 and 经验大多意识不到险情的逼近，此时媒体应以其特有的敏锐感知发挥环境监测作用，广泛搜集信息，在多方求证、周密考察的基础上，形成严谨专业的专题性报道进行社会性预警，引起政府和公众的警觉。在危机爆发期，面对突如其来的新情况和不明发展态势，公众感觉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本能地心生恐惧，便会多方寻求信息，以增加确定性和掌控感。此阶段媒体一方面应及时向大众普及关于病毒的科学知识，教大家防范措施；另一方面需对危机的不同发展阶段持续追踪、深入报道，让大众充分了解，客观认识，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准确透明的信息传播，培养公众的危机意识和甄别判断谣言的能力，传播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正面的社会价值观；<sup>[34]</sup> 同时还应抓住危机中的焦点事件，如“民众抢购双黄连风波”，对大众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公众理性思维、科学防疫。在危机消退期，媒体应邀请心理专家开设心理专栏，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自助方法，搭建心理救助平台。要做到化“危”为“机”，需要媒体发挥理性反思和教育功能。陶行知先生讲过：“我们必须把历史的教训，和个人或集团的生活联系起来。历史教训必须通过

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sup>[35]</sup>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及时整理危机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梳理危机发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引导政府和大众集体反省，让危机的代价经由反思、过滤，转而沉淀为促使公共政策进一步完善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安全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素养是公民的必备基本素养。身处日益复杂多变的危机时代，各类安全事件防不胜防，唯有通过安全教育增强公民的危机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救护技能，提高公民自身抵御风险的“免疫力”，方能筑牢根本。当今的中国，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做保障，人民的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此时代背景下构建全民安全教育体系，开展形式和内容完备的安全教育，不仅对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更关系到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美满以及社会和谐稳定。

#### 参考文献：

- [1] 杜永红. 灾害教育：从失衡走向平衡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0 (5): 70-75.
- [2] 胡锦涛.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EB/OL]. (2008-06-23) [2020-02-18]. <http://news.sina.com.cn/c/2008-06-23/191314061433s.shtml>.
- [3] 教育部网站.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EB/OL]. (2010-07-29) [2020-02-2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 [4] 教育部网站. 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 [EB/OL]. (2020-10-20) [2020-11-2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010/t20201027\\_496805.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010/t20201027_496805.html).
- [5] 叶澜. 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36.
- [6] 朱德全，许丽丽. 技术与生命之维的耦

合：未来教育旨归 [J]. 中国电化教育，2019 (9): 1-6.

[7] 胡文龙. 生成性思维视域中的研究型教学探讨 [J]. 教育科学，2010，26 (2): 46-50.

[8] CUTTER S L, MITCHELL J T, SCOTT M S. Reveal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people and places: a case study of Georgetown County, South Carolina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0, 90 (4): 713-737.

[9] 李开盛，薛力. 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流派与特征 [J]. 国际政治研究，2012，33 (2): 93-107, 9.

[10]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 [EB/OL]. (2009-03-28) [2020-02-18].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9-03/28/content\\_5533.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9-03/28/content_5533.htm).

[11] 王晓葵. 灾害文化的中日比较——以地震灾害记忆空间构建为例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6): 47-55.

[12] 韦伯. 儒教与道教 [M]. 王荣芬，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16.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

[14] 舒远招. 21世纪：哲学是人类生命的理性表现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 (3): 2-6.

[15] 黄克剑. 老子梳解 [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3.

[16] [20] 施韦泽. 敬畏生命 [M]. 陈泽环，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7-8. 16.

[17] 夏东民，陆树程. 敬畏生命观与生态哲学 [J]. 江苏社会科学，2008 (6): 72-77.

[18] 王思斌. 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介入社会危机事件的专业情怀和专业理性 [J]. 社会工作，2020 (1): 4-8.

[19] 杨普春. “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三重张力 [J]. 宗教学研究，2019 (4): 24-29.

[21] 刘济良. 生命的沉思：生命教育理念

解读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6-71.

[22]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3] 朱德全，杨磊. 教学论发展70年：实践样态与逻辑路向 [J]. 教育研究，2019，40 (9): 14-28.

[24]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764.

[25] 吴基传，翟泰丰. 大数据与认识论 [J]. 哲学研究，2015 (11): 110-113

[26] 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第3版 [M]. 许金声，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19-30.

[27]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M]. 高觉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8] 丛中. 安全感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J]. 心理与健康，2008 (3): 4-5.

[29] 刘晓明.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学校心理安全教育 [J]. 教育与教学研究，2020，34 (3): 27-31.

[30] 马斯洛. 人性能达到的境界 [M]. 曹晓慧，张向军，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9: 191.

[31] 蔡志强. 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社会危机治理的基础研究 [D]. 上海：复旦大学，2005.

[32] 中国政府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EB/OL]. (2008-03-28) [2020-02-2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6399.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6399.htm).

[33] 德弗勒，鲍尔-洛基奇. 大众传播学诸论 [M]. 杜力平，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 353.

[34] 赵路平. 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研究 [D]. 上海：复旦大学，2007.

[35]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3卷 [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717.

(责任编辑 刘红)

## Value of Life and Crisis Rationality: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National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Liang Jing Song Naiqi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with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the vane, the crisis prevention consciousness of each direction of our society is weak, and the citizen's safety literacy needs to be improved. Safety education is the short board in our education system. Nowadays, the reality of safety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nstrumental education value orientation of cognitive narrowing, value masking and cultural deficiency. Through the view of life philosophy, we should examine and reflect on the crisis in life practice rationally, deeply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upreme right to life, body and health of our people, reflect on ourselves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in many ways, carry out safety education with complete form and content.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safety education for all under the logic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holism, so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safety literacy of citizens and ensure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society.

**Key words:** Safety education; Life philosophy; Ontology; Epistemology; Holism

专  
题  
研  
究

(上接第 58 页)

legitimacy mechanisms of regulatory legitimacy, simulation legitimacy and normative legitimac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secondary colleges from competitive convergence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legitimacy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for the system convergence. In order to avoid this conver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and scientific “double first-class” evaluation mechanism, respect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law, give secondary colleges more independent space, establish a balanced mechanism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reation of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It can be foreseen that i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perio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he legitimacy of regulation will still maintain a high level, and may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legitimacy of simulation will gradually decline, and the legitimacy of norms will gradually increase.

**Key words:** Schools; Deans; Regulatory legitimacy; Simulation legitimacy; Normative legitimacy; Institutional convergence

# “后真相”引发学生价值判断的困境及教育的应对

高洁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37)

**摘要:**“后真相”作为新媒体时代出现的一种特殊信息表达形式,可细分为“慢真相”与“无真相”两类。其使人的价值判断思维进程变为价值判断在先、事实判断在后的无限循环。该循环成为人们新的认知模式,并凸显社会的复杂性。“后真相”作为人们新的价值认知模式,引发学生价值判断的困境:价值判断的驱动力情理失调;对判断的事实对象不求甚解;价值判断的机制变得简单线性。鉴于此,教育有必要解决此困境:提升学生价值理性的水准,从盲目判断转向审慎判断;加强学生对信息真实度的甄别,从草率表达价值立场转向对事件本来面目的追本溯源;升级学生思维结构,从简单线性思维升级至复杂系统性思维。

**关键词:**后真相;价值判断;困境;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21)01-0076-09

网络发展与社交媒体的变革,解构了人们以往的信息认知模式,“后真相”<sup>①</sup>现象产生并逐渐成为常态。当学者们用“困境”、“病症”或“风险”等一众消极词语来形容“后真相”现象并始终对此持悲观态度时,人们有必要对这一现象的表现、本质与影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后真相”使铺天盖地的假新闻同时暴露在成年人与未成年人面前,成年人尚且未做好应对“后真相”的准备,价值观尚不稳定的学生则更罔知所措,由此引发其价值判断的困境。面对难以平息的信息反转及不确定性风险,教育有必要思考如何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解决其在动力、内容与机制诸方面的困境。

## 一、“后真相”的本质之思

“后真相”一词因网络大规模的使用而一跃成为现代化浪潮中的流行词语。其实,不论是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还是勒庞的《乌合之众》、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等都曾深入阐述过电视、综艺节目或时尚观念等技术生活的变革给社会生态带来的改变。“后真相”则反映了互联网与自媒体等信息技术的崛起及其影响。为避免“后真相”这一新近诞生的词语被错误理解与滥用,我们首先需了解它的本质意涵是什么。

《牛津词典》从信息接收方的认知视角对

收稿日期:2020-11-01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社会科学计划一般项目“教师价值教育行动力研究”(SM201810028007)

作者简介:高洁,女,讲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研究。

“后真相”现象进行定义：“在形成公共意见的过程中，情感与个人信念、信仰相对客观事实而言更具影响力。”也有学者从信息提供方的视角出发，认为“后真相”是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sup>[1]</sup>这两种定义作为发生定义（genetic definition）描述性地还原了制造与接收“后真相”信息时人们不同行为间的角力过程，但“后真相”的形态类别、其对价值判断思维进程的形塑及其对人们认知模式的改变与社会影响等尚需深入研究。

### 1. “后真相”可细分为“慢真相”与“无真相”

“后真相”不是“非真相”，所有附带“后”（post）的词语都与不可名状的不确定性相关联。“非真相”确定为假，“后真相”则可能为假，也可能为真。直接经验的愈发有限使“后真相”分为两类。一类“后真相”乃有意为之的误导。此处的有意误导并非完全指恶意误导，如出于善意提醒而传播假新闻的行为就并非恶意，恶意误导只是有意误导中的一部分。有意误导的“后真相”有悖于被证实的事实，且因事实真相有确凿证据，争议性小，故此类“后真相”可在人们层层循证后获得真相。谎言、谣言、偏见、断章取义与望文生义等均属此范畴，正所谓“真相是个多面体，别有用心的人只会描述其中一面”<sup>[2]</sup>。虽然人们在这类事件中获得真相的时间会滞后、延迟，但人们终究能够在质疑、对话、追问与举证中辨别真伪，人类理性对此类“后真相”的鉴识依然有效。另一类“后真相”乃无意为之，与这类“后真相”相对的真相虽然无法被严格定义为事实，但也绝非错误或谎言，如人的主观喜好、信仰以及对未来的预测等。面对这类“后真相”，人们在一定时间限度内始终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对真相的探索已超出人们的能力。它或指向未知；或隶属主观范畴，不存在唯一真相，相互矛盾的两种论述皆可成为真相，如“薛定谔的猫”，“同时都是、同时都对”。

第一类“后真相”威胁着事件表层的真实

性，而第二类“后真相”考验着事件背后隐匿着的真理生成机制与人的理性认知，人们担心几千年来哲学追求的“真”再也不存在或无法被认识。第一类“后真相”并不涉及休谟怀疑论中必然真理的覆灭，即使新闻经常反转，但事实真相总会水落石出，只是什么时候被知晓的问题；而面对第二类“后真相”，正如克尔凯郭尔承认世界上除了科学的客观真理外，还存在一种“客观不确定性的未知”<sup>[3]</sup>。如果说第一类的“后真相”现象可称为“慢真相”的话，那么第二类“后真相”的“后”则代表“遥遥无期”，亦可称为“现阶段的无真相”。无论哪一类“后真相”现象，其数量的倍增都使人们不能再简单地用抵触、批判的态度面对它。相比将“后真相”单纯定位为谎言（old-fashion lies）、扯淡（bullshit）、沉默（silence）、符号化的插科打诨（symbolic buffoonery）<sup>[4]</sup>，主观主义的泛滥与相对主义的死循环<sup>[5]</sup>，及群体的犬儒心态与社会共识瓦解的表征<sup>[6]</sup>等这些将“后真相”视为不正常、需对抗的悲观事件，接受“后真相”作为网络赋权时期必然出现的全新表达方式，探究其对人的价值观生成带来的影响及其给教育带来的契机则更必要。

### 2. “后真相”使人的价值判断思考进程变为价值判断在先、事实判断在后

以《牛津词典》的定义为基础，人们还将大众面对“后真相”时的反应界定为“情感在先，事实在后”。这一演绎使人们对大众面对“后真相”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态度产生误解，认为大家既不在乎也无法掌握事实的真相，仅放任情绪的发泄，追求快感的获得。其实人们并非不在乎真相，只是长久以来在“真相时代”中，人们的思维模式已然习惯在第一时间内根据呈现为真相的事实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标准并期待获得认同。此过程是人类的道德性刺激反应与向他性沟通决定的，任何人都会对外界事件产生即时的价值性反馈。同时，真相时代的事实始终为真，使人们不用进行事实判断直接进入单向、不可逆的价值判断进程，形成了“相比事情是真是假，人们更关注事件结果中各方是对是错”的

习惯。对事件直接进行价值判断的思考模式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因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价值判断而持续创造着生活的意义。但今天信息传播途径的改变使每个人均可成为信息提供者，信息权威性的消失给“后真相”的入侵带来可乘之机，也改变原有价值判断的思考进程。“后真相”看似是人的情感被吸引、被诱惑，实质是人们根据事件表明态度并进行价值判断，找寻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志同道合之人，使自己与外界呈现价值自洽。人们并非不关注事实的真相，只是人们对事件进行价值判断是更大的使命，人们因身边人和自己有一样的价值判断而感到安心，从而获得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为什么当所有人均可发声的时候，人们浏览信息的标准从“依靠权威”变成“看我想看，听我想听”，这个过程其实是觅知音的过程。

所以，传统媒介时代，人们面对事件只进行价值判断，即思考事件中主人公应该怎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和自己的想法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对方犯了什么错。但“后真相”时代，人们在产生价值判断之后，还会因事实与价值的因果链被颠覆，被迫在事件反转时思考事件的全貌是什么。因此，“后真相”的产生将人们原先单一进程的价值判断思考模式变为“价值判断在先、事实判断在后”。“情感先行，事实在后”的表述并不正确，价值判断不仅来源于情感，也受理性驱使。网络上的确存在非理性的不负责任言论，但这并不代表人的理性无能为力。当人们开始思考“我们是否生活在后真相时代”，并准备以举例的方式来证明确实如此时，其实大脑已经诉诸理性，通过循证的逻辑来表明人们不仅在乎真相，而且用实际行动寻找着真相。正所谓人们不信仰理性，但时刻都在运用理性。<sup>[7]</sup>

### 3. 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无限循环凸显社会复杂性

“后真相”不仅使人的价值判断思考进程变为“价值判断在先、事实判断在后”，更准确地说，是变为“价值判断在先，事实判断在后”的无限循环。网络技术使人无数次地“在场”于跨时空的事件，无数时间、无限空间在今天

可以同时“在场”，但这样的时间与空间并非连续的，而是断裂、分叉的。“后真相”信息通过网络打破时间与空间的一维连续性，“使投向未来的意向性永远处于尚未完成或不可能完成的状态，人无法生成确定的意义而陷于未来的迷宫之中：一切互相矛盾的可能性都是同等可能的选项”<sup>[8]</sup>。任何事件从发生、报道、发酵、进一步讨论、反转到产生实质性结论都蕴含着事件的对象、主题与价值标准的多阶段、多线程变换。以前，单一线性链路的“事件发生—人的价值判断与生成”变成多向复杂链路的“事件发生—讨论—价值生成—事件反转—再讨论—价值再生成—再反转……”的不断循环。新的信息表达秩序为社会生活赋予新的认知秩序，它脱离既有的主客观阐释系统，在一些人认为“后真相”事件毁灭了“朴素的本体论的‘实在论’(realism)与认识论的‘符合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真相(真理)不再是符合客观现实的知识，知识不再获得严格的客观性检验”<sup>[9]</sup>，代表“真理已死”“客观性已消失”的虚无主义或独断主义到来时，这种对“后真相”现象的细致剖析，也使人发现，“真实的客观性在几百年的哲学解释中，不论是德国古典哲学视域下的客观思想，还是科学主义框架下异化了的纯粹客观性，早已被消解为主客体的统一性。真正的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主观观念与真正的客观性相遇时必定会产生悖论性的创伤”<sup>[10]</sup>，而价值事件中一定既有事实本身，又有主观信念，故这种悖论创伤之真，正意味着新的真理形态的诞生，也表明了“后真相”现象的讨论关键不在于客观性真理的消失，而在于“后真相时代的本质是价值思维、主体性思维凸显的时代，只有把价值思维、主体性思维纳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而这个时代中，把握真相的过程很复杂，标准更高了，也需要有更高的自觉性”<sup>[11]</sup>，同时，不同逻辑的碰撞也使社会生活更具复杂性。

“价值判断在前、事实判断在后”的无限循环使人们价值应然的愿景与现实的不确定交错丛生，困惑与解惑也相继发生。声音越多、世界越复杂。价值判断推进事实细节逐渐丰富，

进而促使人们再进行新一轮的价值判断，这个过程展现了事件中各因素间、各因素与整体之间相互联结、作用的状态，这种交互纠缠即为社会复杂性的展现。“后真相”时代中的不确定信息正是当下时代的“噪音”，复杂性以偶然的、变幻莫测的不确定方式构成对人类所追求的完整性、确定性与稳定性的挑战；而“价值判断在先、事实判断在后”的循环过程，即是在无序中寻找有序、应对社会复杂性的过程。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现象表明，社会生活总是以无序开端，无序与有序交融构成了复杂性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更高级秩序的新社会逐步形成，人们在不同层次的分析中推进对话与理解。理解不是一次性的活动，它在不断接续的理解中得到深化。所以，“后真相”时代下的社会生活并不存在从无序到有序，而始终是无序与有序的混响。这种混响凸显社会复杂性，同时也促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 二、“后真相”引发学生价值判断的困境

“后真相”的出现及其对人们价值判断思考模式的形塑，使人们如若继续沿用以往的价值判断模式则正好落入“后真相”带来的信息传播陷阱。而这无疑给价值观尚未稳定、价值判断受外界影响较大的学生带来困境。

### 1. “后真相”使学生价值判断的生成动力情理失调

价值判断的产生既依靠人们的理性驱动，亦借助人们情感的激发。理性通过质疑、反思与逻辑推理引出对价值标准的沉稳思考与真知灼见，而情感在召唤道德动机的基础上使人敏锐地感同身受他者的处境，将理性推演出的正当性与具体事件相结合。在人的价值判断中，毫无情感的抽象理性判断并不存在，只有情感没有理性的判断无法保证判断的无偏倚性。所以，价值判断在应然层面乃理性与情感共同融合的慎思性关切。但需要注意的是，情感是理性的基础，相比自然涌出的情感，理性耗费人们更多脑力，故依情感进行的直觉性判断是人

们进行判断时的首选。也正因如此，“后真相”时代，学生价值判断的驱动力逐渐情理失调。

学生作为网络的高频使用群体，接收大量来自自媒体的信息。与传统媒体运营逻辑不同，自媒体运营门槛很低，任何人均可成为自媒体的运营者。同时，相比传统媒体团队化、专业性的调查取证，有些自媒体受流量诱惑，肆意争夺人们的注意力与情感，其依靠编造和猜测产出的充满煽情与修辞的报道使深度缺席，事件真实性无从考量。如此，自媒体成为个体无节制发声的渠道。同时，媒体数量急剧增加与信息制造使虚假信息成几何倍数增长。当信息传播从经典事实时期（age of classics facts）过渡到数据事实时期（age of data-based facts）再到网络事实时期（age of network facts），<sup>[12]</sup>且“后真相”越来越多时，信息的过滤工作就落在信息接收方身上，考验着个体的理性水平。从人类范畴来说，虽然人类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但不胜枚举的人类百思不解、无能为力之事，证明着人类理性的有限。同时，真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性使然的因素阻碍理性发挥作用，将本就有限的理性变得更加力有不逮，如“人们常常为了效率而牺牲准确性”<sup>[13]</sup>；人们因对自身优越性的留恋而抗拒理性对真实的挖掘，拒绝理性带来对自我认同的破坏；同时，从众行为与“沉默的螺旋”<sup>[14]</sup>也一样阻碍理性的发挥。当本就有限的理性因各种缘由被再次限制时，个体理性的有限便被坐实。而那些理性尚未完全发展、价值判断尚依据自身好恶或重要他人的学生的理性水准就更被打上问号。按照经济学原理，若从众多“后真相”信息中筛选出真实信息需要耗费超出自身所能承受之时间、体力与脑力成本时，信息接收方便易产生无力感，就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逃避性地选择更容易或立刻就能得出结果的思维途径，即依靠自身的盲目原始力量，如个人情感、直觉或习惯对事件进行判断与选择，放弃推理与逻辑关系的理性思考，从而导致价值判断的动力更依赖情感而非理性，造成情理失调。这种放纵性的非理性价值判断使人无法走向对正当与善的认知与回应，是危险和错误的源泉。

## 2. 面对“后真相”，学生对判断的事实对象不求甚解

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呈递进关系，人们只有在确认事件真实呈现的基础上才能对事件中的善恶对错进行价值判断。即人们需先对事件内容是否如实客观描述发生进行事实性判断，才能对事件导致的结果是否满足自己的价值要求要求进行价值性判断与表达。真相时代，价值观教育重点讲述个体所应形成的价值观标准及其在价值判断中的正当言说，默认所有价值判断的对象为真，跳过对事实的质疑，直接进入学生价值观的培育，这就为学生落入“后真相”陷阱提供温床，使其对本应引发警惕的“后真相”内容到底是真还是假有所忽视。同时，人的本性还使人愿意相信“后真相”信息，因为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sup>[15]</sup>教育、食品、医疗、环境等方面的安全不断考验着人们对风险的承受与敏感程度。面对这些，人类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使人们天然地产生不安全感，被焦虑裹挟，但越警惕、越焦虑，越容易相信挑逗人们紧张神经的“后真相”信息，因为关注谣言的真实目的正是确认自己的焦虑，焦虑是人们抵御生存风险的一种方式，提醒自己时刻防患于未然。<sup>[16]</sup>所以人的焦虑越大，越关注事件的结果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反而对事件的细节内容囫圇吞枣，对内容表达中的模糊性与诱导性均有所忽略。在内容尚未辨别真伪之前，人们已经做出价值判断，甚至已经开始因事件可能对自身安全、利益构成威胁而产生焦虑情绪，担心不幸降临到自己身上。

科技的产生本可以使肉眼不可见的事件变得“有图有真相”，使个体回到直观“在场”，进而解决事实真假不可知的问题。但技术只能满足人的间接“在场”，当客观世界变成电子产品的平面屏幕时，人们“在场”所见的只是被截取、制造出来的场景，其塑造的意识形态具有故意性，所以网络技术实现的“在场”非但没有解决直观问题，反而带来了新的未知。看不见的不确定叠加故意生产的不确定，使人对内容真实性的把控不断变弱，个体焦虑也随之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判断水平产生倒退，

当视觉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时，相信看上去的而非实际的，放弃对内容的质疑，进而沦为“后真相”信息的追随者，成为其传播的帮凶。

## 3. “后真相”延续学生价值判断模式的简单线性

相比拥有复杂思维的成年人，大部分儿童抱持着简单线性、二元对立的判断模式，将人与事件简单地分为好与坏、善与恶，认为现实社会的价值界限清晰、非黑即白，无法参透对立之间的复杂情况。一般情况下，随着成长过程中遇见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观点、在原有价值体系受到冲击、新旧价值标准相互博弈后，人的思维系统与判断模式有所升级，变得更具结构性与多样化，认知域更宽阔，认知标准更灵活，人们变得逐渐成熟、复杂。但“后真相”时代，传统媒体的式微与转型带来公众知情权的倒退，人们信息认知的途径从信赖权威转向“爱我所爱”。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茧房”只会让人们变得更以自我为中心，或更以与自我一样的群体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是非二元对立更加凸显。久而久之，不同群体便从相互不理解变成相互不愿理解。简单线性的价值判断模式非但没有改变，还加剧了简单判断之间的冲突矛盾。

同时，科技的高度发展使生理器官被诸如手机等“电子义肢”<sup>[17]</sup>替代，当人们无法全程直观参与他者生活，仅通过有时间限制的视频或有数量限制的照片等被截取的图像来片段化地监视陌生人的生活时，“后真相”产生。人们将短暂的视频内容所表达的思想作为博主全部的生活实态，从而产生认识偏差。如在网上看到母亲带孩子享受一次高档餐食，便以为他们每天都如此生活，进而产生仇富情绪。陌生人与互联网“合作生产”的即时激活的虚拟商品事件更改着人们以往的意识形态，使近代以来广为传播的平等价值观念所激发的对平等的永无休止的诉求和不可能完全平等的现实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在此刻表现出来。这种追求平等的激情造成社会成员对区别地位的符号密切关注，进而带来对于差异的越来越多的不容忍。<sup>[18]</sup>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蕴含着竞争的“后真相”加剧了

人们简单线性的判断模式，使人们在被蒙蔽的状态下，便立刻对同阶层表达同情，对对立阶层抗议不满。人们放肆地呐喊，而不去探寻事件背后的深层可能性，不去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拿起“弱者的武器”<sup>[19]</sup>，通过表达代表“我”的阶级处境的恶劣来进行消极、隐秘的抵抗。这种行为除了造成信息传递的“群体极化”<sup>[20]</sup>外，并无益于平等的达成。

### 三、应对价值判断困境的教育策略

价值判断是价值观形成的核心过程。当“后真相”使学生的价值判断产生上述三种困境时，教育有必要做出调整，帮助学生在“后真相”时代根据合理、真实、有益的信息付诸行动，而非成为信息的奴隶，受煽动、虚假、有害信息的操纵。也正因教育的正确实践，每一次“后真相”的产生非但无法扰乱视听，还将成为一次社会自净。

#### 1. 教育应提升学生在价值判断过程中价值理性水准

虽然“后真相”反映了人类理性的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抛弃理性。理性的有限乃一定范畴内的有限，人们需要用理性对抗网络上毫无建设性的抱怨及其带来的情绪极化，对抗人们心理存在的与信息茧房进一步引发的“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以及由情绪极化与确认偏差带来的极端化思维。千百年来，人们始终在运用理性。一个人在想方设法将事情厘清或寻找有效理由时，已经表明这个人在诉诸理性。理性无处不在。虽然我们不信奉理性，但我们经常使用理性。<sup>[21]</sup>

既然理性无处不在地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且“后真相”使学生的价值判断情理失调，那么教育需提升学生的价值理性。

第一，使学生对信息及其讲述方式保持警惕与敏感，形成批判性的媒介解读素养。要做到这一点，需使学生在对“后真相”新闻事件进行判断时能够审慎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此新闻事件在事实与道德上是否是正确的，

如果不正确，是否要把责任简单地归咎于某人，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简单地归咎于他人，会使人们把握不住问题的真正要点，而且无法集中注意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sup>[22]</sup>二是新闻如此陈述或论断的目的可能有哪些。对该问题的思考有助于人们努力理解事情背后的相关影响因素与事件的系统联系。三是接受新闻及其舆论的民众是否会过度解读或歪曲事件本身，并使民众产生伤害或误导他人的行为。“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sup>[23]</sup>之所以反思这个问题，是因为人的大脑习惯关注负面信息，媒体在流量的驱使下会尽可能多地报道负面新闻，但负面新闻不等于事实，当人们对负面信息的印象越来越深刻时，价值理性应使人明白社会道德并非每况愈下，只是正面新闻无法吸引眼球而已。

第二，改变唯理性的说教式价值观教育，重视情感教育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需明白情感并不破坏价值判断的无偏倚性。之所以现有价值观教育采取认知性的概念条陈、命令说教，以逻辑推论间接、抽象地讲述价值规范与道德准则，是因为教师们普遍认为在价值观教育中渗透情感无益于学生价值判断的客观与中立。其实，这种教育非但没有使学生提升价值理性，相反还使学生因缺少情感体验、感性符号而陷于充满情感诱惑的假新闻。情感与情感所激发的行动是人类生活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的最好体现。情感本身并不具有正当性，但当理智被情感引向善、美与正当后，人们便不再依赖自己激烈的情感，可以清醒地沉思真理。如此，情感在价值观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使其有能力对掺假的信息追本溯源，故提升价值理性的价值观教育需以价值情感培育为基础。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坦然面对不断反转的事件，在探寻真相过程中将价值的冲突看作提升自身价值理解的契机，不陷入“后真相”带来的信息混沌，自觉地坚守正确的价值信念。

#### 2. 教育应加强学生对事实判断的能力

长久以来，人们熟练掌握并运用从具体到

抽象、从经验到理念、从事件到道理的归纳演绎式认知模式，将抽象数据或理念视为比具体经验更高级的产物，并以此作为自身能力发展的目的与判断依据。今天，信息传播方式削弱了直观性，使经验丧失了真实性的保障，从源头摧毁了价值判断的可靠性；同时，对事件结果的过分关注使人忽略过程中的细节，泯灭了差异性与个别性。鉴于此，应加强教育学生对事实判断的能力，剖析事件本身的真假，追问事件细节，还原事件全貌，从草率表达立场态度转向对内容追本溯源，让事实判断过程回到价值判断过程之前。

价值事件的甄别不仅依靠对事实源头细节的追溯，更依靠对事实源头细节的审辩与理解。在审辩方面，一个事件的真相虽不神秘但却隐秘，人们需要透过事实结论的言辞世界回溯至事实细节的现实世界，进而让被遮蔽、被隐秘的真实获得呈现。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需锻炼学生琢磨言辞、追问事件如此发展是否可能、为什么会这样，以侦探破案的慎查还原场景建构，并警惕情感标签，通过将“二维地图”变为“立体地域”、将散文性表达变成说明文表达，慧眼识真相，并形成习惯性的甄别思维记忆。在理解方面，看到事实源头不等于理解事实源头，不理解事实源头，即使肉眼见到也未必真正看到。这就像掌握一门知识，教育不是从学科起源、发展开始，而是从记住陌生的符号、公式、定律开始。在教师和课本的示范下，反复做练习题直至灵活运用。<sup>[24]</sup> 知识教育如此，价值观教育亦如此。此时，教育需要让抽象概念降维。在价值教育中，感知价值规范的发生本原，在学生形象感知与情绪塑造皆饱满的状态下真正理解价值意涵，而非直接快进至抽象结论，这不仅使真实的价值情境在抽象之后被遮蔽，学生对价值标准的认同也缺乏具身过程，其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因完整的因果链断裂而弱化与错位。

“后真相”时代，教育使学生对价值规范的理解从抽象结论回到具体细节，重新追溯与阐释事实起源的本来面目。这就需要学生获得“上游思维”的思考习惯，将关注点从放在整个

事件进程后期的抽象结论转向关注有血有肉的源头现实细节及其细节间的相互关系，这需要教师引领学生“四周查看，然后顺原路回来，重新查找，寻找新的观看与认知方式”<sup>[25]</sup>，使其找到造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而非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相关性与环境因素。教育使学生重点关注源头细节、形成检验事件真实度的认知方式，也应成为学生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也将是学生观世界、形成世界观的方式。如果不重新认识与理解真实、细节的世界，我们就无法理解事件的复杂，无法达至事件的深度，如学习科学，但不知道科学的背后是人类与自然的关联；感受文化，但不知道文化的背后是家国、命运、乡愁等。这种认知模式的回溯与智识水平的提升都为正确的价值判断奠定基础。

### 3. 教育应拓展学生认知，升级学生的思维结构

“后真相”舍本逐末的“标题党”式传播方式与信息茧房不断极化的思维结构进一步强化学生幼稚化与对立化的价值判断模式。此时，教育有必要拓展学生的认知，使其更开放地接受多元信息；同时，升级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思维模式从简单线性升级至复杂系统。

两极化的非黑即白思维不适合“后真相”时代的教育。面对本身就已不断反转的新闻事件及刻意对立的观点表达，致力于多元开放、涵养不同的对话性思维与跟踪连锁行动、透视全局情境、理解事件背后运作目的的复杂性思维是此时的教育所需要的。不论是对话性思维，还是复杂性思维，均是研究事物及其所处网络联系的整体思维，是一种突破常规思维的思维，是超越日常经验、对思考进行思考的思考。为避免人在网络世界趋向两极的单向度堕落，教育首先应通过对价值冲突的对话和分析使学生掌握复杂价值冲突的分析方式，不仅可以理解不同的价值理论观点，还可以依据不同情境灵活贯通地使用它们。比如在判断某事件是否正义时，面对相互冲突的言论，学生能够运用“平等的正义”与“权利的正义”等不同的正义标准，并将不同标准运用到不同受众中，即使学生并不知道这两种正义标准是谁提出的。

要想避免在拟态环境中迷失、愚化，教师需经常让学生在课堂中阐述自己对某事的立场，在中立者面前捍卫自己的观点，同时反过来站在反对者的立场驳斥自己的观点。积极、开放的心智使人们能够对自己与他人的冲突进行深入反思，在异见与辩护中挖掘问题的关键。一个人同时保有全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确行事，是一流智慧的标志。此外，要想具备这种多元、变通的价值判断思考模式，教师还应扩充学生的知识与经验的储备。正所谓变通的思维来源于有能力变通的思考基础。最后，复杂性思维的培养并非公式化的、与真实生活相割裂的。“如果教授方法太死板，学生们只掌握一些论据，不能投入地建构和支持自己的立场，那么最危险的就是学生可能满足于破坏性的批判，成为技能娴熟但没有情感的旁观者。”<sup>[26]</sup> 所以，多元开放的复杂性思维的培养，需要变通的能力，需要为变通能力提供支撑的理论知识基础，需要在真实的生活感受不同情境中的人性复杂本质。是故，“后真相”现象为学生提供了修炼其复杂思维的情境，在面对复杂中修炼复杂思维。

#### 注释：

①在西方，“后真相”以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被选为美国总统为代表事件。在我国，从2016年的罗尔事件、2017年的红黄蓝幼儿园事件、2018年的重庆公交车事件、2019年咪蒙公众号《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事件，再到2020年新冠病毒引发的诸多谣言等等，人们看到的反转新闻越来越多，“后真相”的发生愈演愈烈。

#### 参考文献：

- [1] 史安斌. “后真相”冲击西方新闻舆论生态 [J]. 理论导报, 2017 (11): 63-64.
- [2] 麦克唐纳. 后真相时代 [M]. 刘清山, 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封底.
- [3] KIERKEGAARD S.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 182.

[4] 肖珺, 单波, 杨家懿. 数字通信革命视角下的后真相反思——与约翰·基恩的讨论 [J]. 新闻记者, 2018 (8): 14-22.

[5] 蓝江. 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 [J]. 探索与争鸣, 2017 (4): 10-13.

[6] KAKUTANIM M. The death of truth: notes on falsehood in the age of Trump [M]. Tim Duggan Books, 2018.

[7] PINKER S. Why we are not living in a post-truth era: an (unnecessary) defense of reason and a (necessary) defense of universities' role in advancing it [DB/OL]. (2020-05-01) [2020-11-01]. [https://www.skeptic.com/reading\\_room/steven-pinker-on-why-we-are-not-living-in-a-post-truth-era/#note18](https://www.skeptic.com/reading_room/steven-pinker-on-why-we-are-not-living-in-a-post-truth-era/#note18).

[8] 赵汀阳. 四种分叉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7.

[9] 刘擎. 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 [J]. 探索与争鸣, 2017 (4): 24-26.

[10] 夏莹. “后真相”: 一种新的真理形态——兼与吴晓明、汪行福等教授商榷 [J]. 探索与争鸣, 2017 (6): 66-70.

[11] 李德顺. 走向时代前沿的哲学思维 [J]. 领导科学论坛, 2020 (16): 46-63.

[12] 温伯格. 知识的边界 [M]. 胡泳, 高美, 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13] SIMON H A.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M]. Carbridge: MIT Press, 1984.

[14] 诺尔-诺依曼. 沉默的螺旋: 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M]. 董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5] 贝克. 风险社会 [M]. 何博闻, 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4: 21.

[16] 张之琪. 中国进入“后真相”时代: 谣言的真实目的是确认自己的焦虑 [EB/OL]. (2017-12-04) [2020-10-01]. [https://www.sohu.com/a/208285904\\_99897611](https://www.sohu.com/a/208285904_99897611).

[17] 张一兵. 远托邦: 远程登录杀死了在场——维利里奥的《解放的速度》解读 [J]. 学术月刊, 2018 (6): 5-14.

- [18] 王小章. 群氓是怎样炼成的? [J]. 读书, 2018 (8): 158-164.
- [19] 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 [M]. 郑广怀, 张敏, 何江穗,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 [20] 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 [M]. 黄维明, 译. 上海: 上海出版集团, 2003.
- [21] NAGEL T. The last word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2] 罗斯林 H, 罗斯林 O, 罗朗德. 事实 [M]. 张征, 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9: 248.
- [23] 李普曼. 公共舆论 [M]. 常江, 肖寒,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56.
- [24] 吴国盛. 科学的历程 [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11.
- [25] 温克. 批判教育学: 来自真实世界的笔记 [M]. 路旦俊, 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 34.
- [26] 诺丁斯. 批判性课程: 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知识 [M]. 李树培,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 30.
- (责任编辑 刘 红)

## The Dilemma of Value Judgment Caused by Post-truth and the Response of Education

Gao Jie

**Abstract:** As a special form of information express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post-truth” can be divided into “slow truth” and “no truth”, which makes people’s valu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 infinite cycle in which value judgment comes first and fact judgment comes later. This cycle becomes a new cognitive form of information, highlights the complexity of society. The arrival of “post-truth” makes people face up to the uncertainty in life. It causes the dilemma of students’ value judgment and makes the motivation of value judgment unreasonable, making content of value judgment superficial and the mode of value judgment simple and linear. In case, it is necessary for value education to improve students’ value rational level,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value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upgrading students’ thinking structure from simple linear thinking to complex systematic thinking.

**Key words:** Post-truth; Value judgment; Delimma; Education strategies

# 大学生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

杨 钊 王 琼 井美莹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要:** 创业课程是高校创业教育的核心载体和基本保障。已有研究很少从学生学习投入的角度考察创业课程的影响力、探讨提升创业课程质量的具体途径。在社会认知生涯选择模型框架下, 以6所高校1393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检验和分群组检定, 分析大学生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其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大学生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可以提升其创业意向, 学习投入通过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结果预期间接影响创业意向; 其中,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 不同类型高校的影响机制是相同的。研究凸显了“学习投入”的重要作用, 说明提升学生的学习投入是构建具备高影响力创业教育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 创业课程; 学习投入; 生涯选择模型; 创业意向; 创业自我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1-0085-11

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兴起及“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现实需要, 高校创业教育成为新时期的热点议题。创业教育起源于美国高校的实践, 1947年哈佛大学 Myles Mace 教授首次为188位MBA学员讲授创业学课程——《新企业的管理》, 标志着创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诞生。<sup>[1]</sup> 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以1997年清华大学开设创新与创业方向课程为起点, 开始较晚但发展迅速。近年来,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的持续推动及各高校的自发探索下, 创业课程作为创业教育的核心载体和基本保障, 已在全国高校中得到普及。

高校创业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学生厘清创业生涯选择的问题。<sup>[2]</sup> 创业意向是体现创业生涯选择的关键要素, 为探究当前创业教育实施的效果, 学界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的实证研究。朱红、张优良针对首都89所高校调研数据的分析表明, 高校创业教育能显著提升学生创业意向, 但不同创业教育形式的影响存在差异, 创业课程对学生近期创

收稿日期: 2020-10-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新常态下的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研究”(16JJD880005)子课题“创新创业研究”

作者简介: 杨钊, 女, 副教授,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 王琼(通讯作者), 女,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学生发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研究; 井美莹, 女,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管理研究。

业意向无显著影响。<sup>[3]</sup> 王心焕等人针对全国 37 所本科院校和 15 所高职院校的 10 128 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创业过程和参与企业经营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正向影响最大,创业课程和创业讲座的影响次之,创业竞赛的影响较小。<sup>[4]</sup> 胡瑞等人针对 679 名华中农业大学在校本科生的调查分析表明,创业课程无法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产生普遍的积极影响,创业课程的效果有待提升。<sup>[5]</sup> 由此可见,创业课程是高校创业教育的核心载体,在促进学生创业生涯选择方面具有一定影响,但其效果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

已有研究通过量化分析讨论了现阶段创业课程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但是缺乏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尤其是缺乏对大学生创业课程学习经历的分析,因而难以解释创业课程效果异质性的成因。“学习投入”概念为探索该问题提供了一种适切的理论分析视角,创业课程效果的异质性可能与大学生在创业课程中的学习投入差异有关。大量研究已表明,“学习投入”对大学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与高校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和创建的教育情境密切相关。例如,库等人的研究证明,学生个体在高校各类教学实践活动中的积极参与、投入和学习经历对预测其保持率、综合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的收获有重要作用;<sup>[6]</sup> 中国学者鲍威亦证实,中国大学生的课堂学习参与和课余学术活动参与对其课程成绩、知识获得和认知发展等都会产生正向影响。<sup>[7]</sup>

因此,在现阶段高校创业教育发展目标已由“实施普及”转变为“质量提升”、教育部着力打造创新创业领域“金课”的背景下,本研究借鉴高校学生发展研究中的“学习投入”概念,尝试在课堂层面以学生为中心来量化分析创业课程中的个体学习经历,以“学生学了什么、学生是怎样学习的”过程指标作为代理变量,考察大学生在创业课程中的学习投入差异对其创业生涯早期发展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学习投入”概念对创业课程效果异质性的解释力,在社会认知生涯选择模型框架下,讨论其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所得结

论为完善和改进具体的创业课程教学实践指明了方向。

##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框架

“学习投入”概念在西方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大学生发展“生态学派”代表人物乔治·库将其定义为学生投入到有效教育实践中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高等学校吸引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力度。<sup>[8]</sup> 以此作为理论基础的“美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包含五大“有效教育实践基准”,即学业挑战度、主动合作学习水平、师生互动水平、教育经历的丰富度、校园环境的支持度。在 NSSE 工具的基础上,欧米特和斯莫尔伍德设计了课程层次的学生投入调查问卷(Classroom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CLASSE),<sup>[9]</sup> 保留了 NSSE 中与课堂学习投入相关的题项,主要涉及 NSSE 的主动合作学习水平、师生互动水平、学业挑战度三个维度,用以考察学生的课堂参与行为及其对课程的感受和评价。

另一方面,社会认知生涯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咨询教授兰特等人在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生涯理论提出的,其中三个分段模型之一的“生涯选择模型”是用来分析个体生涯选择过程的实证研究模型。<sup>[10]</sup> 该模型的核心变量包括目标/意向,即个体投入某个特定领域或角色时的决心;自我效能感,即个体对于自身在某个职业生涯领域能力的信念;结果预期,即特定行动过程的想象结果,与职业生涯相关的结果预期可以理解为当人们追求特定职业道路时,其先前的主要价值观,如利他主义、薪酬、与家庭的平衡、自主性等可以得到多大程度上的满足。其核心观点包括一般情况下,人们追求与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相一致的生涯目标。此外,社会认知生涯理论认为生涯选择和相关现象的本质都是认知的过程,而先前研究表明创业生涯符合这种模式。<sup>[11]</sup>

已有研究发现学习投入能显著影响大学生

发展的各个维度,哈勃和夸耶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后发现,学生参与不仅与其认知和智力发展呈正相关,也与其自我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等存在正相关。<sup>[12]</sup> 根据生涯选择模型,个体的学习经历会对其自我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明尼蒂等人的文章提及创业学习和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将创业学习定义为能够增强创业者自信心并提升其知识集合的行为过程,研究支持了创业学习能提高创业自我效能感这一观点。<sup>[13]</sup> 莱和卡斯韦尔通过质性研究,在对 13 名创业者跟踪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创业学习模型,指出个体理论和主动学习能提高创业者的自信。<sup>[14]</sup> 倪宁和王重鸣认为自尊和自信是莱和卡斯韦尔创业学习模型的核心概念,创业学习的任务是探究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与发展。<sup>[15]</sup> 陈寒松等人针对 244 名创业者的实证研究发现,个体的创业学习会通过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而间接影响创业意向。<sup>[16]</sup> 本研究尝试将大学生在创业课程中的学习投入作为创业课程学习经历的代理变量,考察其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 H1。

H1: 大学生在创业课程中的学习投入对其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生涯选择模型,个体的学习经历会对其结果预期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尝试将大学生在创业课程中的学习投入作为创业课程学习经历的代理变量,考察其对创业结果预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 H2。

H2: 大学生在创业课程中的学习投入对其创业结果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生涯选择模型,结果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我效能感,因为人们可能期望在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完成的活动中取得理想的结果,<sup>[17]</sup> 即自我效能感会显著影响结果预期。利古力等人在针对 320 名美国商科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创业结果预期的显著积极预测因子。<sup>[18]</sup>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

H3: 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其创业结果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生涯选择模型,自我效能感会直接影响目标意向。克鲁格指出,创业意愿的一种重要前导变量是个人对成功实施创业的能力的感知。<sup>[19]</sup> 他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正向促进作用。<sup>[20]</sup> 博伊德等人认为,鉴于在个体创业过程中所包含任务的复杂性(如识别机会、获取资源、经营管理等),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决定创业意向和最终采取创业行动的关键预测变量,在创业意向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工具性的作用。<sup>[21]</sup> 赵等人在间隔两年的时间中对同一批 MBA 学生进行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强相关性。<sup>[22]</sup> 丁明磊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愿、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存在显著相关。<sup>[23]</sup> 近期的研究包括陈寒松等人针对 244 名创业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会显著影响创业意向。<sup>[24]</sup> 李晓青在针对海峡两岸 4 所高校 774 名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对创业意向影响的研究中发现,两岸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创业意向,主要影响没有地区差异。<sup>[25]</sup>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

H4: 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其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生涯选择模型,结果预期会直接影响目标意向。利古力等人在针对 320 名美国商科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创业结果预期是创业意向的显著积极预测因子。<sup>[26]</sup>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5。

H5: 大学生的创业结果预期对其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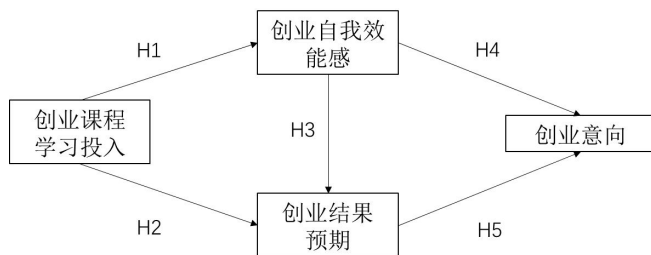


图 1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 二、研究设计

###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抽取了6所将创新创业课程列入本科生培养计划的高校,包括3所“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和3所一般本科院校。在选定的6所高校中,于2019—2020学年每学期期末课程结束时,面向修读创业课程的学生进行整群抽样。问卷采取网络调查法,由创业课程任课教师或院系辅导员组织实施,参与学生共计2052人,回收问卷1674份,回收率81.6%;其中有效问卷1393份,有效回收率为67.9%。无效问卷的判断原则包括“答题时间过短”“个人信息答案明显偏误”“分量表的题项回答完全一致”。经样本代表性检验后的1393份有效样本中,“985工程”/“211工程”高校690人、占49.5%,一般本科院校703人、占50.5%;男生566人、占40.6%,女生827人、占59.4%;城镇户籍764人、占54.8%,农村户籍629人、占45.2%;工学628人、占45.1%,理学118人、占8.5%,经济学337人、占24.2%,管理学184人、占13.3%,其他学科126人、占9.0%;大一学生269人、占19.3%,大二学生558人、占40.1%,大三学生450人、占32.3%,大四学生116人、占8.3%。

### 2. 测量工具

本研究中“创业课程学习投入”的测量采用研究者自编量表。该量表参考了课程层次学生投入调查问卷(CLASSE),选取了源自NSSE的“主动合作学习水平”“师生互动水平”“学业挑战度”三个维度和部分题项,结合前期访谈结果和我国具体的创业教育实践,增加了一个以院校为主体的投入指标“过程评价”。

经本土化改进后的“创业课程学习投入”量表共4个维度,23个题项,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用以考察学生在创业课程中参与行为的强度以及感受到的课程挑战和对过程评价的重视程度。其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投入指标有“主动合作学习水平”维度5个题项、“师生互动水平”维度7个题项,采用“你在课程中进行下述

活动的频繁程度”来进行自我报告,如“在创业课程中参与课堂讨论”“在创业课程中做课堂汇报”“在创业课程中提问”“与老师讨论生涯发展规划”等,1分=从不,2分=有时,3分=经常,4分=很经常。其中以院校为主体的投入指标有“课程挑战度”维度8个题项、“过程评价”维度3个题项,采用“你的课程在多大程度上强调以下方面”来进行自我报告,如“应用理论或概念解决实际问题”“重视学生的课堂互动考评”“除结课作业之外,要求学生提交其他过程性/阶段性学习成果”等,1分=非常少,2分=有一些,3分=比较多,4分=非常多。

该工具的测量学特性良好:各测量指标和量表整体的克隆巴赫信度Cronbach's  $\alpha$  值为0.844(主动合作学习水平)、0.917(师生互动水平)、0.916(课程挑战度)、0.831(过程评价)和0.941。测量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标为:CFI=0.935、IFI=0.935、NFI=0.925、GFI=0.903,均大于0.90;RMR=0.029,小于0.5;RMSEA=0.065,小于0.8;上述结果显示测量模型适配度良好。在模型的内在质量方面,估计参数均达到显著水平。因子载荷系数在0.60—0.86之间,各项指标与题项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选取塞利等人发展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sup>[27]</sup>共有5个题项,单一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考察被试者执行一系列创业特定任务时的信心,如“你对发现新的商业机会有多大信心”,1分表示完全没信心,5分表示完全有信心。量表的信度系数 $\alpha$ 值为0.906。KMO值为0.878>0.8,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4368.325(df=10), $P<0.001$ ,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旋转后,1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72.726%;所有题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于0.6,因子载荷系数在0.799—0.878之间,题项与指标之间有较强的对应关系。

“创业结果预期”的测量选取樊汶霍汶等人发展的创业结果预期量表,<sup>[28]</sup>共4个题项,单一维度,采用李克特7点记分,考察被试者“如果选择创业,你的以下目标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满足”,如“经济收益方面将获得极大程度的满足”“独立/自主方面将获得极大程度的满

足”，1分表示非常不符合，7分表示非常符合。量表的信度系数 $\alpha$ 值为0.908。KMO值为0.815>0.8，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3806.989（df=6）， $P<0.001$ ，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旋转后，1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78.483%；所有题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于0.7，因子载荷系数在0.868—0.897之间，题项与指标之间有较强的对应关系。

“创业意向”的测量选取清华大学向辉发展的创业意向量表。<sup>[29]</sup>本研究对个别题项有所删减，如“我在大学所接受的教育已经为创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参考朱红、张优良的创业意向研究，<sup>[30]</sup>增加了题项“我的创业实践或意愿与所学专业相关”，以考察学生创业意向的质量。修订后的量表共6个题项，单一维度，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分表示非常不符合，7分表示非常符合。量表的信度系数 $\alpha$ 值为0.910。KMO值为0.874>0.8，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5781.375（df=15）， $P<0.001$ ，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旋转后，1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9.434%；所有题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于0.4，因子载荷系数在0.692—0.894之间，题项与指标之间有较强的对应关系。

### 3. 实证方法

本研究运用SPSS20.0和Amos22.0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对创业课程学习投入量表、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创业结果预期量表、创业意向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保证测量工具信效度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量化分析。

首先，为了验证“学习投入”概念对创业课程效果异质性的解释力，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其次，为了深入探究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运用Bootstrap方法对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影响创业意向的总间接效应进行分解，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结果预期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最后，为了探究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类型高校间是否相同，采用分群组分析检验结构方程模型在两类高校间的稳定性。

## 三、研究结果

### 1. 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影响创业意向的结构方程模型与假设检验

本节采用1393名修读创业课程学生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来验证大学生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创业意向的具体影响。根据前述变量间关系，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

研究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良好。如表1所示， $\chi^2/df=5.662$ ，<sup>①</sup>CFI、IFI、NFI均大于0.9，GFI大于0.8，SRMR、RMSEA小于0.08，主要拟合指标均达到可以接受的标准。另外，所有因子与量表题项的测量关系以及二阶测量关系均达到显著性水平，测量关系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基本在0.616—0.888之间，模型内在质量良好（测量关系路径参数估计摘要表略去）。

研究发现验证了主要假设。如表2所示，大学生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97，此路径在0.001水平下显著（ $z=16.831$ ， $p<0.001$ ），说明创业课程学习投入会对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H1得到验证。大学生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创业结果预期产生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69，此路径在0.001水平下显著（ $z=7.651$ ， $p<0.001$ ），说明创业课程学习投入会对创业结果预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H2得到验证。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结果预期产生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37，此路径在0.001水平下显著（ $z=12.953$ ， $p<0.001$ ），说明创业自我效能感会对创业结果预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H3得到验证。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产生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66，此路径在0.001水平下显著（ $z=16.808$ ， $p<0.001$ ），说明创业自我效能感会对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H4得到验证。大学生创业结果预期对创业意向产生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99，此路径在0.001水平下显著（ $z=3.180$ ， $p<0.001$ ），说明创业结果预期会对创业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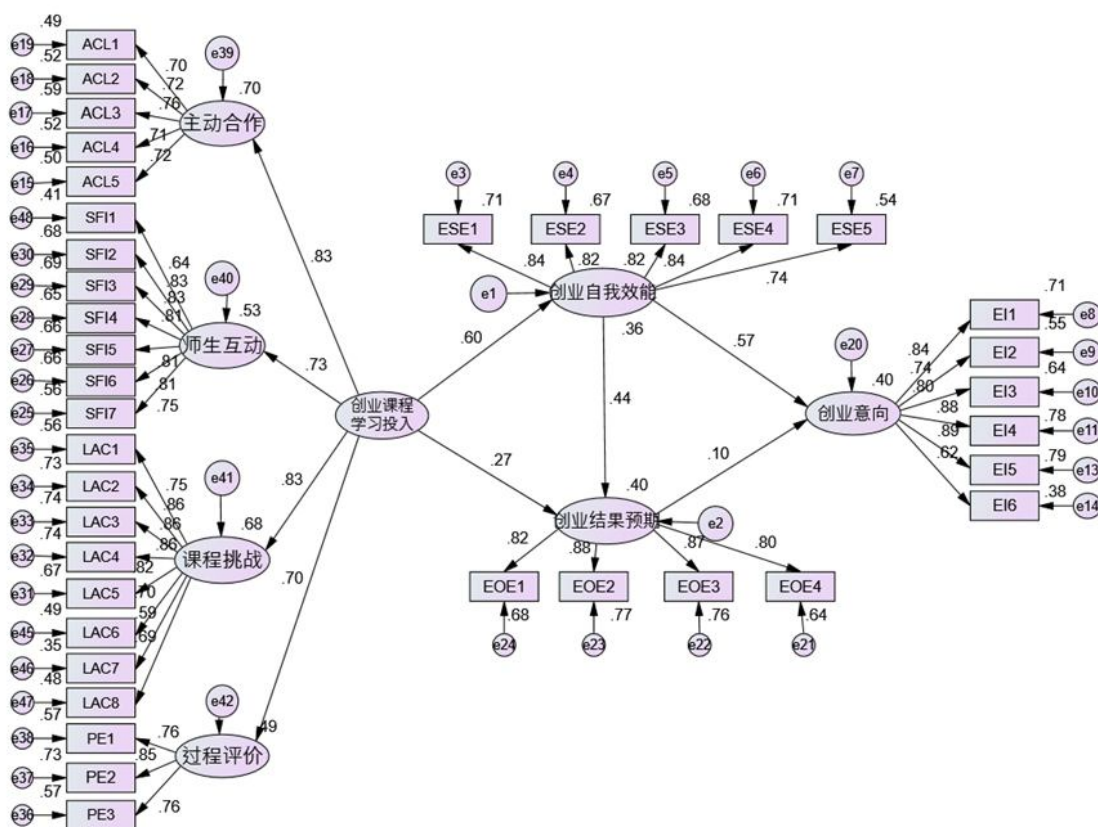


图 2 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影响学生创业意向的结构模型图

表 1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chi^2$	df	$\chi^2/df$	CFI	IFI	NFI	GFI	SRMR	RMSEA
3714.224	656	5.662	0.917	0.917	0.901	0.862	0.069	0.058

表 2 模型路径参数估计摘要表

路径 (X→Y)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z	SE	p	标准化路径系数
创业课程学习投入 → 创业自我效能感	1.001	16.831	0.059	0.000	0.597
创业课程学习投入 → 创业结果预期	0.656	7.651	0.086	0.000	0.269
创业自我效能感 → 创业结果预期	0.637	12.953	0.049	0.000	0.437
创业自我效能感 → 创业意向	0.946	16.808	0.056	0.000	0.566
创业结果预期 → 创业意向	0.113	3.180	0.036	0.000	0.099

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H5 得到验证。

### 2. 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影响创业意向的效应分解：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

为了深入探究大学生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本节运用 Bootstrap 方法

对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影响创业意向的总间接效应进行分解。<sup>②</sup>表 3 包括了 3 条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意向的特定间接效应；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结果预期→创业意向的特定间接效应；

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结果预期→创业意向的远程中介效应。表3的结果显示,采用Bias-corrected和Percentile程序执行Bootstrap方法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数字0, Z值大于1.96,各效应路径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其中,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意向(路径1)的特定间接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比重为86.6%,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结果预期→创业意向(路径2)的特定间接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比重为6.7%,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结果预期→创业意向(路径3)的远程中介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比重为6.6%。进一步的特定间接效应差异比较结果显示,路径1的效应显著高于路径2、路径3的效应,路径2和路径3的效应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计算表格略去)。可以看到,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课程学习投入与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最为重要。

考虑到创业自我效能感的重要作用,针对本研究关注的教育可控变量——创业课程学习投入,本节尝试将其4个维度:主动合作学习水平、师生互动水平、课程挑战度、过程评价作为自变量,将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表4可知,模型R<sup>2</sup>值为0.302,说明主动合作学习水平、师生互动水平、课程挑战度、过程评价可以解释创业自我效能感30.2%

的变化原因。模型通过了F检验(F=149.813, p<0.001),说明创业课程学习投入4维度中至少一项会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关系,模型公式为:创业自我效能感=1.564+0.074×主动合作学习+0.416×师生互动+0.207×课程挑战度+0.067×过程评价。另外,针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模型中VIF值均小于5,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并且D-W值在2附近,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样本数据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模型较好。具体分析可知:主动合作学习的回归系数为0.074(t=2.083, p<0.05),师生互动的回归系数为0.416(t=12.187, p=<0.001),课程挑战度的回归系数为0.207(t=5.267, p=<0.001),过程评价的回归系数为0.067(t=2.238, p=<0.05),说明创业课程学习投入4个维度均会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4个维度中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师生互动水平维度,其次是课程挑战度维度,而主动合作学习水平和过程评价维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3. 模型稳定性分析:不同类型高校的分群组检验

为了控制由院校选拔性方面引起的差异,本节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分群组检定(Group1为“985工程”/“211工程”高校, n=690; Group2为一般本科院校, n=703)。表5的结果显示,五

表3 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影响创业意向的间接效应分解: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路径	点估计值	系数相乘积		Bootstrapping						中介效应 (%)
		Product of Coefficients		Bias-Corrected 95% CI			Percentile 95% CI			
		SE	Z	Lower	Upper	p	Lower	Upper	p	
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意向 (总间接效应)	0.920	0.078	11.795	0.782	1.091	0.002	0.772	1.085	0.002	100%
路径1: 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意向	0.797	0.079	10.089	0.644	0.960	0.002	0.643	0.960	0.002	86.6%
路径2: 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结果预期→创业意向	0.062	0.027	2.296	0.017	0.126	0.005	0.016	0.124	0.006	6.7%
路径3: 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结果预期→创业意向	0.061	0.023	2.652	0.019	0.110	0.005	0.019	0.109	0.006	6.6%

表4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VIF	R <sup>2</sup>	调整 R <sup>2</sup>	F
	B	标准误	Beta						
常数	1.564	0.080	-	19.600	0.000**	-			F (4,1388) =149.813, p=0.000
主动合作学习	0.074	0.036	0.064	2.083	0.037*	1.904			
师生互动	0.416	0.034	0.354	12.187	0.000***	1.678	0.302	0.300	
课程挑战度	0.207	0.039	0.169	5.267	0.000***	2.047			
过程评价	0.067	0.030	0.064	2.238	0.025*	1.609			

注：因变量为创业自我效能感；D-W 值为 1.947；\* p<0.05 \*\* p<0.01 \*\*\* p<0.001

表5 分群组分析模型适配度检验摘要表

模型	χ <sup>2</sup>	df	χ <sup>2</sup> /df	CFI	IFI	TLI	NFI	RMSEA
Baseline	4690.036	1312	3.575	0.910	0.910	0.904	0.879	0.043
M1	4743.849	1343	3.532	0.909	0.909	0.905	0.878	0.043
M2	4767.817	1351	3.529	0.909	0.909	0.905	0.878	0.043
M3	4768.231	1352	3.527	0.909	0.909	0.905	0.877	0.043
M4	4783.245	1359	3.520	0.909	0.909	0.906	0.877	0.043
M5	5112.754	1397	3.660	0.901	0.901	0.906	0.869	0.044

个参数限制模型及原先的未界定参数限制模型（又称基线模型，unconstrained）均可辨识和估计。基准模型（Baseline）的主要参数拟合指标： $\chi^2/df=3.575$ ；CFI=0.910，IFI=0.910，TLI=0.904，大于 0.9；NFI=0.879，大于 0.8；RMSEA=0.043，小于 0.05；均达到可以接受的标准。在此基础上，M1 限制测量系数（Measurement weights）相等；在 M1 的基础上，M2 限制结构系数（Structural weights）相等；在 M2 的基础上，M3 限制结构协方差（Structural covariance）相等；在 M3 的基础上，M4 限制结构残差（Structural residuals）相等；在 M4 的基础上，M5 限制测量残差（Measurement residuals）相等；由表 5 可见，各参数限制模型适配度良好。

通过嵌套模型比较，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假设模型 Baseline 正确时，其他五个参数限制模型分别与上一个模型进行比较。由于卡方差异量  $\Delta\chi^2$  和卡方值一样容易受到样本大小变化的影响，对比较结果的评价需要结合较不受模型复杂度影响的适配统计量来判断。由表 5 的结果进一步计算可知，其他适配度指标的变化量：所有  $\Delta CFI$  绝对值均小于 0.01， $\Delta IFI$ 、 $\Delta TLI$ 、 $\Delta NFI$  绝对值均小于 0.05；从实务上来讲，与

Baseline 相比，五个模型的不变性可以接受。由此可见，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模型在“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和一般本科院校群组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即不同层次的院校中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是相同的。

####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将大学生在创业课程中的学习投入作为个体创业学习经历的代理变量，运用社会认知生涯理论的生涯选择模型，通过实证结果验证了“学习投入”概念对创业课程效果异质性的解释力，讨论了其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从研究结果来看，可以形成以下三点结论：首先，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课程学习投入通过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结果预期间接影响创业意向；其次，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影响创业意向的总间接效应中，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意向的特定间接效应所占比重为 86.6%，显著高于其他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可见，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课程学习投入与创

业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最为重要；最后，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模型在“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和一般本科院校群组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同层次的院校中大学生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其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是相同的。

本研究凸显了创业课程学习投入的重要性。现阶段，我国高校已陆续将创新创业类课程列入培养方案，创业教育的目标由“实施普及”转变为“质量提升”。在教育部大力推进人才培养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着力打造创新创业教育领域“金课”的背景下，学生在创业课程中学习投入的质量和水平是亟需关注的首要问题，也是创业教育课程质量改进和提升的关键所在。提升学生在创业课程中的学习投入可以显著提升其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结果预期，进而激发创业意向，促进学生创业生涯的选择和发展。“学习投入”的视角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以优化学生学习过程为重点，注重教育产出”的本科教学改革理念，鼓励学生在主观层面的积极参与，以及院校、教师对客观参与环境的营造和创建，既有利于学生个体的发展，又有利于教师教学的改进。而以往关注创业教育资源和条件建设、忽视学生在创业课程中学习投入的做法无益于改善当前创业教育“高投入、低产出”的困境，需要引起研究者和实践者足够的重视。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作用中，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尤为重要。针对研究所关注的教育可控变量——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其4个维度均会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师生互动水平维度，其次是课程挑战度维度，而主动合作学习水平和过程评价维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这一结论对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启发意义在于课程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加入一些提升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活动，如设置一系列具有挑战性却又力所能及的小任务，让学生在不断突破舒适区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创业能力更加自信；同时注意加强师生互

动，给予学生及时、高频、有价值的反馈，提升互动质量。这些干预措施有助于实现创业课程的质量改进目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研究仍有提升的空间。首先，本研究虽然采集了学生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和其他背景信息，但在数据分析中尚未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未来可以考虑根据学生人口统计学信息和背景信息对研究结论进行分群组检定。其次，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未来可以考虑开展一些纵向研究，设置控制组和对照组，这对论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更具说服力。再次，社会认知生涯理论除了生涯选择模型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分阶段模型——兴趣发展模型和职业绩效模型，在相关变量能够进行精细化测量以及数据采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验证其在创业生涯领域的适用性，在更深层次上揭示我国大学生创业生涯发展的规律。最后，本研究中暂未考虑外界的支持和障碍等因素，这也是大学生创业生涯选择中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未来可以在相关概念测量和变量间作用关系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 注释：

①此处  $\chi^2/df$  大于 3，因为卡方值的大小易随样本数多寡而波动，因而在 SEM 假设模型的适配度评估中，分析的样本数如果较大，整体模型适配度的判别应参考 Amos 提供的各类模型适配度指标进行综合判断。

②根据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对创业意向没有呈现出显著的直接影响，所有影响效应均是通过间接效应实现。本研究还运用 Amos22.0 对模型主要变量——创业课程学习投入、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结果预期、创业意向之间所有可能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式研究，经过对比，系统推荐的第 32 个最优模型的变量关系与本研究理论假设完全一致（计算表格略去）。

#### 参考文献：

[1] 葛宝山，宁德鹏.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满

意度对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一个以创业激情为中介的大样本实证考察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7, 35 (3): 103-115, 171-172.

[2] 刘志. 哈佛大学创业教育课程建设的历程与经验 [J]. 教育研究, 2018, 39 (3): 146-153.

[3] [30] 朱红, 张优良. 北京高校创业教育对本专科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基于学生参与视角的实证分析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4, 35 (6): 100-107.

[4] 王心焕, 薄赋猷, 雷家骥. 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兼对本科生与高职生的比较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 37 (5): 116-124.

[5] 胡瑞, 王伊凡, 张军伟. 创业教育组织方式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作用机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 38 (11): 73-79.

[6] KUH G D, VESPE R N. A comparison of student experiences with good practices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between 1990 and 1994 [J].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1997, 21: 43-61.

[7] 鲍威. 扩招后中国高校学生的学习行为特征分析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9, 30 (1): 78-87.

[8] KUH G D. What we're learning about student engagement from NSSE: benchmarks for effective educational practices [J]. Change: 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 2003, 35 (2): 24-32.

[9] OUIMET J A, SMALLWOOD R A. Assessment measures: CLASSE—the class-leve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J]. Assessment update, 2005, 17 (6): 13-15.

[10] LENT R W, BROWN S D, HACKETT G. Toward a unifying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career and academic interest, choice, and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94, 45 (1): 79-122.

[11] KRUEGER N F, REILLY M D, GARSUD A L. Competing models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0, 15 (5,6) : 411-432.

[12] HARPER S R, QUAYE S J. Student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diverse popul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55-57.

[13] MINNITI M, BYGRAVE W. A dynamic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1, 25 (3): 5-16.

[14] RAE D, CARSWELL M. Towards a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001, 8 (2): 150-158.

[15] 倪宁, 王重鸣. 创业学习研究领域的反思 [J]. 科研管理, 2005 (6): 94-98.

[16] [24] 陈寒松, 陈宣雨, 林晨. 创业学习与创业意向的关系: 社会网络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7, 33 (5): 28-33.

[17] 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M]. NJ: Prentice Hall, 1986.

[18] [26] LIGUORI E, WINKLER C, VANEVENHOVEN J, et al. Entrepreneurship as a career choice: intentions, attitudes, and outcome expectations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 entrepreneurship, 2019, 7: 311-331.

[19] KRUEGER N F. The impact of prior entrepreneurial exposure on perceptions of new venture feasibility and desirability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3, 18 (1): 5-21.

[20] KRUEGER N F, BRAZEAL D V.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and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4, 19 (3): 91-104.

[21] BOYD N G, VOZIKIS G S. The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action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4, 18 (1): 63-77.

[22] ZHAO H, SEIBERT S E, HILLS G 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5, 90 (1): 267-296.

[23] 丁明磊, 杨芳, 王云峰. 试析创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9, 31 (5): 1-7.

[25] 李晓青. 创业自我效能及其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海峡两岸比较研究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23 (1): 41-50.

[27] SZELI L, GILMARTIN S K, CHEN H L, et al. The entrepreneurial engineer: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factors in the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J/O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2018, 6 [2019-09-0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Leon\\_Szeli/publication/327476774\\_The\\_Entrepreneurial\\_Engineer\\_A\\_Quantitative\\_Analysis\\_](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Leon_Szeli/publication/327476774_The_Entrepreneurial_Engineer_A_Quantitative_Analysis_)

of\_Personality\_Factors\_in\_the\_Social\_Cognitive\_Career\_Theory/links/5b91622f299bf147391f1c15/The-Entrepreneurial-Engineer-A-Quantitative-Analysis-of-Personality-Factors-in-the-Social-Cognitive-Career-Theory.pdf.

[28] VANEVENHOVEN J, LIGUORI E.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roduc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ject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3, 51 (3): 315-328.

[29] 向辉. 基于 ISO 模型的中国大学生创业意向研究 [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2.

(责任编辑 刘红)

## The Influence of Student Engage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Yang Po Wang Qiong Jing Meiyang*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work as the core carrier and basic guarante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been abl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 engagement, and explore specific way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In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choice model, this study, which i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1393 college students in six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tudent engage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y apply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ediating effect test and group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 engage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can improv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Student engage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indirectly affec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y influencing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entrepreneurial outcome expect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is the same in different group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student engagement" i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It is showed that improving student engage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is the key link to achieve high-impac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Student engagement; Career choice mode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Vol. 277 No. 1 2021

Monthly

## CONTENTS

- The Fundamental Guidance of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econd Anniversary of the Symposium for  
School’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 Hosted by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Xi Jinping ..... **Shen Zhuanghai** (3)
- Method, Knowledge and Dao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nd Its Practical Approaches ..... **Gu Hongliang**(11)
- Difficultie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 **Feng Xiujun** (17)
- Thoughts on Deepening the Evaluation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 **Liu Hongda** (23)
-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al Opening Policy since  
China’s Entry into WTO..... **Sun Xiaobing** (31)
-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 i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 **Guo Jianru & Liu Yanlin**(40)
-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Converg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Analysis Based on 414 College Deans..... **Li Liguang et al.** (51)
-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Huo Qingsheng** (59)
- Value of Life and Crisis Rationality: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National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 **Liang Jing & Song Naiqing** (66)
- The Dilemma of Value Judgment Caused by Post-truth and the Response of Educationc ..... **Gao Jie**(76)
- The Influence of Student Engage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 **Yang Po et al.** (85)



# 首都医科大学



名师带教



专注研究



临床手术



服务社会



授帽仪式



毕业典礼



首都医科大学建于1960年，是一所医学学科齐全、特色鲜明的北京市重点高等院校，是北京市政府、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共建院校。著名泌尿外科专家、两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吴阶平教授为首任校长和终身名誉校长。现任党委书记为呼文亮研究员，校长为著名分子神经生物学家饶毅教授。学校校本部有基础医学院等12个学院，临床有宣武医院等21所临床医学院（其中19所为附属医院）、12所教学医院；设有39个临床专科学院学系、32个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建有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国家医疗大数据研究院、首都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基地等智库平台。

学校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扶伤济世，敬德修业”的校训，历经几代首医人辛勤耕耘、砥砺奋斗，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医药卫生人才，取得了丰硕的医学科研成果，形成了积淀历史精髓、富有时代内涵的首医精神体系，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办学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为首都北京和国家医药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正朝着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医科大学的建设目标奋进。

校训

敬扶  
德伤  
修济  
业世

吴阶平



统一刊号：ISSN1672-4038 国内邮发代号：82-484 国内定价：15.00元  
CN11-5047/D 国外发行代号：M2076 国外定价：\$11.00元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京大工商广登字20170005号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